

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

卷一

## 马克思语录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 列宁语录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 目 录

历史的见证 .....	1
一、殖民强盗闯进上海 .....	6
挑起侵略战争 .....	7
建立滩头阵地 .....	9
扩大殖民势力 .....	12
一页血腥记录 .....	18
横眉冷对掠夺者 .....	20
二、豺狼当道 .....	22
政府中的政府——工部局 .....	23
殖民者的司法工具——会审公廨 .....	26
张着血盆大口的老闸捕房 .....	30
侵略者的反革命别动队——万国商团 .....	36
三、中国人民不可侮 .....	40
反对“过桥税”和“园规” .....	41
小车工抗捐 .....	49
苏报案 .....	52
“拒俄”抗暴 .....	56
大闹会审公廨 .....	59
四、疯狂的地产投机 .....	62
狠毒奸刁的“地皮虫” .....	62
房地产大王——沙逊 .....	65
大吸血鬼——哈同 .....	69

DC 34/22

五、经济掠夺的两大支柱 .....	74
劫夺上海海关 .....	74
垄断中国金融财政的汇丰银行 .....	81
六、无孔不入的洋行公司 .....	89
殖民掠夺的急先锋——怡和洋行 .....	90
上海电力公司——美帝控制上海电力事业的机构 .....	98
大北电报公司——沙俄垄断中国电信事业的工具 .....	102
为虎作伥的买办 .....	106
洋货分销店——四大公司 .....	110
七、杀人不见血的魔窟 .....	114
侵略者的喉舌——《字林西报》 .....	114
一所大赌场——跑马厅 .....	119
文化侵略的据点——大光明电影院 .....	122
鼓吹尊孔复古的仓圣明智学校 .....	125
宣扬封建迷信的虹庙和静安寺 .....	128
八、上海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	130
五四时期外滩和南京路的人民斗争 .....	130
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	134
九、日本侵略者的独占 .....	142
从“共管”到独占 .....	142
恐怖统治 .....	146
残酷掠夺 .....	150
“交还”丑剧 .....	153
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 .....	154
十、在美蒋的反动统治下 .....	157
胜利后的劫收 .....	157
美帝暴行 .....	160
美货泛滥 .....	163

狼狈为奸 .....	167
十一、黎明前的战斗 .....	171
摊贩斗争 .....	173
爱用国货运动 .....	175
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 .....	178
十二、新生和巨变 .....	183
十里长街庆解放 .....	185
人民做了主人 .....	187
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 .....	191
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阵地 .....	198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	200

## 历史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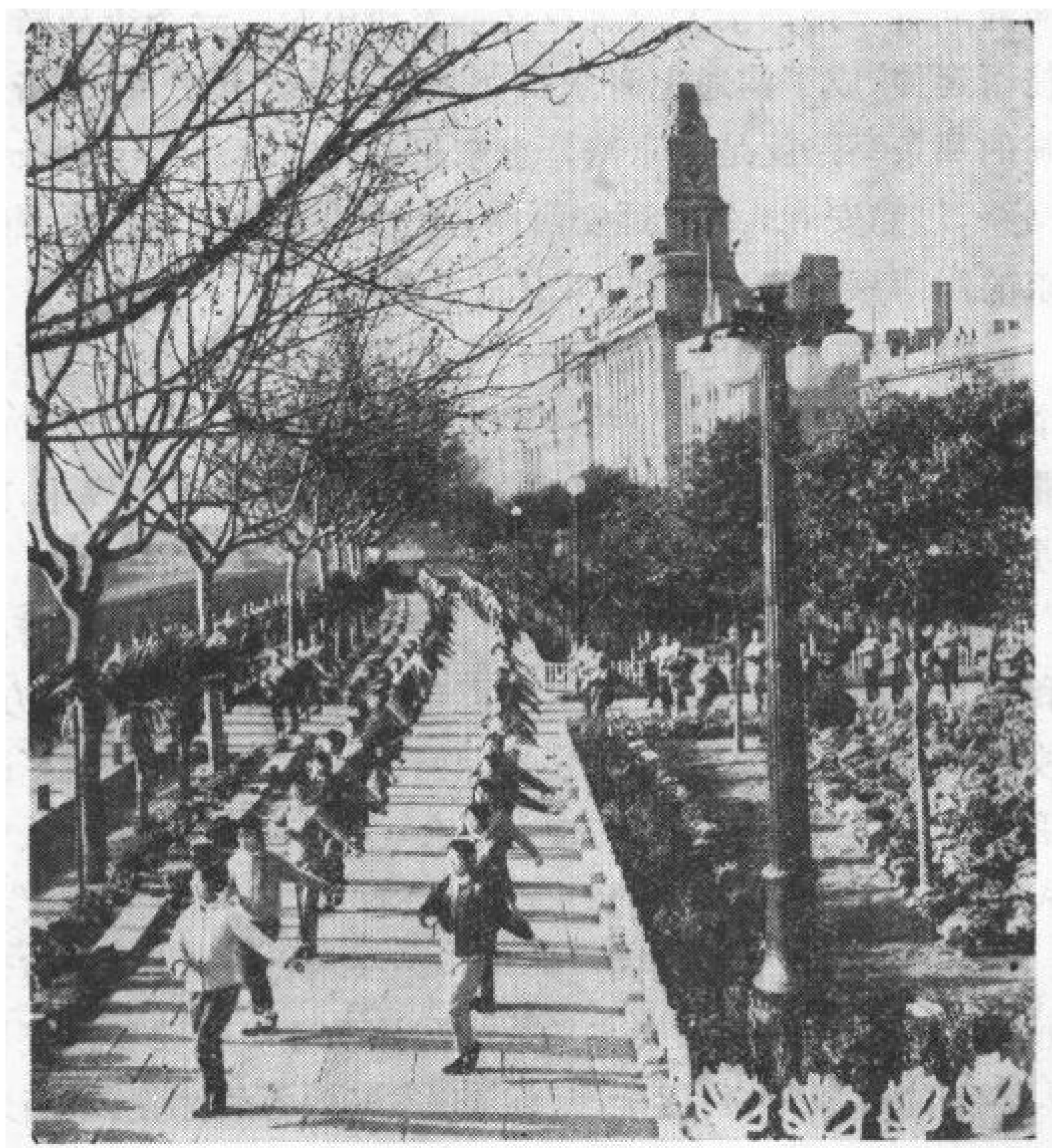
上海外滩，是条南北向的临江大道。它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全长约三华里；东面紧靠着金波粼粼的黄浦江，西面矗立着一排高楼大厦。在这些大楼中间，一条条马路由东往西延伸，成了沟通上海东西交通的动脉。其中，显得格外热闹的那条马路就是南京路。它东起外滩，穿越二十六条大小马路，过静安寺，西抵延安西路，全长约十一华里。西藏路以东的叫南京东路，以西的叫南京西路。

清晨，当红日跃出黄浦江面、金灿灿的阳光透进了上海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外滩海关钟楼上的大钟奏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这宏伟的声音，召唤着人们开始新的一天的战斗，鼓舞着人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今天的外滩，“到处莺歌燕舞”。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一月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上方，一枚巨型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位威武英俊的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屹立两旁。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上海海关、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纺织工业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办公大楼，彻夜灯火通明，人们都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日夜繁忙着。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捷报，不断地汇集到这里来。统计图表上的一根根红线，标志着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节节胜利。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新外滩，显得分外的庄严和美丽。那高大茂密的梧桐树，绿叶成荫；挺拔壮直的棕榈树，密植成林。在林荫道上，上海民兵背着钢枪在阳光下列队出操；红领巾们排着队边走边唱歌。上班工人的自行车川流不息；退休工人在树荫下笑声朗朗。在宽大的柏油路上，汽车、电车南来北往；黄浦江心，万吨巨轮汽笛长鸣。到了节日的夜晚，辉煌的彩灯勾出了全部大厦的轮廓，黄浦江也显得



外滩的早晨。



更为美丽。高入云天的大楼顶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型霓虹灯熠熠辉耀，表达了一千万上海人民的心声。

如今的南京路，通过解放以来的多次改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劳动人民盖的，当它们回到了劳动人民手里以后，青春焕发，披上新装；那商店货架上的日用百货是国产的，它在营业员们的精心布置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店堂里购销两旺，市场繁荣。南京路可以说是上海最热闹的马路，然而整条街道是那么的明亮和整洁，那滚滚向前的人流，又是那么的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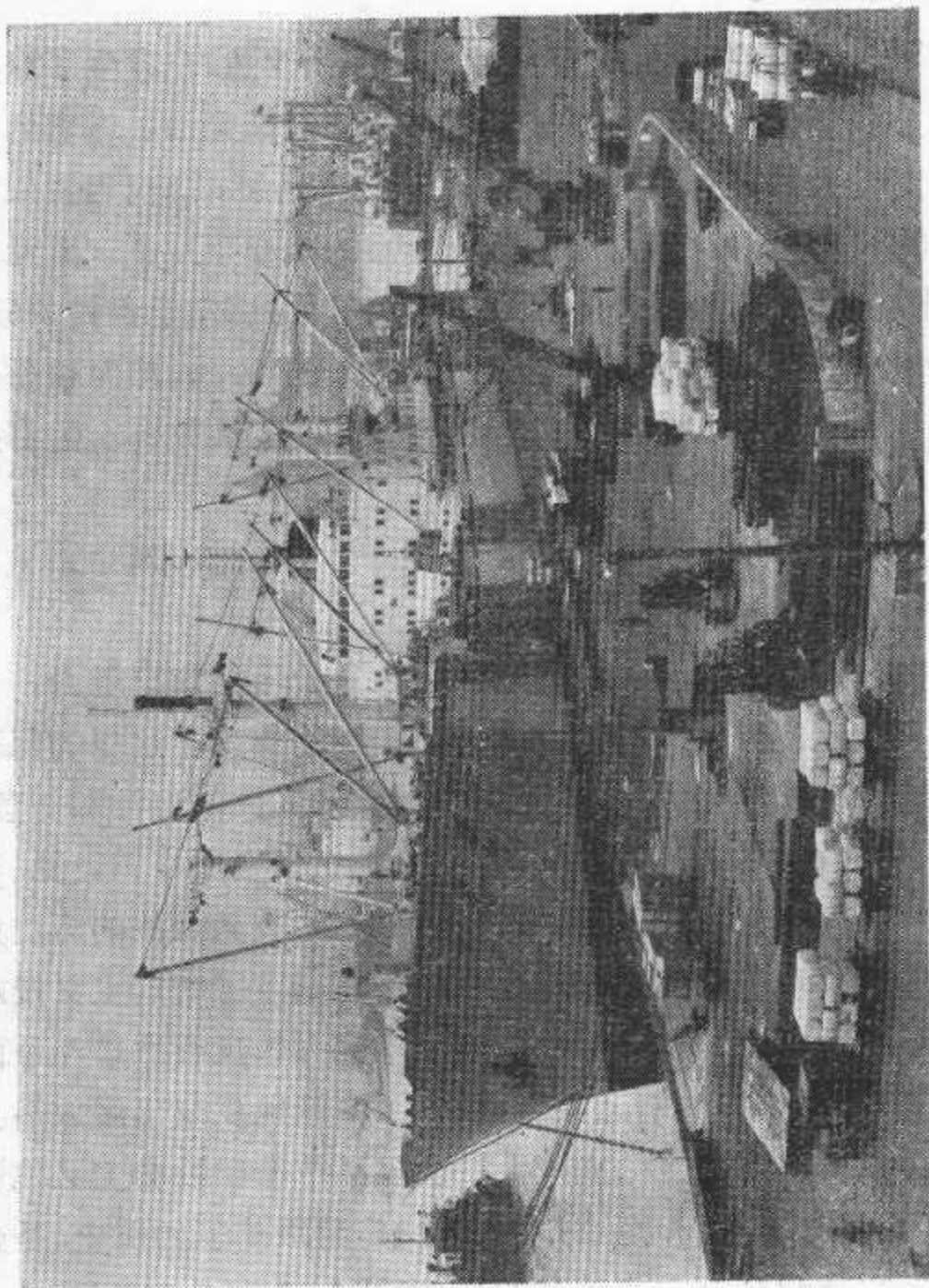
火红的革命年代，沸腾的战斗生活，使外滩和南京路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景象。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过去，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过去。

外滩和南京路，可以说是近代上海的缩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幢大楼，都凝结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它们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见证，也是上海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这里深刻地留下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罪痕，也生动地写下了中国人民反帝抗暴斗争的光辉篇章。同时，它们又象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解放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外滩和南京路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正因为如此，许多青少年常到这里接受教育。

正因为如此，许多外地来沪的同志到这里摄影留念。



昔日被帝国主义所霸占的码头，今天停泊着国产的万吨巨轮。

正因为如此，前来上海旅行、观光的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大都要到这里来走一走，看一看。

也正因为如此，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国际友人，常常从这里开始参观上海。

一些解放前到过上海，现在又来到外滩和南京路参观的归国华侨和外宾，这种“旧地重游”，往往使他们感慨万分！“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在这里，他们再也看不到吉普车的横冲直撞，再也看不到巡捕的警棍飞舞和喝醉酒的外国水兵行凶打人。这里已没有乞丐，没有舞厅，没有酒吧间，也没有赌场……。今天，他们所看到的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无限的创造力和沸腾的战斗生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画卷。两种社会两重天，外滩和南京路的今昔对比，恰是新旧两个中国的生动写照！

中国人民的胜利，外滩和南京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然而，也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反华小丑，如安东尼奥尼之流，对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切齿痛恨和难过万分的。他们竭力宣扬“侵略有理”、“掠夺有功”的谬论，胡说什么：“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他们无视外国资本掠夺榨取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无视上海的历史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事实，无视解放后上海面貌焕然一新的事实，把侵略说成“友谊”，把掠夺说成“帮助”，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还是让我们通过外滩和南京路的铁的历史事实，来回击一小撮反华小丑的无耻谰言吧！

## 一、殖民强盗闯进上海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在七百多年以前还是长江口上的一个渔村。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到一二九〇年(元朝至元二十七年)设立县治的时候,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兴旺的市镇了。由于上海地处南北海上交通的中心,又是长江来往船舶装卸物资的口子,长江下游各省丰富的物产都以它为集散地;清朝康熙年间,又在这里设立了江海关,航运和贸易就日益繁荣起来。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当时,来自福建、广东、浙江、山东以及东北各省的船只,由吴淞口驶入,停泊在上海城东的黄浦江边,出现了“船舶如蚁,舳舻尾接,帆樯如栉”的情景,也就是说,当时小东门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只多如蚂蚁,头尾相连,那船上的帆樯,象梳齿般地排列着。可见那时的上海,已是一个相当热闹的港口了。当时虽然还没有外国商船直接开到上海来,但上海开往日本、越南、暹罗(泰国)等地去经营出口贸易的中国商船,却已经为数不少。这种船叫做“沙船”,把中国出产的丝绸、茶叶和药材运往海外,又把外国的货物带回中国。据史料记载,早在十八世纪初叶,上海和日本长崎之间,就开始进行直接贸易了。可见上海在历史上早就以“商港”而闻名中外。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

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上海也必将缓慢地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城市。但是，外国殖民者的闯入和侵略势力的扩张，使上海沿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日益畸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 挑起侵略战争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早就视为一块肥肉，垂涎三尺。一七五六年，在作为英国向亚洲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里，有个名叫毕谷的英国人就曾经说过，上海“是一个有希望的商港”。他建议英国政府把上海作为“对华通商”的基地。一八三二年初，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派间谍礼士携带在一年前就曾以传教士名义来过上海刺探情报的郭士力为翻译，乘船从澳门北上，前来上海窥探，策划武装入侵。为了避免中国官厅的注意，更由于害怕中国人民的反对，礼士乔装改扮，化名“胡嘎米”，伪称去日本，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了吴淞口。这一伙外国冒险家，不顾炮台上中国守军的阻拦，偷偷地下了船，改乘舢舨溜进了黄浦江。礼士等坐在舢舨上，贪婪地观望着广阔的黄浦江面，看到航行或停泊在江中的各种船只，以及岸上的巨大货栈，对上海更是馋涎欲滴。他们悄悄地在小东门外天后宫<sup>①</sup>门前爬上岸来，并拒绝服从上海道台<sup>②</sup>要他们立刻回广东去的命令，在上海乱窜了两个星期，跑遍了整个上海县城，搜集了许多情报资料。礼士回去后，写了份《华北各港



航行报告书》，极力赞扬上海的富饶，认为它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商业城市”，必将成为“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他写道：“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倘若能在这里作自由的贸易，则利益无穷无尽”。英国殖民者看中了上海的繁盛及其发展前景，决定把他们贩卖鸦片的罪恶勾当，从广州扩大到上海来，进一步残害中国人民的生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英国殖民者为了全面打开中国的门户，实现其侵略野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策划，一八四〇年，终于挑起了鸦片战争。在清政府投降路线的指导下，清军节节败退。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英国侵略军进攻吴淞炮台。守将陈化成率部坚守。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指挥守军发炮还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炮战，击伤敌舰数艘，击毙敌海军少校霍维特。但由于驻守宝山县城的两江总督牛鉴贪生怕死，一听到侵略军的炮声，便仓皇溃逃，敌军乘机攻进吴淞炮台。陈化成带领士兵用长矛同侵略军展开肉搏，表现了勇敢战斗的精神。但终因势孤力寡，负伤多处，力战身死。全体士兵也都在奋战中壮烈牺牲。吴淞失陷后，上海道台巫宜楔以下的地方官员，相继弃城出逃。十九日，英国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他们把总司令部设在城隍庙后园，把一家大当铺当做炮兵团部。城内许多古代建筑物被肆意破坏，无数珍贵文物被盗劫，许多民房被焚毁，不少商店和居民的金银财物，都被抢掠一空。这些强盗兵，酗酒作乐，奸污妇女，干尽了坏事和丑事，使整个上海城遍

---

① 这个天后宫后来毁于兵火。清光绪初年，在河南路桥堍另筑天后宫，今为河南北路小学校址。

② 上海道台的全称一七三六年起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清政府派驻上海地区的官吏，管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并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

遭蹂躏。过了六天，英国侵略军向上海商民勒索到一笔巨款后，带上他们在上海劫掠到的赃物，分乘七十三艘船只，沿江而上，又进犯镇江和南京去了。

一八四二年八月五日，英国侵略军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在武力压迫下，宣布“议和”。八月二十九日，代表清政府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耆英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康华利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约第二款“规定”中国开放五口<sup>①</sup>通商，上海是其中之一。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英国侵略者又迫使清政府和它订立了《虎门条约》，攫取到在中国通商口岸租赁和建筑房屋等特权。

不久，英国派出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此人名叫巴富尔，原是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的炮兵连长，双手沾满了印度人民的鲜血，有着殖民掠夺和统治的经验。他带着译员等数人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八日乘船到达上海。第二天，会见了上海道台宫慕久，提出开埠和设立领事馆等要求，并租到县城内房屋一所，成立临时领事馆。五天后，即十一月十四日，英国领事馆贴出了第一张布告，宣称：“上海将于本月十七日正式开为商埠，所有条约规定各项，均于该日内发生效力。”

就这样，英国殖民者打开了中国的东大门——上海，并紧接着在上海着手建立他们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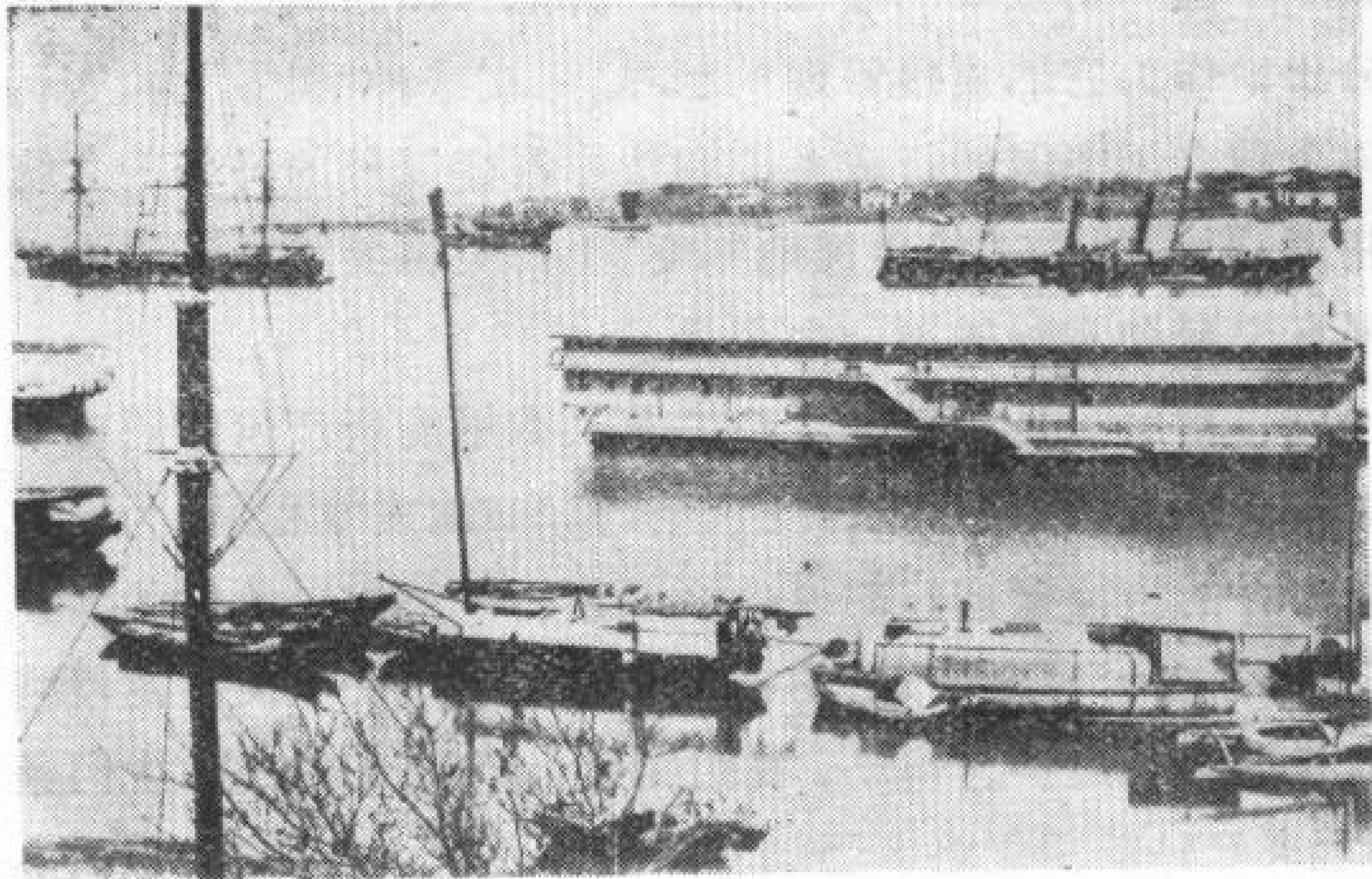
## 建立滩头阵地

上海“开埠”一个月后，到一八四三年底，在上海的英国殖

<sup>①</sup> 五口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口岸。

民者总共只有二十五人，后来日渐增多。这些人开始大都散居在县城里面。但是殖民主义者来到上海的目的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侵略的桥头堡，然后再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内地的侵略，于是他们借口县城内人口拥挤，居住条件差，要求在城外专门划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这些殖民者首先看中了黄浦江边外滩这块地方。因为它邻近县城，黄浦江和苏州河在这里汇合。通过苏州河，可与“丝绸之乡”相通，出黄浦江逆长江而上，可深入中国的西南腹地。控制了外滩这块地方就可以控制整个上海。更重要的是外滩位于黄浦江之滨，接近吴淞口，依靠侵略者的兵舰可以把从中国掠夺来的财富直接运回他们自己的老巢；并且象一个殖民者说的那样：把他们的住处和商船放在自己军舰大炮的守护之下，更可以感到“放心”。其实，璞鼎查在签订《南京条约》回上海时，就打定主意要把这块地方弄到手。所以当巴富尔来上海后，首先就在黄浦江上划了一块长二千九百英尺，宽一千七百英尺的江面，为英国船只的“下锚地段”。这一段江面的西岸，就是从苏州河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之间的地区。可见殖民者早就包藏着霸占外滩这块地区的祸心。

为了窃据这片土地，巴富尔胁迫清政府官员同他进行“谈判”。一八四五年，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和阴谋欺诈之下，终于炮制出一个所谓《地皮章程》，由上海道台宫慕久以个人的名义公布。这个章程划定李家庄（一作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洋泾浜以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在这个区域内，英国殖民者可以用低微的代价（每亩年租一千五百文和变相的地价即所谓“押手”一万五千文）随意“租”中国居民的土地，而且可以永久“租”下去，原业主不得停租和增加租金。这种所



殖民主义者侵占外滩以后，黄浦江上停泊着侵略者的兵舰和水上鸦片堆栈。

谓“永租”制度，实际上是外国殖民者妄图永久霸占中国土地。《地皮章程》还“规定”：“界内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屋租与华商”；外国商人于界内“租”得土地后，“不得建筑房屋租与华人，或供华人之用”。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不仅要霸占中国人民的土地，而且还要剥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华洋分居”。《地皮章程》所“规定”的每一份“租地契纸”都需要上海道台在上面盖章，这种叫做“道契”的手续，只不过是外国殖民者想使霸占中国土地的行为“合法化”而已。至于英人居留地的东、西界线，这个章程并没有明确划定；到了第二年，才具体定下来，东起黄浦江，西到界路（今河南路）。于是，英国侵略者一次就掠夺到面积达八百三十七亩的土地，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英租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

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許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在這種“租界”內，實行了完全獨立於中國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統治制度，即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上海英租界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勒索到的第一個租界。

應當指出的是，外國侵略者及其御用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一貫引用《南京條約》、《虎門條約》和《地皮章程》作為設立上海租界的法律根據，胡說什麼“它們是英租界誕生的大憲章”，極力宣揚“侵略有理”的強盜邏輯，為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政策作拙劣的辯護。但是，我們知道，《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本來就是英國侵略者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中國人民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它的“合法性”；而且就是這兩個不平等條約，也只是允許英國人可以在上海等口岸居住通商，並沒有規定把整塊土地划給外國人設立什麼租界。《地皮章程》則是外國殖民者根據他們的擴張野心擅自炮制出來的，他們任意擴大侵略特權，在有些方面甚至遠遠超出了《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的範圍。把這些完全片面的非法的東西當作租界的合法的根據，這無異於強盜說殺人越貨是合法的。

## 擴大殖民勢力

英國殖民者象貪得無厭的野獸一樣，擴張野心永遠不會滿足。他們在黃浦江邊侵占到一塊灘頭陣地後，緊接着就千方百計地設法擴大這塊地盤，為此使用了一切卑鄙手段，製造了種種借口，玩弄了各種陰謀詭計。

外國侵略者慣用的手段是軍事威脅和政治訛詐。一八四



八年，继巴富尔担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阿礼国，就借口“青浦事件”，迫使清政府承认他扩充英租界的无理要求。这次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年三月间，有三个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国殖民者，溜到青浦去搜集情报，胡作非为，受到当地居民和停泊在那里的中国粮船上的舵工们的惩处。阿礼国有意扩大事端，派兵舰阻止一千四百艘清政府北上的粮船启程，还嚣张地找到上海道台咸龄的门上，用扇柄敲打咸龄的头皮，要求“惩凶”和“赔偿”，并以停付关税相威胁。英国副领事还赶到南京，对清政府的两江总督施加压力。腐朽卖国的清政府全盘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结果，咸龄被撤换，青浦水手十人在外滩被“戴枷示众”，其中两名分别被判处徒刑和流刑。清政府的这种昏庸软弱，使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阿礼国乘此机会于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迫使新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同意把英租界扩大，重订界址：西面从界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北面从李家庄推到苏州河南岸，一次就扩大面积近二千亩，连前合计英租界面积共达二千八百二十亩。

法国和美国侵略者，看到英国抢得了一块肥肉，都非常眼红，要求“利益均沾”，相继胁迫清政府给他们同样的特权。一八四九年，法国殖民者攫取到上海县城和洋泾浜之间的一片土地，作为“法租界”。一八五四年，美国也迫使清政府同意把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地区划作“美租界”。这样，西方殖民强盗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各得其所”，把整个外滩都分割完了。接着它们就以租界为基地，不择手段地扩展侵略地盘。

外国殖民者还常以“跑马”为名，任意强占租界以外中国人民的土地，为进一步扩大租界的地盘做准备。早在一八四八年初，就有一伙聚居外滩的外国鸦片贩子和“冒险家”，借口跑

马和娱乐的需要，强占了当时租界西面边界以外五圣庙地方（今红卫百货商店一带）的八十多亩土地，辟作花园（后称“老花园”），并在这里搞了一个运动场（后称“抛球场”），将花园的四周筑成跑马的跑道。这样就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跑马场。从这个跑马场到外滩有一条小道，叫做“花园弄”，它就是后来南京路最东面的一段。

这年年底，英租界的西界扩展到泥城浜，那个花园和跑马场也就划进了租界里面。这时一些外国殖民者，因为外滩一带的地价昂贵，而且早为先来者所占据，就把他们新开设的洋行、公司和商店，建筑到花园弄的两旁来，于是这里的地价也跟着高涨起来。老花园和跑马场的股东们（他们大都是“跑马总会”的董事）看到有利可图，就进行投机，把这片八十多亩土地，以惊人的高价分块卖了出去。

一八五一年，一批英国“冒险家”仍然打着跑马的幌子，又着手在老花园的西面侵占农民大片田地，准备搞新花园和第二个跑马场。据这年八月九日英文《北华捷报》记载：这些殖民强盗蛮横地在他们强行圈占的土地上，“不问田地、房舍、葬地、坟墓、界标、堤场和沟渠，一律打灰线，钉木桩，占用了几百亩地，迁移了两百多具棺材”。外国侵略者这种霸占土地的行为，立即激起当地农民的强烈反抗，“聚众予以袭击”，使他们的侵略计划受到了挫折。但殖民者仍不死心，到了一八五四年，他们勾结清政府官吏，使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占浙江路到泥城浜之间的土地一百七十余亩，即从今浙江路上海第十百货商店起，经湖北路、海口路、北海路、西藏路、六合路、芝罘路，再回到浙江路的一大圈土地，划出作为新花园和第二个跑马场。

就这样随着花园和跑马场的迁移，花园弄也就从今河南路的老花园，向西延伸到今浙江路的新花园。新建的这一段花园弄，路面较宽，可以跑马和行驶马车，所以被称为马路。这就是后来南京路的中段。

为了扩充租界范围和加强殖民统治，英、法、美三国领事在一八五四年，又施展鬼蜮伎俩，背着清政府，擅自重订了一个有十四款的新《地皮章程》，即《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这个章程除了非法决定在租界内成立“工部局”，并向中国居民征收捐税外，还删去了一八四五年《地皮章程》中“禁止华人在租界内租让土地房屋和外人建筑房屋出租于华人之用”的内容。这是因为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的时期，许多中国官僚、地主及部分被欺骗和胁迫的劳动人民纷纷进入租界，租界内的人口激增。殖民者乘机大量建造简陋的房屋，租给中国人居住，以牟取厚利。这种情况使得旧《地皮章程》中关于“华洋分居”的规定，同外国大班们的经济利益产生了矛盾。于是，这次重订的《地皮章程》就默认了“华洋杂居”的既成事实。应当指出，租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或迁移，外国人完全无权干涉。无论“华洋杂居”的规定，还是“华洋分居”的规定，都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的破坏。

一八六〇年八月间，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前锋一度到达英租界泥城浜附近。这支中国农民革命武装向上海的进军，使盘踞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侵略者心惊胆战。他们组织起反动武装——“上海义勇队”，配合清军进行镇压，黄浦江中的英舰也开炮轰击。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为了对付太平军，新花园和第二跑马场也作了军用，里面安置重炮，堆起沙袋，墙上

开了许多枪眼，枪口对准着革命的中国人民。

太平军撤走后，租界恢复了熙熙攘攘的景象。在外国冒险家的抢占和操纵下，花园弄西段出现了地产投机的热潮，地价飞快上涨。跑马总会的股东们看到“生财有道”，于是象上一次一样，把这块占有一百七十多亩地的新花园和第二跑马场的地皮出售，攫取暴利。他们首先顺着花园弄向西修筑了一条路，穿过新花园和第二跑马场，接着就把沿路两旁的土地分块出售。而这些土地仍然优先落到了跑马总会的股东和董事们的手里，成了各自的私产，他们借此再进行投机倒把。

这样，花园弄就从外滩向西延伸到了泥城浜，即今西藏路一带。到一八六五年，花园弄正式改名为南京路。

上面谈到的是旧南京路，即今南京东路。今南京西路从西藏路到静安寺的一段，从前叫静安寺路。这条路是一八六二年修筑的。当时这条路完全在租界之外，是外国侵略者越界修筑起来的。

“越界筑路”是外国侵略者扩张租界的又一种手法。他们总是先利用某种借口，在租界外面修筑一条连接租界的马路。那些冒险家们随即在马路两旁抢占土地，建造房屋。租界当局跟着就把租界扩展过去。如果一时还办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在那里设立岗警，征收捐税，把那块地方变为一种特殊地区，即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一书所用的“且介”——“半租界”的区域。静安寺路就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越界筑路较早的一条。

一八六二年，那一伙跑马总会的股东们仍然打着“跑马”“运动”的幌子，又把魔爪越过当时英租界的西线，在泥城浜以西今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一带，以一万二千五百两银子的低

价,强购五百二十亩土地,把中国居民的房舍、坟墓拆除或迁走,开辟了第三个跑马场,即所谓“跑马厅”。与此同时,他们又将上一年出售新花园和第二跑马场所得的一部分钱,大量收买泥城浜以西的地皮,并从泥城桥向西直达上海古刹静安寺,修筑了一条跑马道,取名涌泉路,即静安寺路。

静安寺路的修筑,还适应殖民者军事上的需要。当时英、法、美侵略者正和清政府相互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外反动派联合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洋枪队”(后改名“常胜军”)就是以上海为据点的。为了方便他们的反革命军事行动,在上海西郊建筑了好几条“军路”。一八六二年八月,太平军又一次向上海进军,迫近静安寺。英租界当局叫嚷“保卫租界”,成立所谓“防卫委员会”,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设在护界河(今西藏路),花园弄成了军事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静安寺路的建成,和通徐家汇的“军路”连接起来,更便利了中外反动派镇压中国革命的需要。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条修筑在中国土地上的路,却不许中国人自由通行。一八六三年,跑马总会的股东们在这一条路上,设立了许多卡门,公然征收“通行税”,行人全年须付银十两,骑马全年须付银二十两,马车全年须付银三十两。一八六六年,跑马总会无视中国的主权,竟擅自提出将这条越界马路交给工部局管理。一八八四年,工部局派出巡捕在这条路上巡逻,并设立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巡捕房,宣称由它负责管理静安寺路。这样就把静安寺路强行划入租界范围里去了。

为了加强殖民统治,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英、美两个租界合并成所谓“公共租界”(法租界仍独立存在)。一八九九年,公共租界当局又一次迫使清政府同意他们进一步扩大



租界的要求，扩大面积达二二，八二七亩，把公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了静安寺一带。这样，公共租界的总面积连前合计，共达三三，五〇三亩。

从表面上看，南京路从外滩起一段段向西延伸，好象都和跑马有关系，但实际上，外国殖民者三易跑马场，“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掠夺土地，为扩充租界制造条件。“跑马”“运动”只是他们蓄意扩张的一种借口而已。

### 一页血腥记录

外滩和南京路的历史，是外国殖民者在上海残暴地掠夺中国人民的一页血腥记录。为了开辟和修筑这两条马路，不知有多少中国农民的土地被霸占、房屋被拆毁，多少中国人民被迫流离失所，又不知有多少中国劳动人民累断了筋骨，流干了血汗，葬送了生命。外国殖民者雇用中国工人筑路，极尽剥削之能事。就拿旧南京路一次翻修来说，有一百多个中国工人被雇去砌修路面，每人每天只发给一角小洋，这点钱连个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但为了赶着完工，他们每天得干十几个小时。当时正逢数九严寒，地冻得象铁板一样，一锹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工人们的双手被震破，鲜血直流。南京路的每一寸路面都是这样凝聚着无数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了榨取无偿劳动，殖民当局还动不动地以“违警”、“违反执照章程”或“收买赃物”等这样那样的莫须有的罪名，蛮横地判处许多中国人作苦工，强迫他们筑路。这些被罚作苦工的人，“三五十人锁在一起，颈戴链条”，备受“凌辱虐待”。他们“遭到日晒雨打，不能稍事停歇。一日三餐，吃的是一小碗的饭，喝的是冷水”。有些

人因“不堪虐待，得病身死”。

那些马路两旁的高楼大厦，同样也是外国侵略者残酷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有力的见证。这些高大宏伟的建筑物，哪一幢不是帝国主义强盗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和榨取中国人民的劳力而建造起来的？那竖在地上的一具具钢架，打入地下的一根根桩头，都包含着中国建筑工人的无限辛酸和斑斑血痕。当年亲身参加过建筑沙逊大厦、国际饭店和永安公司大楼等工程的一位退休老工人控诉说：“上海的高楼大厦，哪一座不是我们建筑工人亲手用一根根钢材架起来，用一块块砖头砌起来的？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高楼盖得越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剥削得就越多，我们工人所受的压迫就越重。那时，我们建筑工人真是‘人进工地，马进磨房，有活把命抵，无活饿断肠’。那个时候，建造大楼，哪一次没有死掉一批工人啊！”据这位老工人回忆，建造沙逊大厦这幢楼房时，光一次触电事件，就死了四十多个中国工人。他的表舅就是在造沙逊大楼时活活摔死的。当时帝国主义者根本不把中国劳动人民当人看待，更说不上劳动保护，高空作业丝毫不顾工人安全，只有两块脚手板，一块放砖头和材料，一块刚好站一双脚，稍一不慎，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建筑工人还蛮不讲理地规定：上午十点钟以前下雨，全天不发工资，下午三点钟以前下雨，半天不发工资；高空作业时，落下一只螺丝帽在马路上，就要罚五两银子。

外滩和南京路是怎么来的？马路两旁的高楼大厦是怎么来的？当年在这些工程里淌过汗流过血的中国劳动人民知道得最清楚。正如一位老工人说的，“每一幢大楼的来历，咱肚子里全有账”。老工人们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对鼓吹“侵略

有功”，“剥削无罪”的安东尼奥尼之流的帝国主义辩护士是最有力的回答和批判。

还应当指出：解放前的外滩和南京路不只是一条普通的马路，而且是一根巨大的吸血管。通过这个管道，中国广大人民的脂膏，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帝国主义强盗的腰包。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一八五三年，也就是外国殖民者侵入上海后第十个年头，他们在上海的财富，估计已达二千五百万英镑以上。又过十年，到了六十年代，就有上千名殖民者成了大富翁了。外滩和南京路的畸形发展，给那些冒险家从事投机事业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有利条件，同时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 横眉冷对掠夺者

上海人民对外国冒险家贪婪、疯狂的掠夺暴行，怀有深刻的仇恨，并进行过多次的反抗和斗争。

早在上海开埠之初，当殖民者首先争着抢占外滩一带地产的时候，就曾有一位老年农妇，大义凛然地拒绝把自己在外滩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出卖给外国殖民者。殖民者无计可施，就叫上海道台出面对农妇进行威胁。那个道台是个实足的奴才，对洋人唯命是从，对中国百姓摆出一副官架子。他对农妇百般恐吓，要她答应外国人的无理要求。看到道台的这副丑恶嘴脸，农妇怒不可遏，当场严正斥责了这个无耻的媚外官吏，并愤怒地把一口唾沫吐到了道台的脸上，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一八五一年，当外国殖民者妄图强占今南京路浙江路至

云南路一带的农田，准备开辟“第二个跑马场”时，当地农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万分，他们在一个名叫李仙云的群众领袖的带领下，奋起反抗。他们用锄头、扁担作为武器，把冒险家雇佣的狗腿子痛打了一顿，还广泛散发反对外国侵略者圈地的传单，到处张贴“杀尽洋鬼子”的标语。他们的斗争虽然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武力镇压，但由于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声援，因此坚持了一、二年时间，使侵略者霸占土地的企图一挫再挫。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上海人民也在积极准备响应。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上海小刀会起义，一举攻占了县城，李仙云带领着一部分农民参加了这次起义，继续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李仙云后来担任了小刀会起义军的领导工作，一直战斗到一八五五年初，才不幸被捕牺牲。

一八六二年，当外国殖民者强行圈占西藏路、黄陂路一带土地建筑所谓“第三个跑马场”时，当地农民又进行了持久的斗争，他们坚决拒绝领取外国侵略者发放的所谓作为地价补贴的银两，表示根本不承认这伙强盗对这一大片土地的占有，更不把这伙强盗企图用来欺骗和软化中国人民的几个臭钱看在眼里。

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它给那些肆意强占中国人民土地的殖民者以坚决的反抗，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 二、豺狼当道

外滩和南京路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和刺刀下，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尸骨铺设起来了。外国侵略者在这块土地上掠夺的权益越来越大，殖民统治的罗网也愈布愈密。侵略者在上海占据了租界这块地盘以后，便公然声称：“关于上海所用的‘治安、秩序和政府’这三个名词，是同关于香港和其他殖民地所用的一样的”。大班们大叫大嚷，“外国政府应维持陆海军来保护他们，并设立法庭和费用浩大的机构来管理租界的中国居民”。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在租界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制度。他们建立了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构，作为保护殖民者利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使租界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当时，作为“公共租界”中心地带的外滩和南京路，许多重要的殖民机构都设立在这里。其中如“工部局市政厅”、“会审公廨”、“老闸捕房”和“万国商团”，都是外国侵略者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

列宁指出：“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外国侵略者在租界里实行的一套殖民统治制度，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专政。

## 政府中的政府——工部局

在南京路广西路的转角处，即今广州饭店的旧址，本来是一幢用红砖砌墙的建筑。它座南朝北，临街有阳台，门前站着一列身佩武器的巡捕，警卫森严。这就是所谓“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那些到上海来寻找发财之道的冒险家们，经常麇集在这里，谋划压榨、蹂躏中国人民的鬼主意。

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时期，工部局是个臭名昭著的殖民机构。那骑着高头大马在租界里耀武扬威的所谓“万国商团”，是属于工部局的；那手执警棍在马路上来回巡弋、鱼肉中国劳动人民的巡捕，是属于工部局的；那敲着大印贴在租界马路上的布告，是工部局的；那征收捐税的单子和发放各种牌照的印戳，还是工部局的。总之，租界里对中国人民的一切“发号施令”都和这个工部局分不开。因此，要知道帝国主义在租界里是怎样实行殖民统治的，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工部局的历史。

早在一八四八年，早期登上黄浦滩的西方冒险家们组成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作为掠夺上海租界行政权的第一步。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国领事背着上海道台秘密拟订的那个《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完全凭着侵略者的扩张欲望，自己赋予自己种种权力。这个《地皮章程》，提出取消道路码头委员会，组织所谓“工部局”。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七日，工部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作为外国侵略者殖民统治的行政机关，它由简而繁，不断扩大，最高的权力集中于董事会。董事人数开始只有五人，后来陆续增加，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增加到

十四人。在董事会的下面，分别设立了警务、工务、财政税务、交通、学务等十几个委员会。此外，还有许多办事机构，如总办事处，以及商团、警务、卫生、工务、教育、财务等处。一本由工部局出版的书中供称：工部局所抱的宗旨，是使它成为真正的“政府中的政府”。英国领事阿礼国曾毫不隐讳地宣称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可见工部局的成立就是这个“国中之国”的政府出笼的标志。

按照殖民者自行炮制的“章程”规定，有资格选举董事的人，只能是居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同时还需具备如下的条件：“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以上，付房地捐十两以上，或赁住房屋每年租金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这就是说，有权选举董事的只是那些霸占中国人民大量地产或拥有其他财产的外国富佬阔少。至于董事候选人的资格，则要“付房地捐每年五十两以上（执照费不在内）或赁住房屋租金一千二百两而付捐者”，其人数更是微乎其微了。只有那些欺诈中国人民的“本领”特别大的、霸占了大量土地的大地皮虫、大投机家和大洋行的大班，才有权当选为董事。一个熟悉当年上海情况的外国人在谈到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时写道：“欲明了谁决定选举之举行，谁为候选人，将提出何种议案供众讨论，实为有趣之事。此等事件由极少数代表商业经营的人决定，恐怕不过二十人。”然而，正是这“不过二十人”的大班们，主宰了租界的一切，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因此，有人曾把它概括为“由少数人操纵，谋少数人利益”的“大班寡头政治”。

那些拥有选举权的人，当时通常称为“纳税外人”，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平时有事商议，则临时召集。这种“纳税外人”会议，权力相当大，除选举工部局董事外，凡征收捐税、预算、决



算以及市政设施等等，它都有权讨论、通过或否决。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就是所谓“纳税外人”开会的场所，大光明电影院建成后，这种年会就改在那里举行。每年四月上旬，总可看到一个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所谓“纳税外人”，摇摇摆摆地走进工部局市政厅或大光明电影院，去选举工部局的董事和通过各种掠夺、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的议案。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建立起来的殖民政权，实质上就是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里不仅拥有实际上的政府和军队，并且阴谋在所谓“自由市”的名义下，使整个上海完全脱离中国。他们在一八六二年间，抛出了一个“上海自由市”的计划，建议把上海县城、郊区和附近的一些地方合并在一起，交给英、美、法、俄四国“保护”，另行“选举”在上海拥有产业的洋行大班和公司经理，掌握行政管理大权，负责“举办税收和维持治安”。大班们妄图通过这种手法将整个上海从中国领土中完全分割出去。这是一项十分恶毒的侵略计划。当时资本主义列强正在阴谋瓜分中国，沙皇俄国带头干这种罪恶勾当，仅在一八六〇年，它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就攫取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那些在上海的殖民主义者在酝酿“上海自由市”的阴谋时，竟无耻地说：“即使上海为自由市，然较诸俄国所得者直区区耳”。表明这伙侵略强盗都是一丘之貉。

“上海自由市”的阴谋，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未能得逞，外国侵略者又运用强行修改《地皮章程》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殖民利益。本来是英国驻沪领事后来升为驻华公使的阿礼国曾给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写了一封信，提出：“我们在中国的地位，

是由武力所创造的,是由赤裸裸的和强大的武力所创造的。如果要保持或扩大这种地位,仍然需要使用某种武力(潜伏的或明显的)才能成功”。根据这种侵略方针,他们在运用“明显的”武力帮助清政府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又在一八六九年九月通过了片面修改的《地皮章程》,擅自规定工部局可以“增订附则”,即可在“章程”已有的条款之外,随意增加各种各样的条款,扩大侵略特权。同时还增加了工部局征收捐税之权。此后,他们又曾多次修改章程,每“改”一次,便夺得更多的权益。这样,工部局就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中的政府。它拥有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等各种专政工具,并有管理市政设施、征收捐税以及司法审判、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力。它代表着“纳税外人”的殖民利益,背靠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公使、外交部,在租界里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 殖民者的司法工具——会审公廨

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在市政厅的斜对面,即今国营上海第一食品商店这块地方,曾经是英租界“会审公廨”的所在地,它于一八六八年迁入,一八九九年迁出,前后达三十年。公廨的门前有一排木栏杆分列左右,进去是一个天井,上了台阶,便是审判案件的公堂了。里面还有四间“号室”,每间约七平方米,另外有一间木板屋。这些房间里经常挤满着被拘押的“人犯”。

所谓会审公廨,是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租界里擅自设立的审判机关,是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在

会审公廨里，各国领事委派了陪审官，跟清政府所派的“谳员”，一起审理租界里发生的有关中国人的诉讼案件，并作出判决。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使人非常气愤的现象：在公堂上，除了陪衬的中国谳员之外，还高高地坐着一个“洋大人”，而受审的却是中国人民。

英国侵略者在胁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取得了所谓“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可以不由中国官厅审讯，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由英国领事自行审判。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接连取得了这种侵略特权。而当时那些帝国主义列强的领事本身就是一伙流氓、恶棍、冒险家，或者是鸦片贩子、投机商人，因此所谓领事裁判权，实际上就是给那些殖民者在中国国土上明抢暗夺、杀人越货以种种保护。

外国侵略强盗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却要使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受他们的法律管辖，把殖民统治的枷锁牢固地套在中国人民头上。会审公廨便是他们掠夺中国司法权的产物。

一八五三年，当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以后，清政府地方官吏，有的被镇压，有的携款潜逃，英、美等领事乘机夺取租界里的司法权，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案件。工部局成立后，由工部局董事“轮流审案，每人一周”。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会在中外反动派联合攻击下失败了。但自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二年的七、八年间，租界当局仍然拒绝清政府在租界内直接执行司法权，凡中国居民的民刑案件，都先交“领署公堂”预审，然后解往县城中国衙门复审。一八六二年七月，英国领事写信给上海道台说：“历年以来本领事与贵官厅早经

谅解，凡贵国官厅对于居住租界内之华人行使管辖权时，须先得本领事同意”，他竟疯狂地把自己置于中国地方官吏之上，并妄图将已经窃得的部分司法权肯定下来。后来，兼有强盗与骗子双重身份的领事们，交替地使用了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手法，于一八六四年胁迫并诱使上海道台派员到外滩的英国领事馆，与英国领事组织一个法庭，称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开始受理租界内有关中国居民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就这样搞起来了。

实行所谓“会审”以后，洋陪审官的话就是“法律”，说了算数，中国谳员形同虚设。洋陪审官有时在判决书中写上“我的意见中国委员亦表同意”等字样，有时竟然在中国谳员的判案意见后面写上“批准”两字。外国侵略者还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上海道台将“会审”的组织和办法明确规定下来。几经交涉，到一八六九年，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议定扩大“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权力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十条，并加以公布。从这时起，“理事衙门”改称“会审公廨”。连中国地方官要在租界内拘捕“人犯”，也得经过英领事加签，才能生效。该“章程”原定试行一年，结果竟沿用了几十年之久。洋陪审员在会审公廨里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对于涉讼的中国人，竭尽迫害之能事。例如一八八四年英国副领事加尔斯被委派为陪审员以后，一直是“我行我法”，一副洋座山雕的嘴脸。有些已经判定监禁三个月的“罪犯”，他硬要改判十八个月。就连自己炮制的“会审章程”，他们也抛在一边。按照“章程”第二条，华人与华人之间的诉讼是与洋陪审员无干的，但从一开始，这一条就成为一纸空文，在纯粹属于中国居民的案件中，他们也经常招摇出庭，无理干涉。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的领事团对会审公廨曾有一项“指示”，赤裸裸地说：“凡与外国个人、外人团体或外国商人有关的案件，判决都必须于外国人有利。”所谓“有利”，就是殖民强盗有罪变成无罪，无理变成有理。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曾经供称，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杀死了中国人的外国人被判过刑”。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在给国务卿西华德的报告中也承认：“已经发生了许多对外国人的严重凶杀案，甚至故意凶杀案，在这些案件中犯案的外人，不是罚轻微的款项了事，就是仅以驱逐出境<sup>①</sup>或几日拘役结案。”不仅如此，就连那些入了外国籍的华人犯罪作案，也可以得到庇护。一八九七年五月二日《新闻报》上有如下一段报道：“（刘守明）一至与人争讼之时，始号于众曰：‘我已籍隶西洋之刘守明也’，恃为护符，肆无忌惮。……试观刘守明近年与人争讼案牍确凿可稽者大抵怙（恃）势欺人，将曲作直，无赖之尤。”该报还指出：上海自开埠以后，有些“高等华人”通过入教、讨洋人做老婆、挂洋行招牌等种种手段，求得殖民势力的保护。

至于那些由上海道台派到会审公廨去的谏员，不仅不能对任何案件作出有效的判决，甚至一举一动如未得到外国陪审官的认可也不能发生什么效力。他们除了讨好洋人之外，就是乘机敲诈勒索，塞满自己的腰包。这些谏员在洋人的面前唯唯诺诺，对中国人民则百般迫害。当时，人们就指出会审公廨如同“污池”，“腐败达于极点”，“成为贪污、残暴和敲诈的温床”。

一八六五年十月，有一个姓戴的中国人，因为用六十文钱

---

<sup>①</sup> 所谓“驱逐出境”，是指从中国的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西方侵略者视租界为“国中之国”。

(按当时物价折算大约可买一斤红糖或十个鸡蛋)买了一个门钮,被指控为“收买贼赃”。会审公廨竟判处两个月的差役,罚在租界内作苦工。结果因在风雨中从事非人的劳役,又遭受监工和巡捕的虐待,不几天,就被折磨而死。一八九七年八月,有四个中国人因在自来火(煤气)公司门前与两个巡捕发生口角,被送到会审公廨。结果一个人被判“荷枷一月”,其余三个人各判二百大板;这四个人还都被管押起来,说要等那两个巡捕在扭打时被扯坏的“警服”重新做好以后,才可开释。象这样的事例,多到举不胜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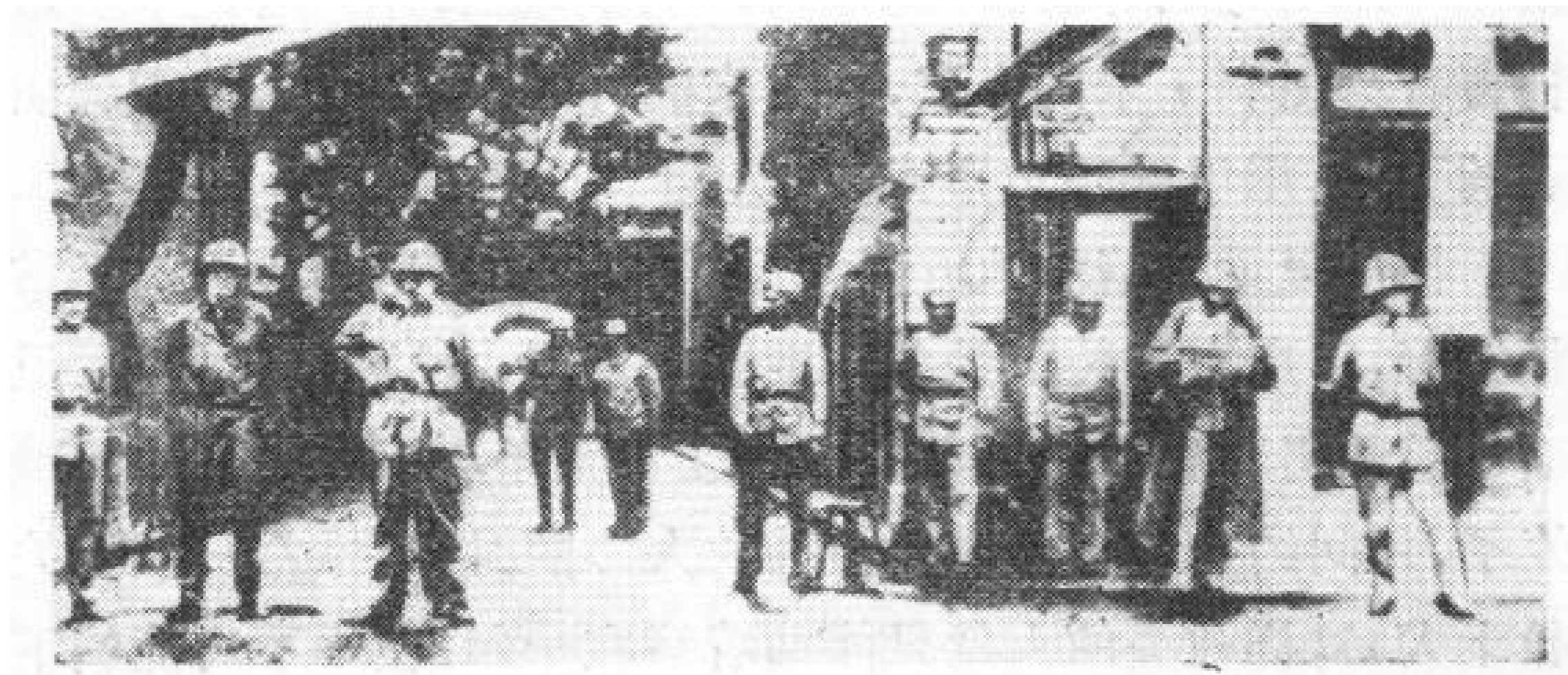
到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卖国的清政府被推翻了。树倒猢狲散,清政府的上海地方官吏都逃之夭夭,会审公廨里的两个臬员也席卷公廨涉讼存款逃走。帝国主义列强又乘此机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由领事团擅发通告,称:“本领团为维持地方治安起见,将该公廨职权继续执行。”并立即派巡捕闯进女监和拘留所,接管公廨和各个部门。从此会审公廨便成为工部局的一个附属机关,完全落入帝国主义之手。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才被迫摘下了“会审公廨”这块臭牌子,换上了一块“临时法院”的新招牌。但是,换汤不换药,帝国主义控制租界司法权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 张着血盆大口的老闸捕房

从当年的会审公廨往西走不远,便是老闸捕房(即今上海眼镜店和培光中学这块地方)。这座阴森森、黑洞洞的建筑物,它的大门本来是朝南京路开的。门楼上挖了一排排的枪洞,严

密地监视着周围的市民住宅和路上行人。捕房四周筑起了高墙，还拉上了铁丝网和电网。这样，那两扇开着的大门，就活象野兽张开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中国人民一口吞下去。

一八四五年的《地皮章程》“规定”租界内可以雇佣数名更夫，由上海道台和英国领事共同“遴派”。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地皮章程》本身就是殖民强盗侵略中国的产物，而侵略者对于不平等条约，也只是用来约束清政府，它自己却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条约约束。为了攫取租界的警察权，更夫一变而成为巡捕；对巡捕的事务，上海道台也完全无权过问。工部局成立后，就设立警务处，调香港巡捕房的克列夫登充任上海租界捕房的“总巡”。巡捕，最早只有“西捕”（大多数是英国人）和“华捕”，后来又有从印度招来的“印捕”，再后又有“日捕”。警务处下面先后分设了十几处巡捕房。据工部局一九三〇年年报所载，警务处共有四千八百七十九人，是工部局所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机构。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相应地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工部局成立的第二年，即一八五五年的年度预算中，巡捕事务费及薪金达二万零六百元，占该年度工



杀气腾腾的公共租界老闸捕房。



部局支出总额二万五千元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四。一九三〇年警务处支出又激增至五百八十万零七百四十八两。殖民主义者花费如此庞大的经费，正是为了利用捕房和巡捕这样一个殖民统治的暴力工具，来维持并扩大其殖民利益。

老闸捕房是工部局警务处底下最早设立的分区巡捕房之一。由于外滩、南京路是租界的中心区，老闸捕房又处在南京路的热闹地段，因此它成为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实行殖民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据点。

走进老闸捕房门口，迎面便是“总写字间”。被捉进捕房的人都要先到这里登记，然后依案件性质不同分别审讯。在审讯之前，不分青红皂白，即使是无辜的人，都要到“指纹室”留下手指印，作为迫害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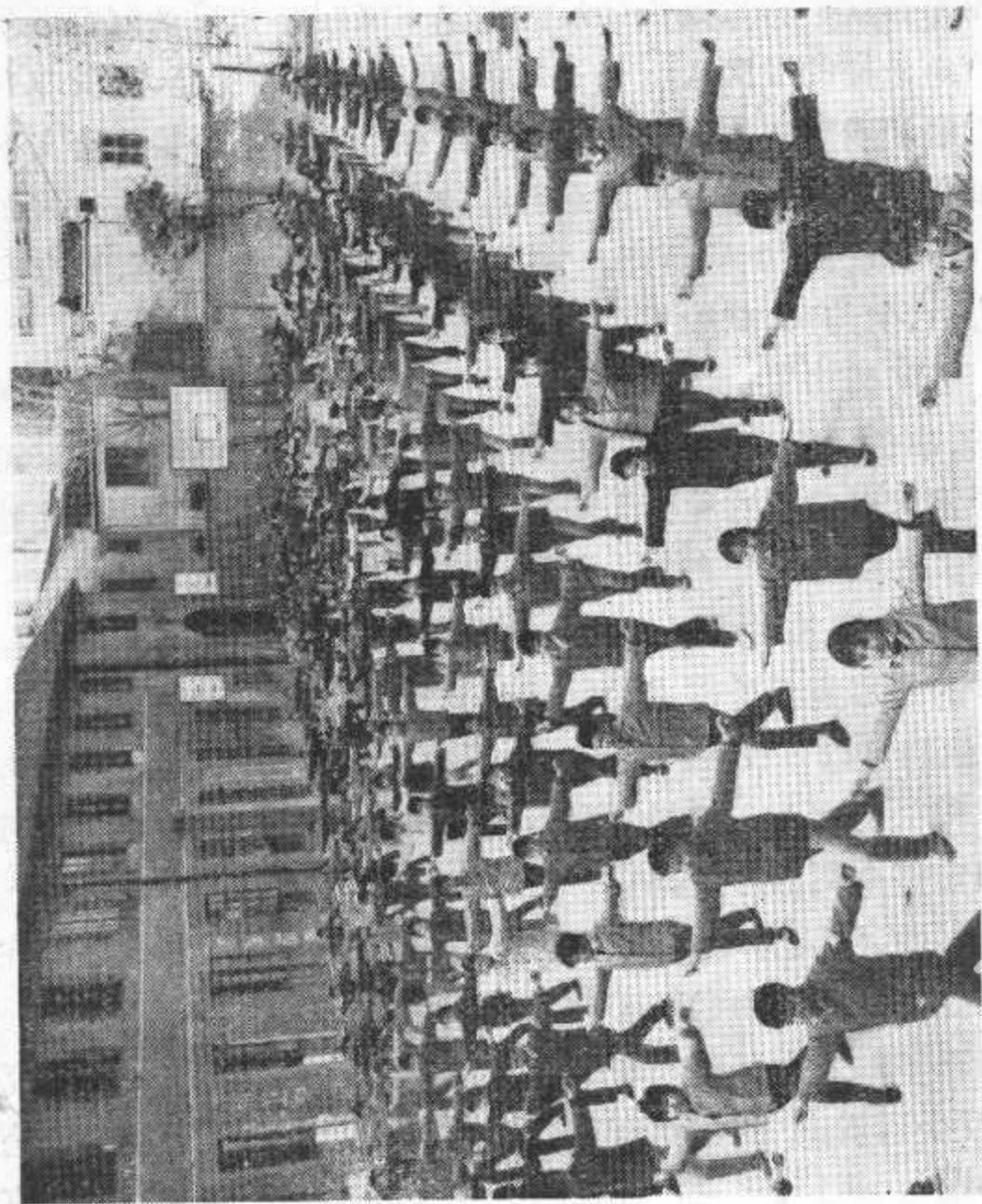
经过“指纹室”，就到了刑讯室和拘留所。那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二根铁杠嵌在墙上。被抓进去的中国人先铐在这些大铁杠上，等待残酷的审讯。负责刑讯的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审讯时，他们将抓进去的人吊在铁梁上，严刑拷打。各种各样的刑具和刑罚，如老虎凳、皮鞭、火烙、水烫、刀割……以至电刑等等，无所不用。刑讯室里，还挂着刽子手从被害者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割下来的耳朵，或者是被他们烧断了的手指，用以威吓被审讯的人。

捕房里最黑暗的地方要算是监狱了。那里的大铁门经常紧锁着，窗户上还装上铁条并围上铁丝网，即使是大白天，里面也总是阴森森的。监狱的房子是用钢条隔成的一间间的铁笼子，每间约一丈多见方。被捕的人多的时候，常常一间要关数十人，这样被关的人就只能站着挤在一起，根本不可能躺下来睡觉。最里面还有两间只有四尺见方的黑牢，终日不见一

丝阳光；里面的水泥墙和水泥地，冰冷而又潮湿；夏天，到处是蚊蝇蚤子；墙角洞里的大小便，散发着熏人的臭气。许多因为贫穷而无法归还欠债的劳动人民，受流氓陷害而被捉进去的无辜群众，特别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黑暗统治而被捕的爱国人士和革命者，都被关在这里面，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当年坐过这种监牢的章炳麟曾著文揭露过它里面的黑暗情况，指出：被关进去的人不是被迫害而死，就是被折磨生病而死。“西医视狱囚至微贱，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与药，狱囚五百，岁瘐死者，率百六十人。”

老闸捕房里面还有一个停车场，专门停放各种警备车、摩托车，准备随时出动，镇压中国人民。当时，在外滩和南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捕人的警备车，发着刺耳的警报声疾驰而过。

当然，巡捕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和摧残绝不限于捕房之内，更多的是那些到处伺探的“包打听”和在马路上来回巡弋的巡捕，他们可以寻找各种借口，动不动以违反“市政章程”或“执照章程”，将中国人民带到会审公廨，听候“违警庭”的裁判。捕房规定每个巡捕每月要撬一定数量的人力车“照会”，后来改为剥“号衣”，撬得越多，“成绩”越大，外快也越多，许多巡捕往往以此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经常无事生非，取走牌照。单一九三三年，人力车车夫在中区及老闸区的拥挤地段，被控究“违反交通规则”的，就有二万六千五百七十一人。在会审公廨特设的“违警庭”上，几乎每天都有强迫候罚的人群。法官对这类案件从来不审不问，全凭巡捕的指控，当法警吆喝“被告”姓名的声音刚落，法官处罚的裁判也即宣布。其中很多人是先被勒索了罚款（名叫“保证金”）再被迫来受罚的，有人身



帝国主义用来镇压中国人民的老闸捕房，今天成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的一所中学。

无分文,就以一元折算一天改为坐牢,以此对中国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和进行人身奴役。此外,如在“宵禁”期间的深夜,居民家里的灯光未熄,或小孩大声啼哭,巡捕都要找上门来,进行干涉,处以罚款。甚至倒提着鸡鸭去乘车或在路上行走,巡捕也会进行无理干涉,据说是违反了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所组织的“救牲会”关于“禁止虐待牲畜”的规定,轻则罚款,重的还要判刑。工部局出版的书中也供认:巡捕们“受贿和勒索的案子,无疑是很多的,没有发觉的案子比发觉的还要多得多”。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租界捕房的罪恶行径更主要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在工部局警务处的年度报告中,每年都有“公共租界捕房制止共党活动”的内容,如一九三六年的年报中载有:“本年本处仍与本埠中国官厅合作努力,以制止共产党之在公共租界内活动,经控究之共党十八名,并发现共党活动根据地十三处,被告之经解送中国官厅讯办者共十名,抄获刊物五十二种,二万三千三百份。”这是帝国主义者镇压中国革命、迫害中国人民的自供状。他们经常将在租界里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逮捕之后交给中国反动政府处理。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就是在内外反动派的勾结下,从租界“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而被残杀的。但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却又要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的罪行。曾经长期担任工部局法律部主任的美国律师博良,无耻地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说:“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我们的手是干净的”,活现出一副阴险的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 侵略者的反革命别动队——万国商团

外国侵略者靠着武力攫取了对上海租界的殖民统治权力，他们又凭借着武力来维持和扩大这种殖民统治权。外滩六号大楼，曾是外国侵略者的反革命别动队——万国商团的驻所。提起万国商团，上海人民无不切齿痛恨。这支侵略者的反革命别动队的成立，就是以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己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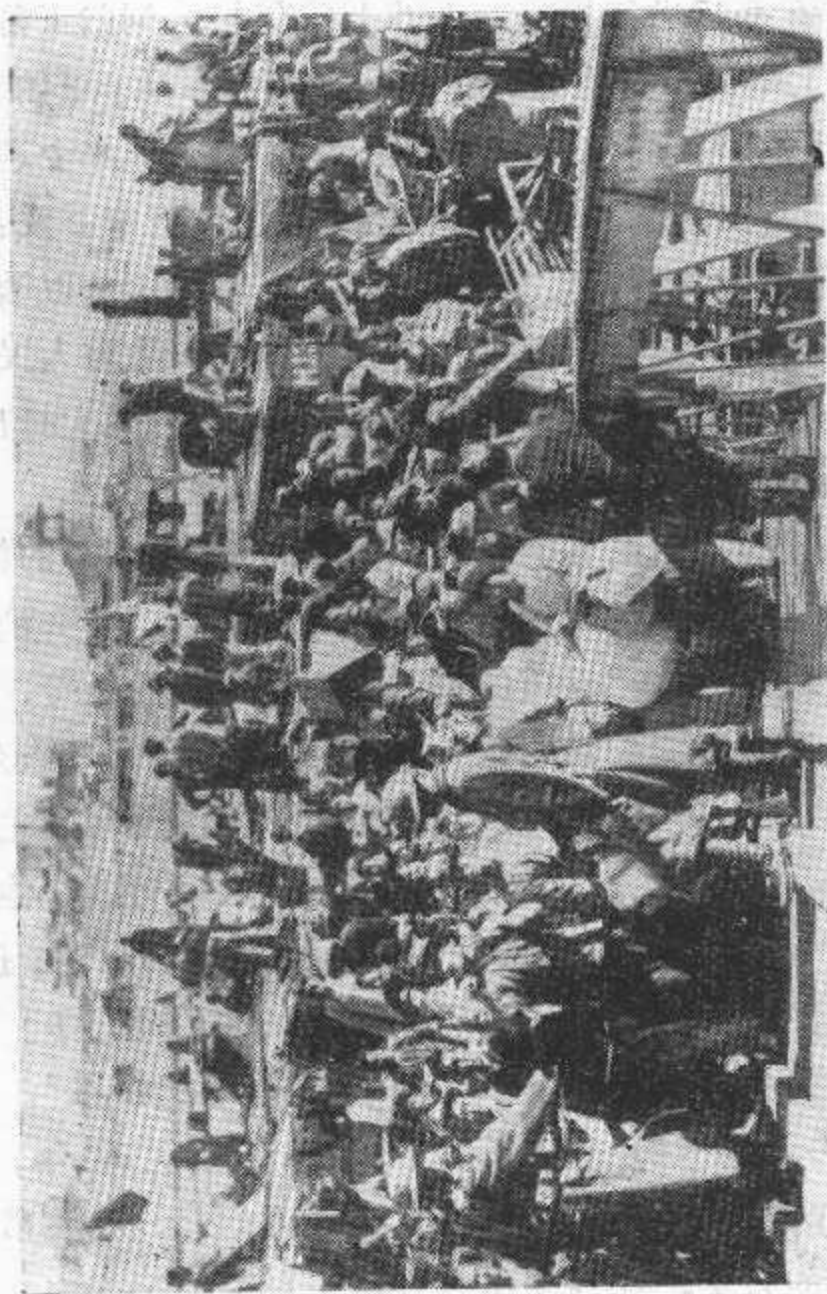
一八五三年三月，英勇的太平军攻下南京，接着又攻克镇江、扬州。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上海小刀会积极准备起义响应。大好的革命形势，使中外反动派惊恐万状。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为了阻挡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奔腾向前，同时乘机扩大侵略特权，于是荒谬地提出所谓上海“武装中立”，暗中又进行阴谋策划。四月八日，英、美、法三国领事秘密策划，决定建立“上海本埠义勇队”，把西方“侨民”编为队员，并由曾任英国驻印度孟加拉第二步兵团的上尉、镇压过印度人民的刽子手特朗生担任队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万国商团”的“甲队”。以后又陆续成立“乙队”、“上海轻骑队”、“上海重炮队”、“日本队”、“美国队”、“俄国队”等等。商团的人数直线上升。据统计，一八七九年有一八一人，到一九二七年已达二二三八人。经费也从最初每年白银几千两，增加到几十万两。商团初成立时，在南京路河南路一块空地上练习射击，这块地方也就叫“靶子场”。南京路上的跑马厅和市政厅里面的一个体育场，都是它经常进行操演的地方。商团每年还在跑马厅进行大规模的检阅，外国殖民者便借这个机会

炫耀他们的侵略武力，步队、骑队、炮队等列队在租界的几条主要马路上游行，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万国商团在成立之初，虽然名曰独立的机构，但实际上是由各国领事在幕后进行操纵。一八七〇年起，划归工部局管辖，成了由工部局总董直接指挥的一支殖民军队。正如《密勒氏报》所指出的：“租界实于万国商团、后备巡捕、水上巡捕之中，拥有其自身之海陆军”。一个商团头目也自我吹嘘说：“（商团）较之任何国常备军队，可无逊色”。万国商团是以镇压小刀会起义起家的，以后它几乎参与镇压每一次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在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商团总是大打出手，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国人民。

如果说万国商团的其他几支队伍还打着“义勇”的幌子，在形式上表示不是一种正规的专业的武装队伍，那么俄国队却清楚地表明是“常备”性质的军队。商团每年的经费，半数以上是用在常备性质的俄国队上的。这些老沙皇的残渣余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亡命来到上海，依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国土上，继续为非作歹，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每天走出外滩六号驻所，分头到码头、车站、路口去巡逻、搜查、监视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商团每年一度的报告中，总少不了记载俄国队的“成绩”。如一九三七年，它伙同捕房“弹压暴动十六次”；一九三八年，对爱国群众“围守搜查九十九次”等等。正因为如此，也就常常得到租界当局的夸奖。如商团司令官给工部局的报告中，说俄国队“操练程度甚佳”，“团员也踊跃参加”，“并于巷战及驱散暴动群众两项，特别注意”。这些可耻的记录，充分说明了这伙亡命之徒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是帝国主义的狗腿子、西





万国商团“俄国队”在外滩码头搜查中国旅客。



方百万富翁在上海利益的看门狗。

一九二五年的一张报纸上还有如下的一段报道：“六月五日夜十时十一时许，万国商团在南京路一带检查行人，继将沿途行人用枪刺指挥，编集入队，向老闸捕房驱之使行。凡经过马路，无论男女老幼，步行乘车，一概勒令入队。尔时见儿女号啼，惨不忍闻，被捕者霹雳一声，茫无所觉，及至捕房，查无违禁确据，即施行掌颊，驱逐而散，种种野蛮，全难尽述，华人身家性命，诚草芥不若也”。

类似这样的事，在租界里是层出不穷的。“中国人的性命不如一根草”，这就是帝国主义豺狼当道时租界的情况。总之，在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行无自由，睡不安宁，衣不暖体，食不饱腹。那时的外滩和南京路是殖民者的天下，冒险家的乐园，同时却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苦海。

### 三、中国人民不可侮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那些来到上海从事投机和掠夺的外国冒险家，正是列宁指出的理应受到中国人民憎恶的那种人。

哪里有压迫，有剥削，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有反侵略的革命运动。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在外滩和南京路上，中国人民反侵略爱国运动的步伐也前进在外滩和南京路上；外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枪炮声经常在外滩和南京路上轰鸣，中国人民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的怒吼声也不断地响彻外滩和南京路的上空。中国近代许多次革命斗争的风暴，就在这里爆发；更有许多次革命运动，虽然发生在别的地方，却在这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深刻的反应。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解放前外滩和南京路的历史也正是这样。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发生在外滩和南京路的抗暴斗争，大都是自发的和零星的。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因而难于展开有效的斗争。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上海人民的斗争也有了一种新的规模，关于“苏报案”的斗争和拒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它的代表人物也不可能给这些斗争以真正有力的领导。

早期上海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斗争，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一贯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 反对“过桥税”和“园规”

外国殖民者在上海霸占中国的土地，榨取中国的财力，利用中国的人力，开辟了马路，却不许中国人民自由通行，要通行得付“买路钱”；修建了桥梁，同样不许中国人自由经过，要经过得付“过桥税”；设立了公园，更压根儿不让中国人进入，违反了就要受到严厉处罚；许多大厦里的电梯，洋人乘用的，不许中国人用；甚至电车也分头等和三等，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这些冒险家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对中国人民强取豪夺，凌辱欺侮，极尽野蛮、横暴之能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国殖民者的歧视和欺侮，上海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斗争。反对外摆渡桥的“过桥税”和反抗外滩公园“园规”的斗争，就是早期上海人民进行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

在租界出现的最初几年，苏州河和黄浦江汇合处附近还没有架桥，只有几处渡口。在这些渡口当中，位于现在乍浦路

桥旁边的叫头摆渡，在江西路口的叫二摆渡，最东边的一处，也就是靠近现在外白渡桥的叫做外摆渡。在交通已是相当繁忙的地方依靠渡船过江是很不方便的。

一八五六年，一个叫韦尔斯的英国殖民者，纠集了几家英、美洋行的大班，从他们掠夺中国人民的庞大财富中拿出了很少的一部分钱，组织了个“苏州河桥梁公司”，在靠近外摆渡口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大木桥，外国人叫它“韦尔斯桥”，上海居民则称做外摆渡桥。

这伙冒险家建造这座桥梁的目的，当然丝毫不是为了便利中国居民来往，而是为了便于他们自己进行投机活动和加强殖民统治。原来当时黄浦江还没有经过浚治，深度不够，大一些的海轮，只能停泊在吴淞口外。船上带来的商情报告、报纸和函件等，须用快马从吴淞口沿着衣周塘堤岸（今军工路）送到外滩各个洋行。洋行就凭着这些新的情报去进行投机倒把，搜刮物资。在没有桥的时候，马跑得再快，到了江边也得等候摆渡。有了这座桥，快马飞驰而过，情报就能及早送到，洋行可以抢先下手。另外，当时英租界的人口多，地价高涨，而苏州河北岸的虹口一带的美租界，却因交通不便，市面比较冷落。有了这座桥，把南北两区连成一片，既可以加强租界的殖民统治，又可以抬高河北岸土地的价格，便利他们去进行土地投机，大发横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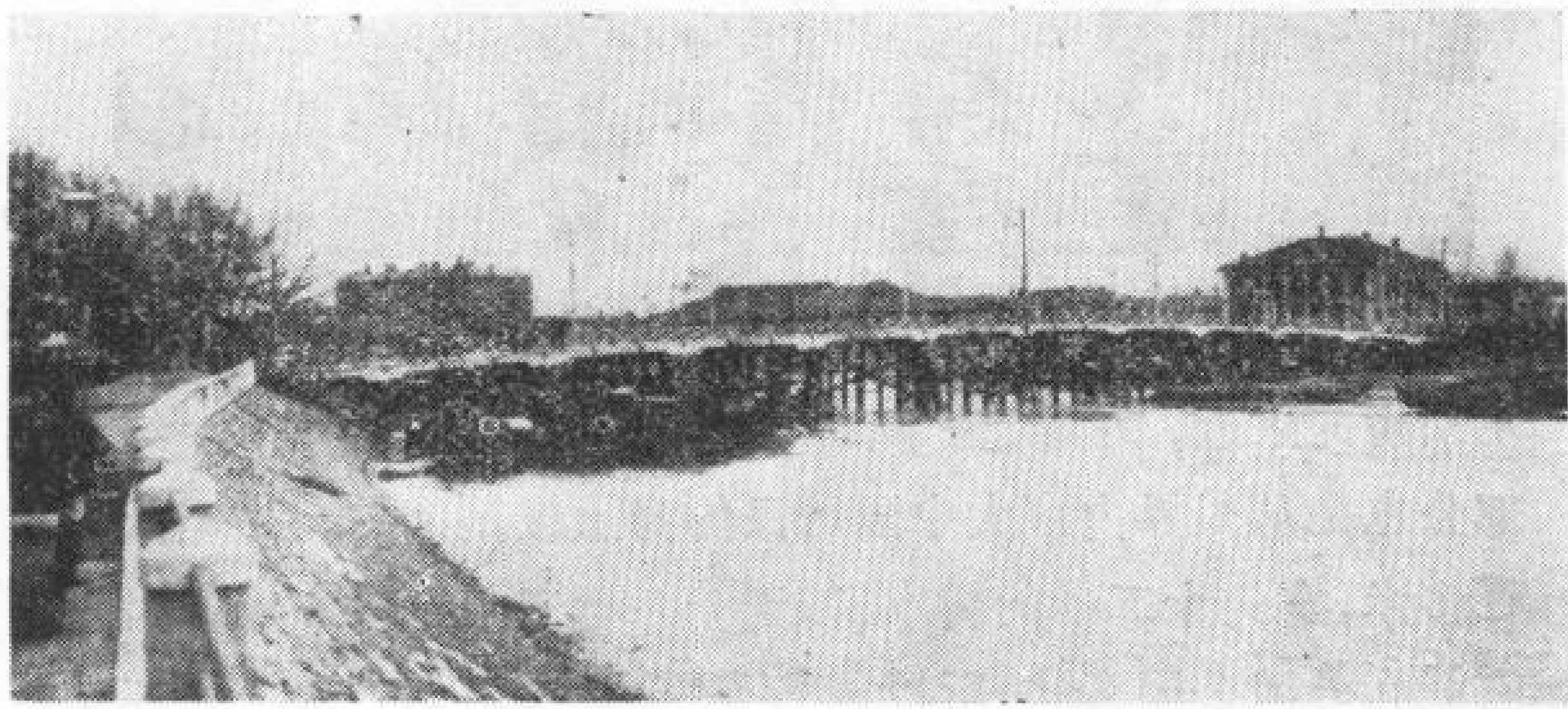
这伙吸血鬼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掠夺中国人民的机会。他们在苏州河上建造了这座木桥，也把它当作一种生财之道，对中国人民实行敲诈勒索，无理规定过桥的中国人每人每次须交制钱一文，车轿加倍，名曰“过桥税”。到一八六三年时，这种“过桥税”又增加一倍。这件事情使人们联想到“跑马

总会”的冒险家们修筑静安寺路时，也曾向过往的中国行人强索“买路钱”。他们在掠夺中国人民方面，无孔不入，无计不施。

被外国殖民者这种蛮横的掠夺和歧视所激怒了的上海人民，在这座桥建成以后，就一再表示反对。他们向英国领事和工部局提出严正的抗议：过桥为什么要纳税？韦尔斯有什么权利收税？为什么外国人过桥不付钱而单向中国人收税？群众坚决要求取消“过桥税”。不少人还在桥头对收税的殖民强盗当面进行斥责。

上海人民对“过桥税”不仅在口头或文字上提出抗议，还积极设法恢复渡船，不走那座要“买路钱”的桥。一八七二年七月初，有人在源远街（今盆汤弄）的一家茶叶店码头设立了两只渡船，义务接送往来行人。后来出现的“义渡船”有五艘之多。由于群众的坚决抵制，韦尔斯桥上出现了“桥头冷落行人稀”的景象。

这时，工部局看到群众愤怒的情绪无法遏制，才被迫在韦



一九〇六年前的外白渡桥。



上海民兵巡逻在外白渡桥上。

尔斯桥的附近，另造起一座桥，不用说，这笔建桥费用，绝大部分也是从租界内广大中国居民的身上搜刮来的。这座长一百多米，宽约十二米的新木桥，于一八七三年八月建成。因为它就在外滩公园旁边，所以定名为“公园桥”，但上海人民还是叫它“外摆渡桥”；因为从此过桥不再付钱，所以也叫做“外白

渡桥”。这就是外白渡桥这一名称的来历。

韦尔斯等殖民强盗看到他们那座桥不再是“奇货可居”，才在当年十月折价卖给了工部局，由工部局拆除。现今这座跨立在苏州河上的铁桥，是一九〇六年当新建木桥拆除后开始重建并在一九〇七年完成的。由此可见，外白渡桥的建立，是上海人民多年斗争的结果。

同这种掠夺性的“过桥税”相比，当年外滩公园颁布的侮辱中国人民的所谓“园规”，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帝国主义者狰狞和丑恶的面貌。这座公园的历史，同外白渡桥的历史一样，也充满着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殖民者歧视和侮辱的斗争。

跨过外白渡桥往南，紧邻桥堍，就是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这块地方原是由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泥沙冲积而成的一片河滩，面积三十余亩，是属于中国的“官地”。外国侵略者霸占外滩以后，想要在这里建立一所公园，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目光就落到这片河滩的土地上。一八六六年，他们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加以侵占，用作公园园址。他们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去的九千六百两白银，作为筹建公园的基金；又以低价雇用大批中国民工挖掘洋泾浜的河泥，来填实这块滩地，到一八六八年基本建成。

这年八月，这所由中国人民出钱出力，建筑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命名为“公花园”，并以“公益”为幌子，要求上海道台准予豁免钱粮。可是这个“公花园”只“公”之于外国殖民者，而根本不“公”之于中国人民。从公园开放之日起，工部局就派有武装巡捕把守大门，不许中国人民进入。有人经过这儿，偶尔探头向园里张望一下，也难免遭到看门巡捕的无理干涉，轻则恶声呵斥，重则棍打脚踢。



外国侵略者这种侮辱、歧视中国人民的野蛮行为，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一八八五年，“工部局公花园管理委员会”更蛮横地在公园门口竖起一块木牌，写上几条“园规”，其中竟公然规定：“狗与华人不得入内”！这块木牌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挑衅和侮辱，也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证！压抑不住心头怒火的中国人民，纷纷向工部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拆除这块侮辱中国人民的木牌，对群众开放公园。工部局的答复竟是：“在未经外侨表示意见时，未便以此特殊权利相允许”。中国人进自己土地上的公园，竟被说成是“特殊权利”，要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批准”，这真是十足的帝国主义强盗逻辑。

上海人民的斗争坚持不懈，工部局看到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转而采取一种阴险的欺骗手法，签发一些“华人游园证”，让少数经过他们选择的所谓“高等华人”（地主、买办资本家）



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园规。

进园。能领到这种游园证的人极少，而日子一久，工部局连这极少数的游园证也常常不发。

上海人民要求清政府据理力争，直接与英国领事交涉，立即取消侮辱中国人民的“园规”。一八八九年，他们联名写信给上海道台龚明璠，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们所以坚持入园，“非以其园风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后快，诚以其基址既属中国官地，其费又大半取诸华民捐税，而中国人民，反遭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于何等地位！”这封信再次表明了上海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

在群众的压力下，龚明璠会见英国领事，转达了上海人民的意见。英国领事把责任推给工部局。工部局则以已经签发“华人游园证”为理由，坚持不对广大上海人民开放，并蛮横地说：“公园之地，久已拨与外侨使用”。意思是说，公园土地是拨与外侨使用的，公园是否对中国人开放，应由他们作主，中国政府已无权过问。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见外国侵略者如此强横，竟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清政府交涉虽然失败，但是群众斗争情绪仍然高昂，不断口诛笔伐，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工部局看到形势不妙，害怕事态扩大，为了缓和群众的情绪，又要出另一个花招，着手在今四川中路和虎丘路之间苏州河南边的涨滩，另建一所公园，说是专供中国人使用。这个公园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建成，称作“新公园”，第二年又改称“华人公园”。它的面积很小，只有六亩二分多，布置也极简陋，根本不象个公园。

工部局的这种欺骗手法，当然蒙蔽不了广大群众的眼睛。上海人民认识到，同帝国主义者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是单纯



今天的黃浦公園。

的能不能游览的问题，而是有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肃斗争。别说提供一个根本不象样的什么“华人公园”，那怕再提供比它好过几倍的十个二十个，也不能丝毫削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上海人民继续坚持斗争下去。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急剧高涨的形势下，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拆除外滩公园侮辱中国人民木牌的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上海人民的长期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工部局派人偷偷地拆除了竖在公园门口的那块臭名昭著的木牌。

所谓“过桥税”和“园规”，只是外国侵略者压迫和欺侮中国人民无数血腥记录中的两件罪行；但通过它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帝国主义豺狼是如何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穷凶极恶！它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 小 车 工 抗 捐

外国侵略者不仅肆意强占中国人民的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利用他们所攫取到的侵略特权，向中国居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工部局在租界里征收的捐税多达五十多种，诸如小车捐、粪尿捐、巡捕捐、盐税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真是“自古未闻粪上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沉重的捐税，压得中国劳动人民透不过气来。因此，上海人民曾多次开展反对租界当局横征暴敛，任意增加苛捐杂税的斗争。特别是小车工人，由于工部局一次次增收捐税，反

抗更加激烈。在十九世纪后期，小车工人掀起过多次的抗捐斗争。规模较大的是一八八四年和一八九七年的两次斗争。

小车俗名“江北车”，又叫“羊角车”，是一种独轮的车子。既可载货，又可载人，是上海早期的重要交通工具。小车工人多半来自破产的农村，生活十分困苦，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要推车。小车工人的收入本来就很不固定，一天没人雇车，一天生活就没有着落，再加上苛捐杂税，生活就更加困苦了。连当时清政府的地方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小车工人的处境“情同乞丐，形若马牛，辛苦终朝，仅能糊口”。但是，那些外国侵略者对如此贫困的小车工人也不肯轻易放过，要他们缴纳“执照税”，才准许在租界通行，甚至多次用“加捐”的办法，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搜刮，使小车工人更加无法生活下去。这样就必然激起小车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抗捐斗争。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报上就有小车工人零星抗捐斗争的报道，后来规模日益扩大。一八八四年四月初，由于抗议租界殖民当局新的加捐，小车工人又一次开展英勇斗争。这月的初二早上，平日往来运输繁忙的小车不见了，一群群小车工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京路上来。到了八点钟，大约有三百多人聚集在会审公廨的门前，要求取消加捐。后来愈集愈多，会审公廨职员和洋陪审官惊恐万分，他们用拖延和欺骗的手法混过了这一天。到了第二天，斗争的规模更大了。有二千多小车工人再次拥到会审公廨门前。抗议加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有的地方由于巡捕出来干涉和镇压，更加火上加油，愤怒的群众随手拾起地上的石块砖头，掷向捕头，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狼狈不堪。这时，外国侵略者更加惊慌，赶忙命令停泊在黄浦江的两艘舰艇上的海军陆战队，作好登陆镇压群众

的准备。但在群众坚持斗争下，外国侵略者不得不暂时取消加捐。

过了不久，小车捐又年复一年地增加。到了一八九七年三月，工部局宣布从四月一日起将车捐从每辆四百文，增加到六百三十文，一次就加捐百分之五十以上。一次规模更大的小车工人抗捐斗争爆发了。

小车工人相互约定，到了工部局规定的加捐日子，大家一起罢工。从四月一日起，租界里又不大见到小车的踪迹了；偶尔有一、二辆小车推行，工人们就上前劝阻。工部局派出巡捕，四出镇压，将劝阻别人推车的工人，加以逮捕，送往会审公廨。接连几天，被捕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被判管押，有的被判“荷枷示众”。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工部局巡捕的镇压不仅吓不倒小车工人，反而使斗争的规模更大了。从苏州河北一直到洋泾浜，到处都有小车工人在进行斗争。四日这天，有几百名小车工人在外滩把巡捕团团围住，吓得巡捕狼狈逃窜。到了第二天，为了抗议巡捕的镇压，更多的小车工人行动起来了。十点钟光景，租界里聚集了好几千人，愤怒的抗议声此起彼伏。这时，惊慌失措的殖民当局使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巡捕房里的马巡出动了，一个个外国巡捕骑着高头大马，手里高举砍刀，朝人群里直冲过来。他们飞刀乱砍，使许多小车工人受伤。群众更加愤怒，纷纷举起手里的杠棒扁担，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进行自卫反击。在“打！”“打！”的喊叫声中，侵略者被打得人仰马翻，外滩一带外国洋行银行的门窗、屋瓦，也打了个稀巴烂。一个印度马巡挥刀要砍罢工工人，被工人们的杠棒一挡，只听见“吭当”一声，刀已落地，罢工群众随手拾起，



将刀向印捕砍去。就这样坚持斗争了两个小时。巡捕招架不住，鸣钟告警，万国商团出动了，停泊在黄浦江里的外国军舰，开炮威胁，外国水兵分两路上岸，在侵略者反革命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小车工人才分散开来。

在小车工人的英勇斗争下，外国侵略者于五日晚上聚集外滩商议，宣布暂缓三月，至七月一日再行加捐。这虽然是侵略者的缓兵之计，然而小车工人给予殖民者的狠狠打击，连那些冒险家自己也惊呼“西人占领上海五十年来建立的威望已一扫而空”。

## 苏 报 案

一九〇三年六月在上海发生的“苏报案”，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对中国革命的公开镇压。它赤裸裸地暴露了会审公廨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工具的性质。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是当时中国日趋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苏报案的背景是这样的：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由于清政府媚外卖国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嘴脸日益暴露，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日趋激烈，宣传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种情形在上海有着明显的反映。

一九〇二年三月间，蔡元培、章炳麟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名人士，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以办教育作掩护，暗中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十一月，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



压制言论自由，大批退学。中国教育会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设立了爱国学社，接纳这批青年入学。第二年四月，一部分从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来到上海，也参加了爱国学社。这些感情奔放、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不但在学校里“议论时局，无所顾忌”，并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假地张园，每周开会演说，“昌言革命”，宣传爱国反清斗争。每当演说者“述及(清)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往往“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张园在静安寺路西端(今南京西路泰兴路口)，又叫“味莼园”。人们在谈到上海的历史时，还不时提到它的名字。这不是由于张园的风景优美，如当时所传“海天胜景让张园”，而是因为园内有一个叫做“安恺第”的大厅，当时住在上海的爱国人士和革命党人，经常在那里集会演说，所以远近闻名，张园的名字也就流传下来了。

这时在上海出版的《苏报》，也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制造革命舆论的阵地。苏报馆设在汉口路，系落职知县陈范所办，起初宣传改良变法，后来在爱国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支持爱国青年的造反活动，逐渐倾向革命。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就利用《苏报》作为宣传阵地，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激昂的言论，同张园的爱国集会相呼应，影响及于东南地区。

清政府对这些革命活动，早就想加以镇压，但因《苏报》和爱国学社都设在租界里，他们还没有同帝国主义者串通好，一时未能下手。一九〇三年五月，青年爱国者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这是一篇揭出革命大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旧世界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檄文。它文笔泼辣，感情充沛。它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反对外来干涉、全国人民一律平等、建

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卖国的清政府，再去扫荡那蹂躏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这本书出版后，“上海市上，人人争购”，对当时社会有如投掷了一颗巨型的精神炸弹，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报》在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了邹容所写《革命军·自序》；接着又于六月九日，发表了两篇文章：《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指明革命的目的，在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专制之策”；推荐《革命军》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要求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摘要刊登了章炳麟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这个保皇党头子的谬论，直呼光绪皇帝载湉为“小丑”。

清政府对这些革命言论感到异常惊恐，更把《苏报》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加紧策划进行迫害。他们以“故意污蔑今上，挑诋政府”，“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由，要上海道台袁树勋赶快和租界工部局相勾结，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有关人员。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派了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上海协助。帝国主义者对租界里的革命活动也同样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和袁树勋、俞明震经过了一番密谋，便由当时所谓“领袖领事”美帝国主义分子古纳签署拘票，交会审公廨办案。六月二十九日，巡捕先到苏报馆捉人。当时风声传出，有人劝章炳麟逃走，章不肯，表示说：“志在流血，焉用逃为？！”第二天，巡捕、警察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捉拿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章炳麟慷慨回答：“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当即被扣上手铐逮走。邹容表示与章“生死与共”，七月一日自动到捕房投案。除章炳麟、邹容外，还有同《苏报》有关的四个人也被捕去。七月七日，

《苏报》被查封，产业被没收。

章炳麟、邹容被押禁会审公廨后，清政府便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活动，要求引渡，把章炳麟、邹容解往南京，“尽情惩治”。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在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在如何处理案件的问题上也有矛盾，租界当局坚持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蛮横地说“此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拒绝引渡。七月十五日，工部局指使会审公廨公然组织“额外公堂”，对章炳麟、邹容等进行审讯。章炳麟、邹容的辩护人当堂质问会审官员：“这个案子的原告是谁？”会审官回答说是清政府。章炳麟讲话时，义正词严，“会审委员无以难之。英领事以拳击桌，禁止其发言”。试看，清政府当原告，章炳麟、邹容当被告，政府和私人打官司，却由名义上是清政府的地方法庭来处理，并由帝国主义者“陪审”——实际上是主持审判，这岂非咄咄怪事！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奴才身份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主权的肆意破坏。

经过多次会审，清政府极力想把章炳麟、邹容弄到手，又由外务部向各国驻华公使交涉，仍无结果。十二月廿四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悍然宣判：章炳麟、邹容“谋为不轨”，定为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

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者镇压爱国者的无耻罪行，表示极大愤慨。舆论界指出，清政府“向所属下级法庭控告平民之举，殊于国体有碍。”“章、邹永系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属不合”。广大群众更谴责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反对会审公廨的无理判决，要求注销控案。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九〇四年五月廿一日，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均罚作苦工，期满“逐出租界”。

章炳麟、邹容在狱中备受虐待。邹容被折磨生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死于狱中。死时口吐鲜血，人们怀疑是被帝国主义者毒死的。两天后，中国教育会在愚园召开了邹容追悼大会。一年以后，华泾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和中国、健行两公学的部分学生，又在塔前举行了纪念仪式。对死难烈士的悼念，扩大了革命影响，表示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抗议。

国内外反动派满以为查封了《苏报》，监禁了《革命军》的作者，就可以禁绝革命思想的传播。事实却恰恰相反，革命的书刊越被查禁，看的人就越多。《苏报》被封不久，在上海又出刊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规模比《苏报》还大；《革命军》也冲破反动派的重重禁网，风行全国，并流传到海外。而中国革命的车轮更是滚滚向前，在苏报案发生后八年，就爆发了“革帝国主义的命”的辛亥革命，把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拒俄”抗暴

一九〇三年夏初，即在苏报案发生的前夕，上海各界人民在静安寺路的张园，举行了一次爱国集会，叫做“拒俄大会”。这次遍及国内各大城市、并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是由老沙皇蛮横地侵占中国东北国土而引起的。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不仅派遣军队参加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八国联军”，而且乘机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一九〇二年四月，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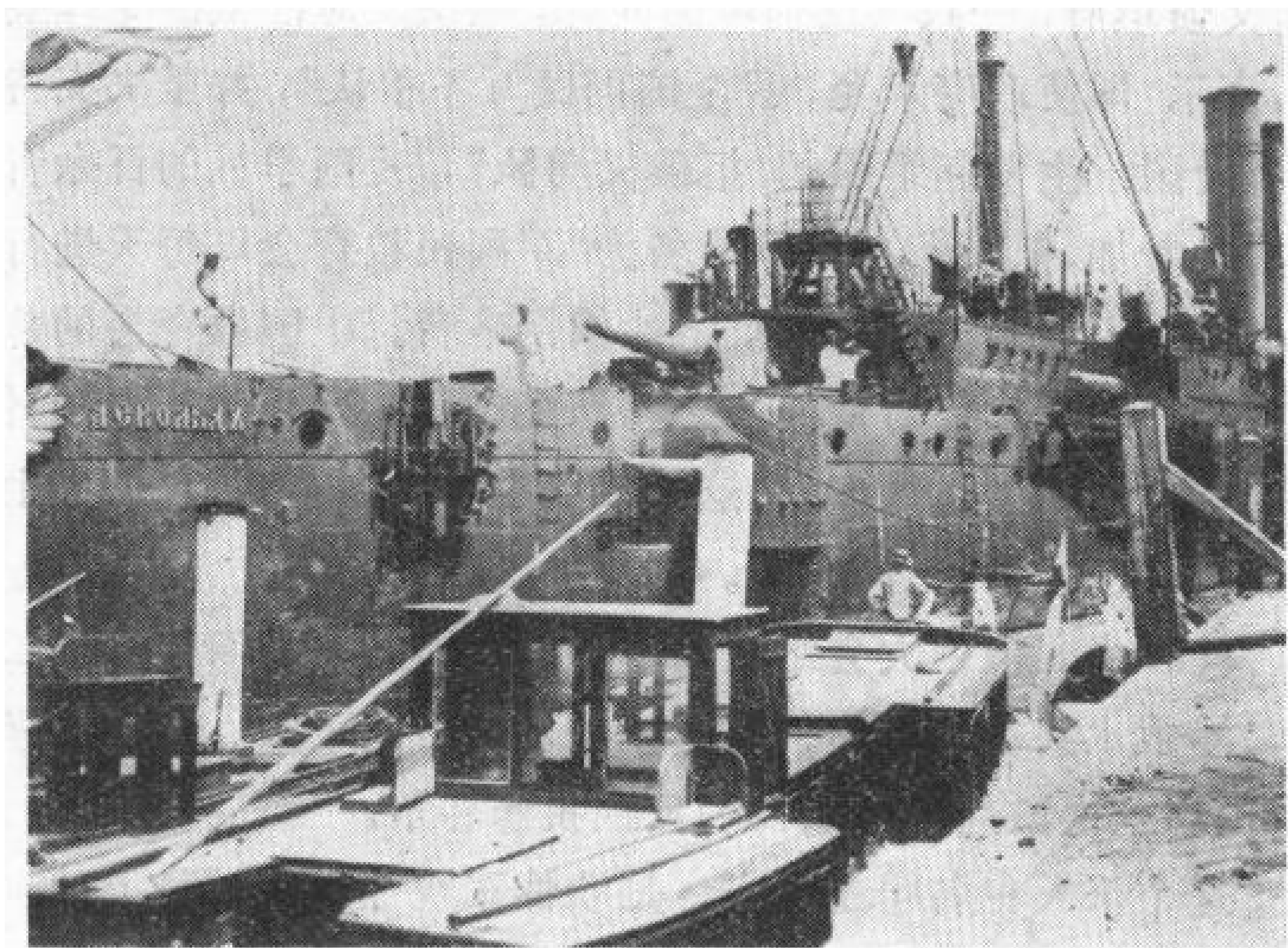
俄同清政府签订条约,答应分期将军队撤走。但事后,沙俄却一再违约,拒不撤兵。一九〇三年四月,沙俄第二期撤兵期限已满,它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旨在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无理要求。沙俄这种蛮横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各地激起了风起云涌的“拒俄”运动。四月二十七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等爱国团体,在张园召开了拒俄大会。与会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决议通电国内外,坚决反对沙俄的无理要求,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并坚决支持留日爱国学生发起组织的“拒俄义勇队”,爱国学社的百余青年报名参加,把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开赴边疆,抗击沙俄侵略者。中国教育会的部分成员,还组织了“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日刊》,号召全国,一致抵御沙俄侵略。这种报纸也发行到内地,对扩大拒俄宣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就在张园拒俄大会之后的下一年,即一九〇四年的十二月,沙俄水兵在南京路外滩又无故杀害中国工人。这一血腥暴行,再一次激起上海人民的反俄抗暴斗争。

这个杀人犯名叫亚其夫,是沙俄军舰“阿斯科”号上的水兵。这艘沙俄军舰是怎样开到上海来的呢?

原来在一九〇四年二月间,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东北亚的霸权,爆发了一场大厮杀——日俄战争。八月间,日、俄舰队在旅顺口外交战,沙俄舰队惨败,“阿斯科”号和另一艘俄舰“格罗苏福意”号逃来上海,借口修理,赖着不走。清政府几经交涉,俄舰才勉强解除了武装。但舰上士兵却自由行动,经常离舰外出游荡闹事。有一天,亚其夫和另一名水兵地亚克乘人力车到南京路外滩,下车后,不

付车钱，反而动手打人，过路行人感到气愤，都围上来和他们讲理。亚其夫兽性大发，竟夺过路旁工人手中铁斧，向人群乱砍，当场砍死工人周生友。在场群众当即将亚其夫及另一帮凶揪送租界巡捕房。捕房是帝国主义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自然偏袒沙俄水兵，马上将这两人转送沙俄领事馆。当天晚上，沙俄领事阔雷明就将亚其夫等释放回舰。



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沙俄军舰“阿斯科”号。

被解除了武装并在中国政府“保护”下的沙俄水兵，竟敢随意杀害中国人民而不受惩处，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义愤。群众纷纷督促上海道台袁树勋，叫他要求沙俄领事交出凶手，依法惩处。但沙俄领事却蛮横地借口所谓领事裁判权，拒绝交出凶手。清政府外务部在群众压力下也向沙俄公使提出抗议，沙俄公使竟气势汹汹地答复说：奉沙皇指示，在

上海的俄国军舰，即使是解除了武装，仍然照条约享有各种特权。这种强盗口吻十足地表现了老沙皇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蛮横态度。清政府不敢得罪沙俄，转托上海领事团头子古纳（就是那个在苏报案中力主捉人和查封报馆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出面，要求沙俄领事同意将案件由“华俄会审”。但沙俄领事却仍然不同意，一直拖到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三日，才悍然宣布由“俄方开审，华方观审”。上海人民对沙俄的蛮横和清政府的媚外，更加忍无可忍，积极酝酿罢工、罢市，进一步开展反俄抗暴斗争。在沙俄领事玩弄“开审”骗局后的第二天，群众数千人聚集在法租界的“四明公所”门前，决定前往沙俄领事馆勒令沙俄领事交出杀人凶犯。一些商号也宣布停止使用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钞票，以示抵制。群众的正义行动，吓坏了国内外反动派，上海道台连忙出面干涉，法租界当局也出动大批巡捕，赶往现场，使用暴力把群众驱散。

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它却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后来，沙俄领事阔雷明接受上海道台袁树勋的暗示，尽快使“阿斯科”号等俄国军舰驶离上海，让杀人凶手亚其夫逃回俄国。这一事件是老沙皇侵略中国无数罪行中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 大闹会审公廨

当年在上海流传的所谓“大闹会审公廨”，是指一九〇五年以“黎黄氏案”为导火线而引起的群众包围会审公廨和捕



房，维护司法主权的一场斗争，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在南京路上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有一个四川已故官员黎某的妻子，即黎黄氏，乘长江班轮来沪，准备回广东原籍。工部局捕房将她拘捕，以“犯拐骗罪”，向会审公廨提出控告。中国狱员关炯之、金绍成与“洋陪审官”英国副领事德为门负责审讯。关炯之认为此案证据不足，准备按照惯例将黎黄氏暂时押在公廨女所候讯；德为门却命令捕头将黎黄氏带回捕房，关押“西牢”。双方发生了争执。因为会审公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司法机构，所以把“犯人”押在公廨还是押在捕房的“西牢”，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由于公廨在形式上还和中国政府维持着一点关系，英国副领事以“陪审”的身份，擅自决定把“人犯”从公廨改押捕房，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在租界里的司法权的最后一点痕迹，也要加以消除。德为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当堂咆哮：“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巡捕也仗势逞强，殴打了会审公廨的差役和观审的中国人，最后冲开大门，将人犯装入囚车带往捕房。

上海各界人民，从九日开始，纷纷集会，酝酿罢工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上海广肇公所召开了群众大会，对黎黄氏表示声援，商务公所也集会决议，要求撤换德为门等。上海道台在群众压力下，决定公廨停讯，并提出撤换德为门、斥革捕头木突生，以及撤回在公廨监视的巡捕等要求。但帝国主义者拒不接受，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仍无结果。十八日，长期积压在上海人民心头的反侵略怒火又一次迸发出来了。早晨，南京路一带的店门紧闭，宣告罢市。上午九时，许多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周围和工部局市政厅的门前，举行示威。凶



愤怒的群众冲向会审公廨。

狠的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放排枪，当场打死三人，打伤多人。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冲突和死伤。总计这一天当中，中国群众被打死十一人，打伤二十多人。在这次抗议斗争中，愤怒的群众随手拾起地上的砖瓦石块进行回击，将巡捕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还放火烧捕房，并向工部局发起了攻击。

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如临大敌，不仅出动万国商团，而且派海军陆战队从外滩登陆，向示威群众开枪扫射，胡乱抓人，进行残酷镇压。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罢市集会仍然继续了好几天。

## 四、疯狂的地产投机

上海开辟成为通商口岸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者相继闯了进来。这伙冒险家怀着大发横财的欲望，施展各种奸诈的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残酷掠夺。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产投机，是一条迅速发财致富的捷径。

冒险家投机的目标，首先集中在黄浦江边外滩这片土地上，他们强取豪夺，风靡一时，规模越来越大。随着地产投机狂热的增长，外滩和南京路也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正是建筑在广大中国人民被剥夺被压榨的基础之上的。

### 狠毒奸刁的“地皮虫”

一个英国冒险家曾这样说过：“我的事情是抓紧时间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和建造房屋租给他们，以获取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好处，如果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顶好办法。我希望至多在两三年里，能发一笔大财，从此走开；此后上海之化为灰烬或沉入海底，都与我何干？”这种赤裸裸的无耻的自白，十分典型地暴露了这一伙心毒手辣的冒险家的肮脏的灵魂。这些家伙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要“抓紧时机发财”，而发财的“顶好办法”则是搞地产投机。他又说：“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他所

说的“合法范围”的“法”，自然是指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所谓《地皮章程》。这个“章程”对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土地非常有用。所以那个叫做费唐<sup>①</sup>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在他那份《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的报告书》中，赞不绝口地说：“地产章程规定之地产权制度，为造成上海之财富及兴盛（按：应读为殖民者的财富及地产投机的兴盛），而使为工商业中心之一种重要原素”。外国殖民者就是仗着这种种特权在上海，在外滩和南京路（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是一样）任意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干尽了一切坏事。

旧上海的地产投机是外国侵略者建立起来的殖民制度的产物。在地产投机的活动方面，租界当局同冒险家们总是配合得十分紧密的。如工部局规定租界内空地不纳税。目的就是为便利那些冒险家占有大量土地，垄断居奇，任意抬高地价，进行投机倒把。又如冒险家在租界以外进行土地掠夺，往往成为工部局要求扩张租界和越界筑路的先声；工部局把路筑到那里，外国冒险家的土地掠夺也就到达那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工部局实际上是那些大冒险家的御用工具。

会审公廨也是他们进行土地掠夺和地产投机的重要工具。“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租界的“洋衙门”当然也不例外，它对中国人民来说，首先还加上一层民族压迫。外国冒险家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时，动辄以“打外国官司”、“坐西牢”相威胁。有个叫“高易公馆”的“工部局捕房律师事务所”，就是靠玩弄这一套敲诈手段发迹起来的。而如果真的

---

<sup>①</sup> 费唐，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曾长期在南非联邦任职，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效劳，一九三〇年，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聘请”，到上海“研究公共租界问题”，为帝国主义者永久霸占中国土地和维护租界的殖民统治制造法律“根据”。

把事情弄到了会审公廨，它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去满足地产投机者的贪婪欲望。

外国冒险家凭借着上述的种种特权，勾结清政府大小官吏，对中国农民进行讹诈、恐吓、迫害，强占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小块土地，使他们流离失所，以致家破人亡。处于租界中心的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土地，自然成为冒险家争先掠夺的目标。在《地皮章程》公布后的六、七年间，外滩的土地就被最早来到上海的那伙冒险家们抢先霸占了去。到一八六一年时，今南京东路两旁的土地也被掠夺一空了。一八九九年，英、美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同意把公共租界的西线由西藏路扩展到静安寺附近。这时，静安寺路也掀起了地产投机的狂潮。一些冒险家事先就从工部局方面晓得了租界要向西扩展的侵略意图，便争先恐后地抢占那一带的土地；等划进租界以后，那一带的地价迅速上涨，每亩从原先的几百两白银涨到几千两以至一万多两。众多的中国人民失去了土地，少数的冒险家却在一转眼之间发了大财。

冒险家们掠夺到大片土地后，在上面建造起一幢幢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的建筑，不知凝聚着多少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洋泾浜一带和南京路上建造了许多简陋的里弄房子，以惊人的高价出租给中国人民。据估计，哈同一家的房客就有十多万人，相当于一个普通城市的全部居民。他们从这里又不知搜刮去多少中国人民的脂膏！

解放前，上海的房产有百分之九十集中于这一伙人和少数中国官僚买办手中，仅沙逊和另一家英国业广地产公司就各占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房屋。由于房屋被垄断，付不起昂贵房租的中国劳动人民，就被挤到小得象鸽笼一样的棚户里

去。旧上海有十八万家棚户，居住着近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他们也都是地产投机的直接受害者。

在冒险家的垄断和操纵下，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地价比一切飞涨的物价还上涨得快。在一八六〇年，那里每亩土地约值白银六十两；到一八八二年，有的每亩已上涨到二千七百五十两；到一九二七年，有的竟上涨到二十万两。六十七年间，上涨了三千三百余倍。这笔惊人的利润，连同惊人的房租剥削，都一起流到外国侵略者的钱袋里去了。

在旧上海，外国洋行公司大班们的活动，几乎都同地产投机事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些人则是专靠经营这种勾当发迹的。在这一伙冒险家中，臭名昭著，为人们所特别憎恨的有沙逊洋行的大班维克多·沙逊和哈同洋行大班欧司爱·哈同。

## 房地产大王——沙逊

维克多·沙逊，英籍犹太人，是旧上海有名的房地产大王。他是英国新沙逊洋行的第三代大班。

新沙逊洋行的总行设在印度的孟买。上海的分行开设于一八七二年。在新沙逊洋行开设之前，上海已有一家沙逊洋行，也是沙逊家族开的，但这两家洋行在经济上却不相关。为了区别这两家洋行，人们把先前那家称为老沙逊洋行。从这两家洋行对旧上海的影响来看，新沙逊远远超过老沙逊。

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代大班意地·沙逊和第二代大班雅各·沙逊，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他们在经营这种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每年将从中国掠夺去的血腥钱汇往印度孟买总

公司。新沙逊洋行在此期间也把贪婪的魔爪伸向上海的地产。它于一八七七年以规银<sup>①</sup>八万两买进今和平大厦的地基，取名“汉特产业”。其后又继续在南京路及上海其他各处，掠夺到大量土地；到一九〇〇年，已占有房地产二十九处，共计面积达三百六十四亩零四分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拥有地产数量最多的就是这个沙逊家族。

维克多·沙逊在一九二〇年掌握了沙逊家族的全部财产。他于一九二三年第一次来上海后，立即看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因为上海既是个不收财产税的口岸，又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财政金融中心，英国当时在这里又有很大的势力。他根据这些条件，便决定把掠夺到的资金大部留在上海作为进一步从事冒险活动的赌注。

在这个大冒险家的主持下，新沙逊洋行的地产投机事业，达到了更大的规模。沙逊利用机会，通过投资安利洋行，同该洋行的大班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建立了合伙关系。安诺德当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同沙逊合伙后，便成为沙逊在工部局里的代理人。沙逊依仗这股势力，组织了华懋地产公司，发行股票及公司债券，从事房地产投机。他还拥有上海地产投资公司、远东营业公司、东方地产公司等子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产垄断集团，在上海房地产投机活动中占着首要地位，具有左右市场的势力。

这个大冒险家用抬高地价、抬高地租、抬高房租的“三高”政策，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沙逊利用那些名义上各自独立的子公司，操纵地产市场，由这个公司抛出，由那个公司买进。虚虚实实，翻云覆雨，哄抬

<sup>①</sup> 规银，亦称九八规元。一九三三年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



地价。等地价哄抬到高峰时，他就急忙把先前用低价购进的一批土地，以高价售出，从中攫取暴利。如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期间，沙逊利用这种鬼蜮伎俩，一口气就抛出了十四处房地产，共得银一千四百万两。其中一处是金陵东路卜邻里，售价每亩一百四十三万两，为当年工部局征税估价每亩四万七千两的三十倍，比一般市价每亩十万两还高出十四倍。

沙逊为了增加剥削和招摇撞骗的本钱，还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翻建高楼大厦，极力向高空发展。他首先翻建的是南京东路外滩的沙逊大厦。这个大厦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动工，花了三年多时间方才建成。它是外滩最早兴建的一座高楼。这座以沙逊本人臭名命名的大厦，一部分作新沙逊洋行的行址，一部分开设华懋饭店。饭店里搞了很多花样，以迎合来到上海从事掠夺事业的各国冒险家寻欢作乐的需要。旧社会的投机家，往往依靠房子的外表作为招摇撞骗的本钱，因此华懋饭店也受到中国的买办、官僚、豪绅、地主和富商们的欢迎，许多人纷纷前往长期租住，以示阔气。

沙逊大厦的建成也提高了沙逊的身价，据说沙逊初到上海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自从和工部局总董安诺德搭上关系，又兴建了这座大厦后，沙逊变成了上海的风云一时的人物，新沙逊洋行的地位也随之大为提高。这个大冒险家尝到了翻建高楼大厦的甜头后，在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间，他陆续翻建了一批大厦，如河滨大楼、都城大厦、汉弥登大厦等。这些大厦同样也是建筑在中国人民的尸骨堆上的。

沙逊不仅自己翻建大厦，还把土地出租给别人造屋。他一方面索取高额地租，同时还规定房屋图样、造价和材料规格，规定到期后连土地带房屋都无条件地收归他有。南京路

上的劝工大楼（今大庆电讯器材商店店址）、淮海路上的国泰大戏院（今人民电影院）、以及部分新式里弄产业，就是被他用这种手段弄到手的。在确定出租劝工大楼的地基时，新沙逊洋行的一个经理在一份报告中说到：“所议如果实现，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可以有一所崭新和具有各种设备的大房子，来代替现在的破屋，自己不花一个钱；第二可以在这一项产业里长期收取可靠的固定的租金，有适当的担保；第三修理保养费由承租人负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沙逊的剥削手段是多么奸刁！

出租房屋，勒索高额房租，也是沙逊的一种重要剥削手段，是他庞大财富的又一个来源。以一九二六年为例，这一年，沙逊从分布在南京路等地的十二处里弄房屋，就收到房租五十七万九千零四十八元。他对于一些出租的破旧里弄房屋，不仅不修理，还丧尽天良地盼着它失火烧掉。因为他把这些破房子都向保险公司保了重险，一场火烧了，他就可以捞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保险费，还可以在废墟上翻建新屋，以便猎取更高的房租；或者干脆把地皮租出去，让别人替他造屋。比如，他在福州路合兴里的房子烧掉以后，保险公司赔了五万三千多两银子，他除用这笔赔款翻建新屋外，还净赚三万二千多两。又如他在兆桂里的一部分房子烧掉后，实得保险费七千四百多两银子，再由原承租人建造新屋，十年以后，房子土地全部又归他所有。至于一场火灾，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对这个人面兽心的沙逊说来，当然是丝毫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沙逊一方面极力剥削，另一方面又穷奢极欲，尽情挥霍。他一个人住在华懋饭店最高一层，即“金字塔”顶下的那套大

房间里,还感到不足,又在沪西虹桥路建造了一座占地六十余亩的别墅,连他养马的马房里都有暖气设备,夏天还把马运到青岛避暑。这个大冒险家的剥削生活就是这样的敲骨吸髓,挥金如土。

## 大吸血鬼——哈同

矗立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那座大厦——上海展览馆,它的旧址,在解放前曾经是上海一个最大的私人花园,名叫爱俪园。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塘,据说是仿照《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设计的。这座占地一百七十一亩的大花园的窃据者,是和沙逊齐名的大冒险家欧司爱·哈同。

哈同也是英籍犹太人,他于一八七二年来上海,最初在老沙逊洋行当一名小职员,也有说是看门的,后来又转入新沙逊洋行。他因经营鸦片走私得力,取得沙逊家族的信任,逐渐被提升为高级职员,直至“助理”的职位。他在两家沙逊洋行共混了二十七年,在他们的地产部里受到训练,取得了干这项投机事业的初步经验。同时,由于他依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又同一些中国的军阀官僚勾结,于是很快发迹起来。到一八八七年,他就当上了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从一八九七年起,又当上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英国领事馆还任命他为英国“驻华法庭”的陪审员。一九〇一年他抛下沙逊洋行合伙人的身份,另立门户,独资开办了哈同洋行,放手大搞地产投机勾当。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同在南京路上占有的房地产,在数量上就超过了沙逊而居首位(在整个上海范围内,沙逊占有的地产仍然是最多的)。南京路两旁的大楼、里弄,凡是以

“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慈昌里”、“慈丰里”、“慈永里”……等等，都曾是哈同霸占的产业。这个大冒险家在上海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五十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死去时，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据当时英国领事馆估计约值四百万英镑，折合当时中国币值一亿三千万左右。哈同死后，他的忠实奴仆在为他编的所谓《荣哀录》中，吹捧哈同如何“长袖善舞”，如何“习勤安俭”，这些当然都是胡说八道。就在这时候，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申报》上载有一篇文章，揭出了哈同的老底。文章说：“哈同初到沪时，仅为沙逊洋行司阍（看门的人）之役，厥后与行主合营‘土’和买‘土’，其致富始终得力于‘土’”。前一个“土”指的是烟土（鸦片），后一个“土”指的是地土。的确，哈同庞大的财富的来源，也象沙逊家族一样，前半段得力于贩烟土，后半段得力于刮地皮——地产投机。

这个靠两“土”起家的哈同在生活上也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到了极点。他单在“爱俪园”里就雇用了二百多个中国人服侍他和他的臭老婆罗迦陵。罗迦陵在园内的饮食起居，都仿效清朝慈禧太后和《红楼梦》里的贾母。一九四〇年罗迦陵死时，仅丧仪费就用去四十多万元。按当时物价计算，相当于大米八千石，可供三千五百人吃一年。

哈同掠夺中国人民土地的手段十分毒辣。他依仗着帝国主义的领事裁判权，以英国“驻华法庭”陪审官的身份，勾结“捕房律师事务所”，强行霸占中国人民的土地。如果对方不肯出售土地或者不同意哈同出的低价，他便先设法买下四周的土地，把当中的一块地方堵死，变成“死地”，逼着业主出卖。如果业主仍想抗拒，他就以打官司相威胁。“爱俪园”那块地

皮就是被哈同这样霸占去的。一九〇九年，发了横财后追求享乐的哈同，想在静安寺附近建造一座花园。当时那里有一座占地十多亩的德国侵略者的兵营，四周都是中国农民的田地或坟地。他讨好地给德国侵略者一笔数目很可观的钱，买下了兵营的地皮；而对中国农民的土地，则摆出一副洋大人的面孔，勾结当地地保和地产掮客，强迫农民以每亩六百两的价格出售。当时，上海土地的价格，在南京路要数千两一亩，最高达万两；静安寺路每亩也得一千两。黑心肠的哈同，却只出六百两，业主不肯卖，哈同就叫“捕房律师事务所”的黑律师先去威胁那些土地座落在两边的农民，恐吓他们如果坚持不卖的话，要吃“外国官司”。等他把那里的土地敲诈到手以后，中间的土地被截断了出路，无法耕种，这样，逼使另外一部分农民也不得不忍痛交出地契。

哈同地产投机的花招是层出不穷的。他往往是在买进一处地产后，马上就以哈同洋行的名义和公共租界董事的身份，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拿到押款后，马上再买进另一处地产；买进又马上抵押，再买进另一处。这样，买进，抵押，再买进，再抵押，使得他的地产象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为了哄抬他在南京路一带的大量地产的价格，哈同挖空心思地在南京路（从外滩到西藏路）用铁藜木铺路。这些木头一块块削得象方砖大小，共有四百万块，每块当时的价格是一角五分；还雇用一百二十个砌匠，砌了两个半月才完工。哈同为这项工程一共用去六十多万两，但这个数字，在他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去的巨大财富中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他这也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一则增加他招摇撞骗的本钱，并讨好英帝国主义和租界“工部局”，再则刺激南京路的地价不断上涨，他也随之更加脑

满肠肥。

“租地造屋”也是哈同惯于玩弄的剥削伎俩。如他在一九一六年时，把南京路浙江路口那块仅花去一万八千两买进的地皮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租期三十年，每年地租五万两。按照规定的地租，三十年期满时，哈同可以稳得一百五十万两的巨款，外加一座大楼。但是这个吸血鬼没有等到租期满就一命呜呼了。到一九四六年，由他的养子把永安公司建造的大楼仍然卖给永安公司的老板，又取得了一百二十万零五千美元。此外，南京路上的新新公司大楼、慈淑大楼以及许多里弄房屋，哈同也都是采取同样方式弄到手的。

哈同出租房屋，更是心狠手辣。他定的租金高得惊人，就是在马路两旁的里弄口被他霸占的空地上摆个香烟摊，每月也要付给他等于一担米的租金。至于出租成套的房屋那就更厉害了。他规定，凡要租他的房子，需要先缴纳巨额的小租<sup>①</sup>和预付一个月的租金。解放前，上海盛行的小租制，就是由哈同想出来的鬼主意并领头实行的。当时在南京路一带租一间哈同的房屋，出几倍于租金的小租是极平常的事，有的小租甚至要高过租金十倍到二十倍。除了小租以外，还有小费、过户费、顶费、挖费、押租等等的鬼名堂。哈同出租房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租期很短，一般是三、五年就到期，因为租期愈短，他就越能利用到期后所谓“另有用场”或“装修门面”的名义，要挟加租。如果原租户不同意，他就以“到期”为名，收回

---

<sup>①</sup> 小租和押租，都是解放前房产占有者对房客的一种剥削形式，约相当一至三个月的房租。押租用作抵押，若房客欠租，即将押金扣除；若房客迁居，即可退还。小租则纯粹是一种额外租金，房客迁居，亦不退还；房客为了免受小租损失，多将房屋转顶给他人，顶费与小租不相上下。

房屋,另租给别人,从而再勒索小租和押租等等。还有,哈同计算租期的方法也很特别。当时上海一般的房租,大都是按阳历月份计算,哈同却按阴历月份订约收租,原因是阴历每三年一闰,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这样他每三年就可以多收一个月的房租,每五年就可多收二个月的房租,每十九年可多收七个月的房租。小算盘打得这样精,真是极尽剥削之能事。

哈同催讨房租的态度极端凶狠。哈同洋行开张后,专门雇着十多个收租员收房租,有人交不起租,哈同就亲自坐了汽车去讨。如再不付清,他就叫捕房派人来封门,并拍卖房客财物。有一个当年住在上海、自称与哈同有许多年交谊的外国人,在他写的一本有关上海历史的书里,对哈同有这样一段描绘:“哈同终身致力于收租,即使他已经成为百万金镑的大富翁时,他还会攀登小屋的扶梯,对那些迟付一天租金的中国租户,威逼催讨。这种租户是极少的,因为大家都不敢对他欠租,假若他光临到这里来,这个家长不在,那么他会呆在脏臭的灶披间里等上几个钟头”。这里活现出了一个吸血鬼的凶恶嘴脸。

象哈同和沙逊这样的地皮虫、地老虎的发财致富,都伴随着不晓得有多少中国人民倾家荡产!对这一小撮寄生虫来说是“乐园”和“天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旧上海,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苦海和人间地狱。

我们要永远记住并绝不能允许这样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 五、经济掠夺的两大支柱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的，帝国主义者野蛮地、不择手段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侵犯中国的主权。劫夺中国海关，在中国开设银行，就是他们为了侵略的需要而采取的两项重要步骤。海关，体现着国家的主权，管理着国家的大门，维护着民族的利益；银行则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的要害。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大门上的钥匙，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这就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扩大他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铺平了道路。“洋”海关和“洋”银行，这两者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造成的剥削网上的两个枢纽。

矗立于外滩的两座建筑物——上海海关大楼和原汇丰银行大楼，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蹂躏中国主权、压榨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

### 劫夺上海海关

早在十二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南宋时期，在这已形成集镇的上海，就设有一个带有海关性质的机构，叫“提举市舶

司”，办理对外贸易的征税事宜。明末清初，政府实施海禁，上海的对外贸易不能开展。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航海贸易很快有了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热闹的港口，“商贾云集，海舟竞至”。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就在上海设立了海关，叫“江海关”，专门稽征进出国境的船舶和货物的税款。这就是最早的上海海关。当时实行的关税税率是一种划一关税，将货物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和杂货等四类予以课税。清政府在税率上和关税行政上都有完全的自主权。

海关主权包括关税自主权，是国家的主权之一。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某些商品是否允许进口或出口，决定征税的轻重或是否免税，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抵制损害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这是世界上一切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中国的这种关税自主权，在当时企图打开中国门户、独占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财富的英国殖民者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地企图首先破坏中国的关税主权，为他们扩大侵略扫除障碍。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侵占中国市场的主要组织“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说道：“（中国）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订，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并说要用武力来争取这些条款的实现。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它要达到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一八四二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输入中国的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中国海关不能自己决定税率。这样就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紧跟在英国侵略者后面的是更为狡黠的美国侵略者。《南京条

约》签订后，美国马上派全权公使顾盛率领舰队前来威胁清政府，迫使清政府于一八四四年签订了《望厦条约》。腐朽的清朝政府把关税自主权同样拱手送给了美国侵略者。接着法国等侵略者也要求“利益均沾”，清朝政府也一一答应。从此，中国的大门向外国侵略者敞开了。

帝国主义的贪欲是不会满足的。它们虽然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但海关的行政机构和人员以及关税的收入，仍然控制在清政府手里，这对它们掠夺、倾销、走私等还不很方便。另外，如能控制巨大的关税收入，便可进一步控制清政府，因此帝国主义者便千方百计地想把海关完全弄到手。

当时，上海海关设在十六铺地段的外马路和环城马路之间，被称为“江海大关”；另外在洋泾浜北还有一处盘验所，专门对进出口的外国船舶进行检查。一八四五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就以住在租界的外国商人到县城的海关缴纳税款和办理手续不方便为借口，胁迫上海道台宫慕久把海关关署搬到英租界的中心区外滩，以便直接控制。一八四六年，宫慕久就在水滩头坝面浦建立了一所海关，专门负责办理外国船舶的征税事务；而原来设在外马路和环城马路之间的“江海大关”，就成为主要办理国内沿海航线船舶征税事务的机构。这个设在租界内的海关，被称为“江海北关”或“新关”，也有人称之为“洋关”。

帝国主义者并不因海关设在租界内而满足。巴富尔的后任阿礼国威胁说：上海海关“妨害正当商人营业，亟应整顿”。阿礼国所说的“整顿”，就是要由外国侵略者来完全控制上海海关。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清政府地方官吏有的被起义军镇压，有的逃走，海关的税收业务一

时陷于停顿。阿礼国认为“整顿”上海海关的机会到来了，便以实行“租界中立”、“保障租界安全”和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内收税为名，首先迫使海关工作人员撤出，接着派出停泊在黄浦江中英国军舰上的士兵占领了上海海关。两天之后，到了九月九日，阿礼国又以英国领事的名义，宣布“帮助”清政府维持税收，由领事代表中国官厅向外国商人征收税款，并规定可以暂时不缴现款，而代以期票，到战事结束后再行结算。英国侵略者就这样蛮横地劫夺了上海海关。美国副领事金能亨也紧紧跟上，在同一天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告。这样，英、美领事便变成了上海海关事务的“代行人”。

关税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收不到关税对它的反动统治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能征到关税，清政府设法弄了两只船，在黄浦江上成立了一个水上临时海关。英法等国领事拒不承认，说“不知道有这种机构”。美国领事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发出承认水上海关的通知，事先却又通知美商洋行说，其他国家的船舶不付税，美国商人也可以不付税。这样，这个水上海关实际上收不到一文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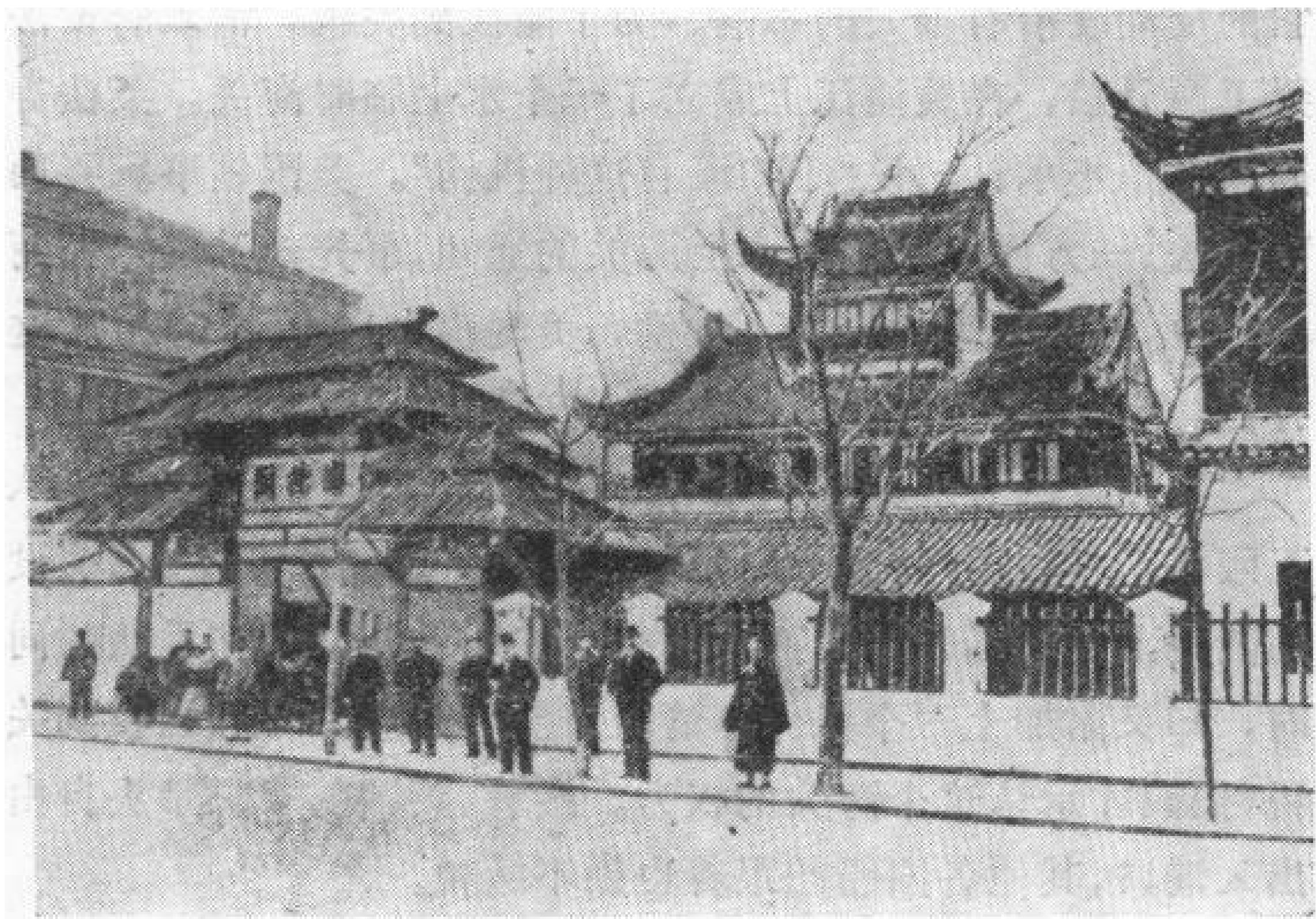
外国侵略者这样蛮横无理，清政府却又一次退让。一八五四年二月在苏州河北岸另设立了一个海关办事处。海关设在陆地上，三国领事表面上不得不加以承认，但在承认的同时，却又附加上一个条件：清政府要首先向其他各国收到关税，他们才承认这个海关的权力。接着，英国的船只带头自由出入港口，其他各国船舶跟着也拒不缴税。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在苏州河上游的白鹤渚、黄浦江上游的闵行镇，设立了两个征税关卡，打算向中国商人征收出口税。可是，外国侵略者还是不肯罢休。美国

公使麦莲首先跳出来叫嚣：“在内地征收关税，是一件违反条约的行为。”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也向上海道台吴健彰<sup>①</sup>发出通知说“无法承认中国当局违背条约的行为”。真是一副十足的强盗腔！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海关的关址设在什么地方才能算数，而是在于外国侵略者一心要直接控制中国的海关机构。英、美、法三国领事表示，如果关税的征收能以某种方式置于三个“有约国”（即英、美、法）的有效管辖之下，就会是“适当”的。他们还无耻地提出，如果清政府答应这样做，不仅海关可以设到租界内，还可以在军事上帮助清政府镇压小刀会起义。

腐朽的清政府只要能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什么国家主权



一八五四年，外国侵略者霸占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

<sup>①</sup> 吴健彰，原广州十三洋行行商，美国旗昌洋行股东，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曾被小刀会起义群众捉住，美国侵略者设法帮他化装逃出。

都可以出卖,因此,就全盘接受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肮脏的交易终于达成了。六月十五日,英、美、法三国领事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协同清朝政府镇压小刀会起义军,对中国人民又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吴健彰和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麦菲、法国代理领事爱棠,举行了海关改组和制定章程的会议。会议决定海关任用外国人员,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提一名委员,经“道台任命”,组成一个外籍人员的税务管理委员会,向三个领事和道台负责。这样,实际上就是把海关放在英、美、法领事管辖之下,上海海关成了外国领事馆的附属机构。道台虽然是海关监督,但那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官衔。从此,上海海关完全落入了外国侵略者的手中。一八五七年,在汉口路外滩,即现在海关大楼的地方,建成了一座古庙式的海关关署。它挂的是中国政府的牌子,但当头的是洋人,讲的是洋话,写的是洋文,办的是洋务,一切“洋化”“奴化”,成为名符其实的“洋关”。

一八五八年,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和它在上海会商修改税则,当时窃据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李泰国,根据英政府的指示,参加拟订税则。他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鸦片诡称为“洋药”,塞进税则,每箱征收税银三十两。这样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使鸦片贸易这种罪恶勾当,更加变得肆无忌惮。英、美驻中国的大使也自供说:“在江海关,鸦片在海关关员的面前公开地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物”。输入上海的鸦片,一八五六年为三万箱,到一八七〇年,激增至六万箱以上。李泰国因修订关税“有功”,进而窃据了中国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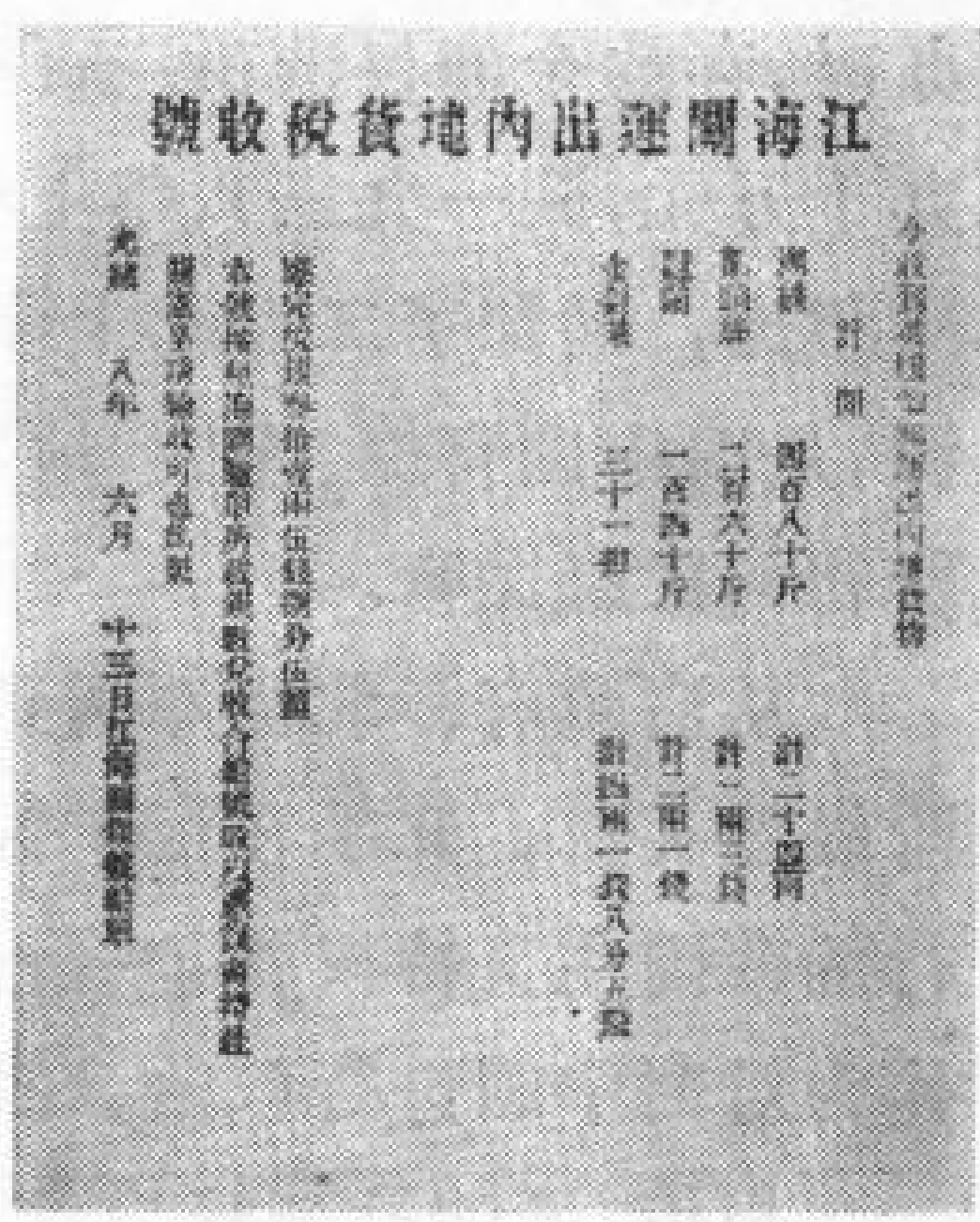
这次修改税则，把中国关税限制在值百抽五的极低的范围内，它大大便利了洋货在中国的倾销。翻开旧中国海关的贸易统计，从一八七七年起直至全国解放，年年都是入超，上海成了最大的入超港，中国的黄金白银随着黄浦江水源源流向国外，仅一九三六年流出的银元就有二亿五千万。除此之外，还有实际上是在“洋关”的纵容、包庇下的大量走私。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走私，更是猖狂到了极点，整批整批的走私货物在日本浪人的押运下，闯关越卡，如入无人之境。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泛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业，使工厂倒闭，农村破产，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海关为基地，把魔爪伸向中国财政、交通、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旧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到处设有关卡，海关借口缉私，建立武装，设置舰队，巡弋于我国国境海岸，所有港务、港口引水、助航设备、灯塔浮标等等，都由外国侵略者操纵；沿海的风候、潮汐，也由外国侵略者测量、记录；连海关所用的海图，都是根据英、美海军部的图表编号。掌握海关大权的洋税务司，还在海关内部制订了一整套搜集情报的制度，规定“提供情报”是海关“最重要的任务”。他们夸耀说海关是“获得中国政治、经济情报的贮藏所”和“唯一可靠源泉”。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英、美、日、俄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出兵，勾结清政府，进行血腥镇压，而当时窃据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就曾向八国联军提供了义和团活动的大量情报。另外，旧中国的军阀政府，都是靠借外债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而借外债一般又都是用关税作抵押的。这样，海关就成为一笔笔庞大外债的担保



品，总税务司则通过控制海关而支配旧中国的国库。

从一八五四年到全国解放约一百年的时间里，掌握上海海关实权的税务司，以及中国海关最高管理机关的总头目——总税务司，一直由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充任。他们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是“国际利益的代理人”。这些家伙独揽中国海关的大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把海关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帝国主义霸占上海海关时给怡和洋行开的税收单据。

## 垄断中国金融财政的汇丰银行

旧上海外滩，是外国银行的集中地。从一八四八年英国东方银行在外滩设立营业机构开始，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几十家银行。其中有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等等。这些银行，事实上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资本的总代理人，是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又一重要工具。在这些银行当中，汇丰银行发展最快，获利最多，在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中长时期居于优势的地位。

汇丰银行的英文原名是“香港上海银行”，一八六四年三月在香港成立，第二年四月在上海设立分行。它在上海刚开

办时,存款余额仅港币三百多万元,到一九一三年增加到二亿九千万元,到一九三六年更增加到八亿三千万元,和一八六五年相比,增加了二百七十多倍。这样巨额存款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旧中国官僚、军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搜刮所得的民脂民膏。

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的头目,几乎在汇丰银行都有巨额存款。他们借汇丰银行的帝国主义特权作护符,而汇丰银行也利用这些人的存款,作为对旧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资本。

相传,清朝最高统治者那拉氏(慈禧太后),就曾和汇丰银行演出过这样一出双簧:那拉氏的宠臣庆亲王奕劻做军机大臣后把部分贪污所得,计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存入汇丰银行。后来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引起人们议论,那拉氏为了缓和社会舆论,假意派户部尚书鹿传霖“彻查”。可是当鹿传霖装模作样到汇丰银行要求查账时,汇丰银行却以“银行账簿从来不准示人”为理由拒绝查账,把他拒之门外。那拉氏便顺水推舟,利用汇丰银行在华特权,把奕劻的贪污罪行掩盖下来。而汇丰银行也乘机通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报纸,利用此事,对所谓保护存户权利大加宣扬。自此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代代相传,都以汇丰银行作为存放他们贪污、搜刮所得的保险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赖的关系。

作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金融中心的汇丰银行,干下的罪恶勾当,真是擢发难数。它垄断中国金融财政的手法之一,是对中国历届反动政府进行大量的贷款。从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九〇年期间,清政府共借外债二十六笔,汇丰银行一家

就独占十七笔，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所借的外债，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这家银行。汇丰银行通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疯狂夺取在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例如，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两次借款的合同中，竟然规定在借款清偿之前，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担任。在借款谈判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还乘机胁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允许英国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还迫使清政府把重要财政收入——关税（后来又增加盐税），作为借款的担保和抵押。辛亥革命后，汇丰银行又以确保债款的归还为借口，正式攫取关税和盐税的保管权。关税由外滩中心的海关征收，随即存入隔壁的汇丰银行，银行扣除了借款的利息以后，才把余款转给军阀政府。外国侵略者就这样完全控制了旧中国的财政，并且得以支配旧中国的政治。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掠夺无孔不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铁路借款的问题上，曾展开激烈的争夺。因为谁成了中国铁路借款的债主，谁就可以进一步夺取铁路的建筑权、管理权以及铁路沿线矿产的开采权，就可以在铁路沿线扩展军事、政治、经济势力，扩张势力范围。那时，汇丰银行就曾不遗余力地投入这场争夺战。它为了加强自己的财力，在一八九八年和另一个侵入中国历史很久的英国垄断资本财团——怡和洋行相勾结，联合组成专门争夺中国铁路借款的所谓中英银公司。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为止，就争夺到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汉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借款权。一个国家的铁路好比人身上的大动脉，抗战前中国共有十六条铁路大动脉，而汇丰银行一家就控制了九条。英帝

国主义分子还根据借款合同规定的条件，霸占了许多铁路管理局的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重要职位；铁路应用的器材和车辆等，也规定要优先向英国购买，这又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提供了条件。通过这些铁路借款，英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重要铁路，确保了它在长江流域以及华中一带的势力范围，把持了中国广大地区的矿山、原料和其他重要资源。

汇丰银行还利用借款，公开帮助中国反动统治者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被扼杀后，一部分太平军转入西北地区，得到当地人民响应，在嘉峪关内外继续进行斗争，清朝政府大为恐慌，在一八七七年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左宗棠带兵前往镇压。从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一年，清朝政府三次向汇丰银行借得白银一千零七十五万两，作为军饷。这笔借款的名称，就名目张胆地叫做“西征借款”。汇丰银行给中国反动政府的每笔借款，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汇丰银行掠夺中国的另一个手法是把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外汇。作为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的堡垒，对英国洋行的各项掠夺和投机活动，它总是以后台老板的身份给予充分支持。据估计，当时上海一地，就有四十几家英国重要企业，与汇丰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怡和、太古、沙逊等洋行，和它的关系尤其密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汇丰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主要由这些洋行的代表组成。他们串通一气，把持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汇丰银行以大量资金低利借给这些洋行，特别是怡和洋行，支持它们在中国掠夺大批猪鬃、桐油、茶叶、大豆、蚕丝、矿

产等重要原料和物资。借款往往采用这样的方式：汇丰银行借款给怡和洋行，在中国农村收购茶叶，收购之后并不马上收回借款，而是等怡和洋行把茶叶运到国外市场，出卖后才在外国收还；另外，汇丰银行在外国收到欠款，又用来借给怡和洋行，帮助它在外国收购洋货、贩运鸦片到中国来倾销，等出卖后再在中国收回。汇丰银行的有力支持，使得这些英国洋行在控制旧中国进出口贸易方面，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英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最高曾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长期被帝国主义洋行所垄断，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基地。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迅速破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也越来越贫困。

由于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部分被汇丰银行支持的帝国主义企业所垄断，一切进出口贸易就大多在汇丰银行办理外汇结账清算，更由于汇丰银行通过给旧中国反动政府借款，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盐税等大宗财政收入，从而操纵了旧中国的金融市场。当时汇丰银行占有上海全部外汇交易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因此长期以来，全国通商口岸的外汇牌价（中国货币与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以上海为标准，而上海则以汇丰银行的挂牌为标准。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实施货币改革、发行法币后，外汇牌价表面上虽由汇丰银行转到伪中央银行，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投靠，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外汇业务，仍旧操纵在汇丰银行手中。

汇丰银行既然一手操纵着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汇牌价，

就可以利用汇价的涨落攫取暴利。例如，在每年春天进口贸易较多，外汇需要增加，汇丰银行就抬高外汇牌价，压低白银价格。这样，就在卖出外汇时，多收进白银。而在下半年丝、茶等农副产品出口旺季，外汇收入增加，汇丰银行又故意压低外汇牌价，抬高白银价格。这样，又在买入外汇时，少付出白银。又如每当汇丰银行向中国反动政府交付借款时，就故意抬高外汇的牌价，以便少付英镑；而在收取借款本息时，又故意压低外汇牌价，从而多收银两。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汇丰银行就用这种办法，攫取一百八十九万两白银。为了偿付这种额外勒索，中国反动政府往往不得不另举新债。当时，这种汇价损失，叫做“镑亏”。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就曾向汇丰银行借过一笔一百万英镑的“镑亏借款”，用来偿付前五年庚子赔款借款时的“镑亏”。

为了加强经济掠夺，汇丰银行还倚仗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任意在中国境内大量发行纸币，侵犯中国财政金融主权，用一叠叠的纸头，换去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这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又一种毒辣的手段。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它从不公布数额，所以确切数字，无从知道。但从一九二三年它库存四百万元作为备用这一点来看，它在上海一地的发行额至少在四百万元以上。

汇丰和其他外国银行在中国滥发纸币，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曾多次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就遭到人民拒用。英帝国主义和汇丰银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怕得要死，但又不甘心罢休，就串通其他外国银行，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迫使上海道台同意推广使用它们发行的纸币。辛亥革命后，各地舆论都

激烈反对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高潮，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予狠狠的打击，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受到广大人民的坚决抵制。省港大罢工前，广东所有交易几乎都要用汇丰银行的纸币结算；罢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汇丰等银行的纸币，在市面上就几乎绝迹。同时，汇丰银行因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受到抵制，现金不断流出，股票价值在两三个月内下跌了百分之十一点五。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见有机可乘，又擅自在上海发行纸币约一百余万元。上海人民群起抵制，终于迫使它停止发行，并收回了已经发行的纸币。

汇丰银行通过发行纸币，垄断进出口贸易，操纵外汇牌价等一系列侵略活动，在中国人民身上到底搜刮去了多少血汗钱呢？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汇丰银行每年的纯利就在一百万银元以上，一八九〇年曾达到二百六十七万银元。当时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曾以羡慕的口吻说：“这样大的利润，据我们所知，是伦敦任何合股银行所未曾有过的！”一九二三年，它在上海获得的利润，更达五百万银元。汇丰银行掠夺到的大量白银、银元和黄金，都装箱运回英国。有一次启运时，从银行到码头一里多长的路上，都实行戒严，不许行人通过。英国警官指挥全副武装的巡捕，护送一箱箱白银运上大轮船。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常在夜间进行；怕轮船不安全，又改用军舰。

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汇丰银行的利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前几年增加。这五年间，汇丰银行平均每年纯利润达一千六百六十八万银元，



最高年份的一九三〇年，纯利润达二千零七十二万银元。这表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往往能保持高额垄断利润；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人民掠夺的办法，来尽量转嫁它在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

## 六、无孔不入的洋行公司

解放以前，外滩和南京路是洋行公司的集中地。在上海开埠后的一年，即一八四四年，外滩一带就建立起了十一家洋行公司。十年以后，即一八五四年时，它的数目增加了十倍，共达一百二十余家。六十年代以后，在发展起来的南京路上，洋行公司的数目，更是不断增多。它们当中比较大的，有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安利洋行、哈同洋行、旗昌洋行、太古公司、惠罗公司、福利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大北电报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它们依仗着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各种特权，使用一切投机诈骗的手段，以租界为根据地，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打入并控制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它们的需要，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它们的大班，很多人都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和从事地产投机的“地皮虫”，靠着经营这种罪恶勾当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又把它变为进一步扩大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本。他们名义上是商人，但正如他们早年向中国贩运鸦片的“飞剪号”商船是道地的海盗船一样，他们也都是一伙具有典型的海盗掠夺精神的冒险家。正是他们这一伙人，把持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政治经济大权，是旧上海的实际的统治者。在南京路上，还有先施、永安、新新、大

新——所谓四大公司，这些虽然是中国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实际上只不过是洋货的经销处。所有这些洋行公司，在不长的外滩和南京路上，组成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吸血管，管的一头，通向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保险柜，另一头通向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它们象蚂蟥一样叮在中国人民身上，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液，养肥了帝国主义者和冒险家，造成了中国的贫困和中国人民的灾难。

洋行林立，洋货充斥，这就是旧日外滩和南京路的写真。

### 殖民掠夺的急先锋——怡和洋行

在旧中国被称为“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是帝国主义在外滩开设最早的一家洋行。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上海刚一开埠，设在广州的怡和洋行，就抢先派人来到上海，筹划在上海设立新的侵略据点。一八四五年，《上海地皮章程》刚一公布，它又捷足先登，取得英租界第一号土地登记证，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霸占了李家场的一块土地，盖起一座两层的楼房，在那里设下上海怡和洋行掠夺中国人民的大本营；而后随着它罪恶事业的发展，又翻造成五层楼花岗石的“怡和大厦”。

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怡和洋行从一家鸦片走私的黑店，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垄断财团。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历史的缩影。

怡和洋行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从它开张的第一天起，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的第一任大班查顿和第二任大班马地臣，都积极参与了挑起鸦片战争的罪恶活动。

威廉·查顿，苏格兰人，一八一九年前，在东印度公司当随船医生。当时，东印度公司大量向中国贩卖鸦片，并享有专利权。查顿每次随船来华，就夹带着搞鸦片走私。一八一九年起，他脱离东印度公司，独立经营鸦片贩卖。这个家伙狡诈阴险，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为，因此被称作“铁头老鼠”。

詹姆士·马地臣，原是英国在加尔各答一家公司里的职员，被解雇后来到中国，一八二七年，他和查顿相结识。这两个臭味相投的冒险家狼狈为奸，合伙贩运鸦片，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当时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一八三二年，他们在广州开设“查顿·马地臣有限公司”，简称“查顿洋行”。当时帮他们推销鸦片的中国买办名叫伍怡和，因此这家洋行的中国行名，就叫怡和洋行。

贩卖鸦片的利润，在通常情况下，可高达百分之五百。鸦片走私的利润更大得惊人。鸦片贩子们贪得无厌，还进一步要求让他们的鸦片及其他商品在中国能自由倾销。当这些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阴谋策划用大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一八三〇年，马地臣勾结四十七名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并建议派军舰占领中国沿海岛屿。这封信是马地臣亲手起草的。一八三四年，他又专程回国，向英国大资产阶级作疯狂的反华鼓动，并写了一本名叫《对华贸易现状及其前途》的小册子，公开诋毁中国人民，叫嚷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严令英、美鸦片贩子缴出鸦片，在虎门销毁。老奸巨猾的查顿见势不妙，仓皇

逃离中国。马地臣则继续留在广州，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指使下，破坏中国人民的禁烟运动。一八三九年五月，被林则徐查获，驱逐出境。

查顿逃回英国后，从各方面鼓吹对华发动武装进攻，并通过友人斯密斯的关系，会见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向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要求立即对中国出兵。一八三九年九、十月间，查顿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提出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要求中国赔偿被焚毁的鸦片烟价，向英国政府道歉，订立通商条约，开辟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为通商口岸。他还献策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以充分的武力作后盾，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占领一些沿海岛屿如舟山、厦门、金门和台湾等。他还在给帕麦斯顿的备忘录中，开列了需要在中国使用的武器装备。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大体上就是按照查顿提供的计划进行的。事后，帕麦斯顿在给斯密斯的信中说：“基本上借助于你和查顿先生那么慷慨地提供给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的。”帕麦斯顿所谓“满意的结果”，指的是用武力打败清政府，并迫使它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英国侵略者取得巨额赔款和许多特权。事情暴露得很清楚，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左右英国对华政策的是查顿之流的鸦片贩子，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从此以后，鸦片象潮水似地涌进中国。在这种罪恶交易中，打头阵的还是怡和洋行。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即上海开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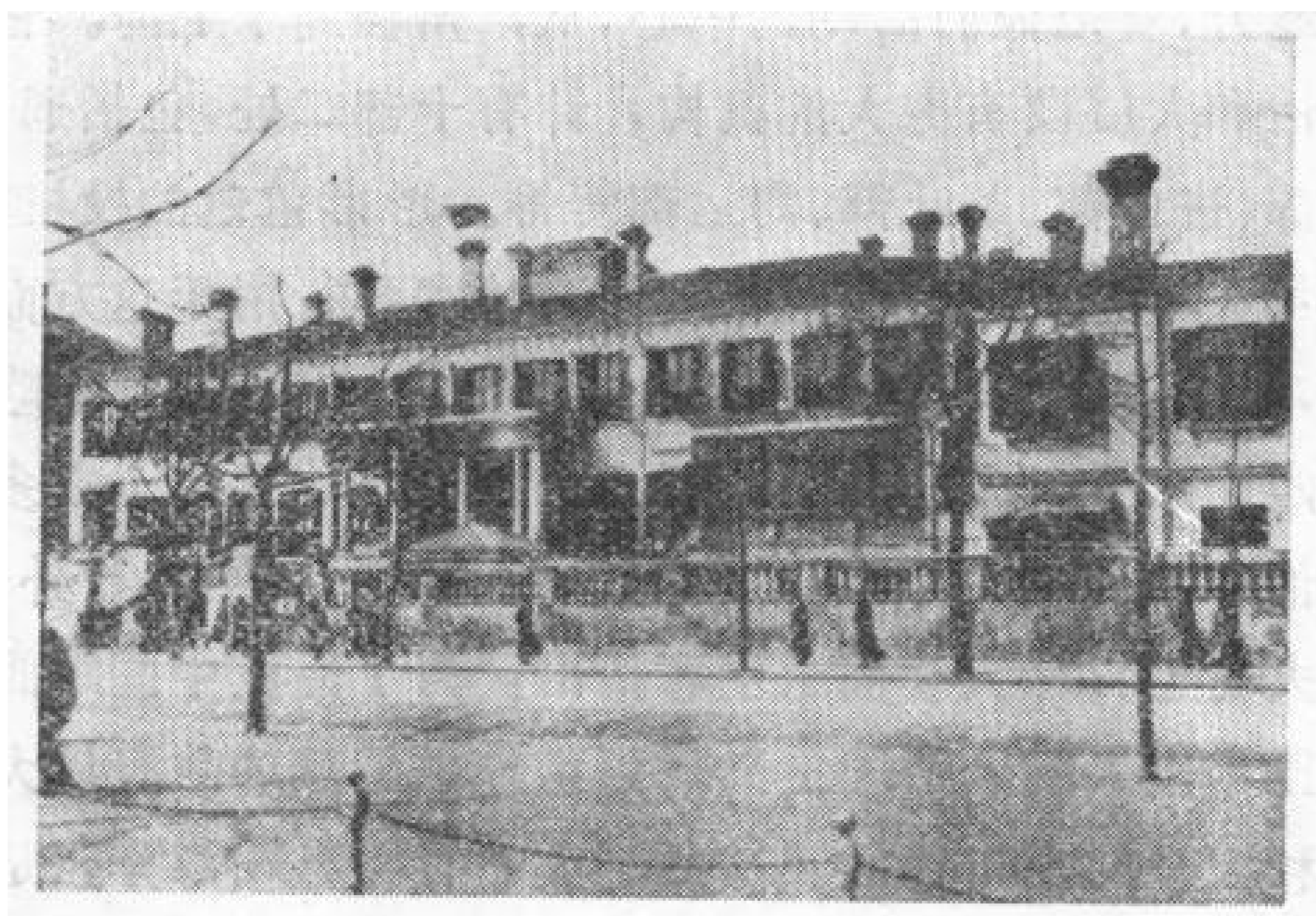
后的头一个月里，怡和洋行的一艘载重四百二十三吨的鸦片船就赶来上海。其他烟贩子也接踵而至。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飞速增加，一八四八年是十一万六千九百多箱，一八五八年增至三十三万多箱。在这些年代里，怡和洋行输入的鸦片，始终居第一位。它在南京路外滩有自己的码头，在黄浦江上有趸船，囤积着大量鸦片。它有许多艘专门用来偷运鸦片的“飞剪船”，定期航行在印度加尔各答——香港——上海之间。这种航行速度快并装有大炮及各种武器的飞剪船，先在新加坡截住英国邮船，提取邮件后，飞速送到香港，再由等候在那里的飞剪船，飞速送到上海。船到吴淞，先把邮件递上岸，又由专差骑快马送到外滩怡和洋行。洋行的大班，就根据新到手的经济情报，翻云覆雨，牟取暴利。由于它比其他洋行能早几天得到经济情报，所以它在强盗贸易中能经常占据优势的地位。

贪得无厌的怡和洋行大班，眼见上海是适合他们大发横财的地方，就把他们活动的中心，从广州移到了上海。它在外滩的怡和大厦设有庞大的机构，计有十部二处，包括通讯部、地产部、进口部、茶叶部、海运部等等。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买办麇集在这里，依附于怡和洋行，而怡和洋行用于这方面的招待费，每年达四万英镑。怡和洋行通过这些关系，把侵略势力扩向四面八方；设在中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达几十个之多。

怡和洋行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它除了贩卖鸦片外，还从事军火交易。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这些军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以商品形式卖给各地军阀的。怡和洋行就

曾向中国输入轻重机枪、炸药、雷管等大量武器，是英国大军火制造商威克思——阿木士图公司的代理人。为了适应贩卖军火的需要，一九三二年，怡和洋行另行组织了一个怡和机器有限公司，特设“军火处”。它的总公司设在怡和大厦背后的圆明园路上，工厂则设在杨树浦，分公司遍设香港、广州、汉口、南京、天津、重庆等地，专门做军火交易。这个公司拥有英、美几十家军火制造商的经销专利权。大量军火源源送到各地军阀手中，进一步助长了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苦难。怡和洋行掠夺去的巨量钱财，也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怡和洋行从“一本万利”的鸦片和军火贩卖中攫取到了暴利，但仍欲壑难填，它又通过分布在中国内地的分支机构，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中国的土特产，如茶叶、生丝、桐油、皮革等运销国外。它输出的茶叶，一度占旧中国茶叶出口的半数以上；它又是英国在华经营生丝出口贸易的最大企业。在



一八五〇年时的怡和洋行。



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它经常攫取到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这样，怡和洋行运来残害中国人民的鸦片和军火，又夺去了中国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财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掠夺，怡和洋行还把它的黑手伸向中国的航运和铁路事业。

一八七三年，怡和洋行设立怡和轮船公司，并在上海建立规模巨大的公和祥码头。不久，怡和轮船公司就操纵了旧中国的沿海和长江航运事业。

一八六三年，怡和洋行纠集了二十七家洋行，向在清政府中握有大权的卖国贼李鸿章提出要求修筑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李鸿章慑于人民群众反抗的声势，未敢答应。第二年，怡和洋行又派铁路工程师麦克唐纳·斯蒂文森，带着在中国修筑四条铁路干线和两条支线的计划，来到上海，进行活动，也因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阴谋未能得逞。

一八六五年，怡和洋行又拉拢美国旗昌洋行等，组成吴淞铁路公司，声称要修筑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外国侵略者供认，这是一次试探，“为将来的发展铺平道路”。第二年春天，就由英国公使出面，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筑路的要求。当要求遭到拒绝后，英国侵略者又施展出一套欺骗手段，谎称因运输军队的需要，要求修筑一条从吴淞到上海的“马路”，和架设“引车轨道”。接着，吴淞铁路公司就强行征购农民土地，开始动工，并把铁轨和火车头偷偷运到上海。一八七六年春，筑好从虹口到江湾的一段铁路，并正式通车。

对侵略者的这种强盗行为，上海人民感到极大愤慨。一八七六年八月，以火车压死一名中国农民的事件为导火线，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主权的斗争浪潮，江湾车站

几乎被愤怒的群众捣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迫使侵略者最后不得不同意将铁路折价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由清政府收回拆毁。殖民强盗无可奈何地哀叹：“大班们吃了一次败仗。”

怡和洋行不甘心失败。甲午中日战争后，它继续阴谋策划劫夺中国的铁路主权。一八九八年，怡和洋行勾结汇丰银行，组成中英银公司，专门争夺对中国的铁路借款。就这样，怡和洋行通过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一条条航线、铁路，就象一根根吸血管，吸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

怡和洋行在中国能够这样肆意扩大侵略，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除了依仗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权外，还通过各种手段，收买、培植、勾结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把它们变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如最早怡和洋行在广州贩运鸦片时，为了便利走私，就曾用贿赂收买清政府的官吏和缉私人员。据侵略者自己供认：他们对清政府官吏，每箱鸦片贿银五元到十元。

清政府垮台以后，怡和洋行又勾结北洋军阀，攫取种种特权。例如它暗中给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津浦铁路局督办徐世章以巨额贿金，换取他用双倍的价钱向怡和洋行购买一批卧车。通过这笔肮脏交易，怡和洋行取得巨额利润，徐世章也顿时成了富翁，在天津英租界大买房产，并在怡和财团的支持下做了天津英租界的华籍董事。在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夺对中国的贷款权时，怡和洋行也经常使用同样的卑劣手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怡和洋行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宋子文、孔祥熙等都是为其效劳的忠实奴才。如在三十年代初的“白

银风潮”中，怡和等洋行的英国大班，勾结四大家族，将大批白银运往伦敦。一九三四年底，上海的白银储存，从六亿元锐减到三亿三千多万元。大批白银外流，动摇了当时中国的货币基础，导致一些银行、钱庄、工厂和商店倒闭，并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了一次浩劫，但怡和洋行的大班们却从中大大地捞了一票。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加强压榨人民，由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机构在各地强行征购土特产，委托怡和洋行代销。怡和洋行在代销富华公司的茶叶时，硬要多扣百分之十的代办费。富华公司不同意，一时引起了饿狗争食的矛盾。怡和洋行大班盖西克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重庆找当时的伪行政院长孔祥熙面谈，结果孔祥熙不但乖乖地同意增加百分之十的代办费，还下令撤换了富华公司的经理。有四大家族做帮凶，怡和洋行也就更加有恃无恐，穷凶极恶地劫掠中国人民了。

如上所述，怡和洋行从走私鸦片起家，很快地发展成为拥有航运、铁路、矿山、保险、房地产、码头仓库、进出口贸易、轻重工业等包括几十个公司的庞大财团。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它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了多少财富，我们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情况。

怡和洋行二十多任大班，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回国时个个腰缠万贯，成了英国有钱有势的大亨。如它的第一任大班查顿，一八四一年当上了英国国会议员，成了英国显赫一时的人物。它的第二任大班马地臣，不仅当上了议员，还获得世袭爵位，回国后买下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海岛作为庄园，又花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镑“开辟”这个海岛。他的侄儿亚历山大·马地臣，也用七十七万三千英镑买下大批土地，成了苏格

兰的头号大地主。十分明显，这一小撮冒险家的庞大财富，都是靠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起来的。

## 上海电力公司——美帝控制 上海电力事业的机构

旧上海的南京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六层楼房，那里设有上海电力公司的总办事处。它是美国摩根垄断财团伸向中国的一只黑手。

上海电力公司的前身原是上海电气公司，一八八二年由英国殖民者创立。开始供电时，仅有一架十六匹马力的蒸汽引擎发电机。一八九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收买了上海电气公司，成立电气处，设发电所于九龙路，开始发电量仅一百五十瓩。一九一〇年时，由于上海工业动力需要日益增加，电气处另建新发电厂于杨树浦底黄浦江边，一九一三年建成投产，发电量逐年增加。到一九二五年前后，电气处的发电能力达到十二万一千瓩。当时，这个电气处由于垄断了公共租界的电气、电热和电力用电，曾经给工部局——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带来惊人的利润。

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相继被中国人民收回，上海革命形势高涨。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它的既得利益，避免因我国收回上海租界而使电气处发行的债券落空，急忙决定将这个电气处出售。

当时，早已着手在杭州经营电气事业的美帝国主义者，正野心勃勃地想在上海插手，以便逐步垄断杭州——上海——南京三角地区的电力网，实现其所谓“电气化江南”的侵略计

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招标出售电气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看准了这个机会，便由摩根财团电气托拉斯——美国及国外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出面，以八千一百万两白银把电气处购买下来。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双方议定分期付款，同年四月初办理移交。摩根财团把电气处改名为上海电力公司（“上电”），派来帝国主义分子贺清当总裁，又派绰号叫“老江湖”、曾在南美洲奴役黑人的乔亭当发电厂厂长。南京路江西路口的大楼建成后，在那里设立了总办事处，成为上海“电网”的中心。

摩根财团名义上是以八千一百万两银子的代价购入“上电”，但这笔钱，并非出自它自己的腰包，而是使用狡猾的手段，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去的。

摩根财团在“上电”的代理人，首先发行了一种叫做“六两第一优先股”的股票，六两银子一股。为了在中国员工中推销这种股票，他们进行欺骗宣传，假惺惺地说，“买了股票大家都是电厂的股东”；还规定，凡购买或帮助推销十股，可以赠送一股。黑心肠的大班们玩弄这一套江湖伎俩，引诱中国员工上钩。但那时工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买股票？所以除了少数高薪的职员和领班购买外，一般员工很少有人问津。

公司大班还特意设宴招待宋子文和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动员他们认购或代为推销股票。宋子文为了对洋主子表示恭驯，当场认购了八十多万两银子的股票。由于宋子文及工商界头面人物带头认购和美帝国主义者声言股票可抵充用电保证金，一些中小工厂、商店也被诱购买股票。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公司先后发行三次“六两第

一优先股票”，计银二千零八十六万两，相当于美国及国外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付给工部局的款项。

公司大班从推销股票中尝到了甜头，一九三三年，又发行了一种“五厘半公司债券”。他们先在报上大登广告，吹嘘公司“资力雄厚，债券可靠”，并说债券上载有“白银条文”，规定此项债券概照发行时每元所含白银的成分十足计算，不受币制变动和货币贬值的影响。这样，它又诱骗了一些人来购买这种债券。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公司债券”共发行了四次。这些债券象魔爪一样，伸到了上海的一些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以至某些街道和里弄，多的成千上万，少的则有一两股，购买总数达六千八百多户。公司大班又刮得白银八千八百万两，不但按期付清了工部局的款项，并源源不断地汇往美国。

摩根财团控制下的上海电力公司，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间，先后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七次，共刮得白银约一亿一千万两，比它买工部局电气处的钱还多出两千多万两，也就是说，它不仅不花一文钱把号称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拿到手，还从中捞到了白银二千多万两。用中国人的钱剥削中国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血汗的恶毒手段。

根据上海电力公司和工部局订立的合同，它的专营区域限在公共租界的范围之内，每年可获得投资额百分之十的净利。为了扩大剥削网，贪婪成性的摩根财团，还积极向公共租界以外扩充供电区域，首先向工厂比较集中的沪西发展。一九三五年，它从国民党政府手里取得在沪西供电的专利权，成立了沪西电力公司。这是一个既没有人员，也没有发电设备

的电力公司，业务由上海电力公司代办，电由上海电力公司馈赠。它实际上是上海电力公司的一部分，但摩根财团却借沪西电力公司的名义，又发行了三百万元的股票。在法租界、南市、闸北等专营以外的区域，上海电力公司都采取卖电转馈的办法，来达到垄断上海电力事业的目的。到一九三五年时，它就控制了全上海供电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还故意使南市、闸北地区的电流不足、停电或断电，迫使一些工厂迁到租界里面，向帝国主义者纳税，并直接受他们的统治。

美帝国主义者通过上海电力公司，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去了巨额财富。它每年公开宣布的纯利为六百万美元以上，一九三五年，该公司全年收入为二千五百余万美元，而支出只一千二百余万美元，盈利达百分之一百以上。帝国主义者居心险恶，手段毒辣，他们不仅从垄断电力事业中牟取暴利，还用它来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上海电力公司规定工业用电，中国民族工业的电费，每度为六分钱，外资经营的工厂的电费，每度却只有四分钱。这样悬殊的电费价格，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昂，无法与洋货竞争。当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期，美帝国主义者蓄意破坏中国人民的“三罢”斗争，对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停止供电，胁迫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斗争。抗战胜利后，它又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阴谋进一步垄断整个长江下游的电力事业。

从一九二九年到上海解放时为止，摩根财团通过上海电力公司，从中国掠夺去的财富，约等于两个上海电力公司的资产总值。那一根根伸向四面八方的电缆，就象一根根吸血管，把中国人民的膏血，吸到美国华尔街那里去了。



## 大北电报公司——沙俄 垄断中国电信事业的工具

在延安东路外滩，早年有一家大北电报公司。沙皇俄国曾经通过它垄断中国电信事业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北电报公司成立于一八七一年，名义上属于丹麦所有。它在这一年敷设的海底电缆香港——上海线和海参崴——长崎——上海线，是最早侵入上海的海底电缆，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先对中国电信主权的侵占。

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国家，它的实力、地位都远不及当时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可是，这个国家为什么竟然在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电信主权的争夺战中打头阵，在远离它本国的上海，经营大规模的电信事业，并垄断中国电信事业达半个世纪之久呢？

原来，在它背后有老沙皇在操纵和支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外国侵略者争先恐后地争夺中国的电信主权。英国的海底电缆经过印度、新加坡，敷设到香港；美国的海底电缆已经横渡大西洋，准备伸向太平洋；而沙皇俄国则从欧洲敷设陆上电缆，经过西伯利亚到达东海滨省。它们都一再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国陆上和海底敷设电报线路。

在争夺中国电信主权最主要的俄、英、美三个国家中，沙俄因为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大片领土，又把中国东北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更是野心勃勃。英国、美国要把电报线路伸入中国，必须敷设海底电缆，而沙俄却可在陆上架设电缆。陆线的工程比水线简便，因此沙俄想捷足先登。

一八六四年，沙俄派了一个叫哈博兰的技师，带着电报机来中国。沙俄公使出面邀请清政府的王公大臣前往参观，趁机提出由沙俄建造从当时中俄贸易集散地恰克图到北京的线路，以便和它的西伯利亚线路相连接。这是沙俄图谋夺取中国电信主权的开端。

当时，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全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清政府虽然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人民革命，但是对人民革命斗争的强大声势，却感到惧怕。在群众压力下，清政府不敢轻易答应外国侵略者提出的上述要求。

沙俄不肯就此罢休。它改变计划，指使受自己控制的丹麦王室，向清朝政府要求，在上海设立大北电报公司，敷设从海参崴到上海的水线。沙俄俨然以霸主的姿态狂妄地宣称，俄国政府将代公司出面向中国政府交涉，索取水线的登陆权。大北电报公司虽然挂丹麦国旗，实际上是由丹麦、沙俄和英国三国电报公司联合组成，而主要投资者是沙俄。很清楚，沙俄是想用这条水线，代替原来计划的陆线，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沙俄的压力下，媚外卖国的清政府终于答应了在中国领海敷设水线的要求。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间，大北电报公司敷设了海参崴到日本长崎，再由长崎到上海吴淞，和香港到吴淞的水线。它使用一艘停泊在长江外大戢山岛的轮船，悄悄地把敷设到那里的水线引上岸，安置在事先盖好的房子里，建立了第一个电报房。接着又把水线偷偷地引进黄浦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立了第二个电报房。最后再沿黄浦江把水线引到了外滩。于是，沙俄的魔爪，通过大北电报公

司，从东北伸到了上海。在敷设水线的过程中，沙俄军舰公然侵入中国领海，为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船护航。早在一八六九年时，丹麦总领事和沙俄内政部的来往书信，就公开招认，建造这条水线，“对于俄国政治和商业有莫大的利益”。大北电报公司“只有受到俄国保护才能在中国存在”。一语泄露了沙俄通过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掠夺中国电信主权的狼子野心。

沙俄的这种罪恶勾当，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反抗。大北电报公司依仗着沙俄的势力，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宣布对外营业，并邀请上海的一些资本家前往参观电报房。参观时，大北电报公司诱使一个商人利用这条水线，发电报去香港购货。等货物从香港运到上海后，就趁机大肆宣传，招徕业务。同时，由于它设在黄浦江里的水线经常被来往轮船的铁锚碰断，大北电报公司的大班又打鬼主意，准备改架陆上电缆。一八七三年，沙俄侵略者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勾结，从浦东电报房把水线横过黄浦江，引到张华浜。再从张华浜树立木杆，架设陆上电缆，接到外滩大北电报公司。沙俄的横暴行为，又一次激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竟然花了三千两白银，向大北电报公司买下这条陆线的所有权，以缓和舆论压力，但仍旧把它交给大北电报公司使用。这样，清政府非但白白送掉三千两白银，还要承担这段线路的维修费用，目的只不过掩人耳目而已。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一八七九年架设了一条由天津到大沽口的军用电报线，并在一八八一年将电报线延伸到上海。这条陆上军用电报线的架设，清政府是勾结沙俄，由大北电报公司承办的。沙俄抓住这个机会，积极

向清政府提供技术人员，担任勘察设计工作。当勘察设计工作还在进行时，沙俄就乘机威胁清政府，要求让大北电报公司享有在中国沿海敷设水线的垄断权，二十年内不准其他国家在中国领海内另敷水线，更不准在中国海岸登陆；即使中国自己设置水线或陆线，也不准与大北电报公司的线路重复。如果不答应以上条件，就立即把担任勘察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全部调回，使工程无法进行。这种以援助之名，行控制之实，把受援国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的做法是老沙皇的惯用伎俩。

对沙俄这种无理要求，大卖国贼李鸿章竟然奏请完全接受。后来，在续订“中丹电报合同”里，还将大北电报公司的电报垄断权加以明文规定，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电信大权大开方便之门。

沙俄取得了在中国沿海敷设水线的垄断权后，便以此作为资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大做交易，并以上海为立足点，进一步向中国沿海和内地伸展侵略势力。

一八八三年一月，沙俄与英国达成协议：由英国大东公司投资，增设从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新线收入的一半，分给大北电报公司；沙俄则同意把大北电报公司所取得的在中国沿海敷设水线的垄断权，与英国大东公司共享。

一九〇〇年，趁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和天津的时机，沙俄又勾结英帝国主义，由“大北”和“大东”两家公司联合敷设从上海到烟台和大沽口的水线。当时，清政府为了借外国侵略军的力量，镇压义和团，暗中积极支持“大北”和“大东”两公司敷设这条水线，并派大买办盛宣怀留驻上海协助办理。被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吓得惊魂不定的清政府，又怕这一出卖主权的

行为会进一步激起人民的反抗，于是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先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合同，以二十五万八千英镑的高价，买下这条水线；却又把买水线的钱，改作借款，年息五厘，分三十年偿还，在本息还清前，水线由这两家公司代管。同时，还把两公司对其他水线的垄断权一律延长到一九三〇年，使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电信大权的控制“合法化”。这些事件更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者贪婪狡诈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嘴脸。

俄、英帝国主义抢先垄断了中国的电信大权，急坏了美帝国主义。一九〇二年，美国摩根垄断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表示愿在四十年内以百分之七十五的经济利益，交给“大北”、“大东”两公司，换取水线在中国的登陆权。一九〇三年，美国的沪菲线（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上海）就在宝山登陆，引进到租界。德、日、法等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纷纷与俄、英两国勾结，在一九〇五年后，都分别在上海租界设立了电报公司。

一个国家的电信事业，就象人身上的神经系统。沙俄等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电信主权，垄断中国的电信事业，其目的就是为控制中国的“神经系统”，进一步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 为虎作伥的买办

如果说，外国洋行、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那么，买办就是洋行、公司掠夺中国人民的得力工具。

那些外国洋行、公司要把他们的商品运销到中国的城市

和乡村，再从中国内地收购土特产和原料，运到外国去销售，牟取暴利，光凭他们几个高鼻子洋人是办不到的。为了侵略的需要，他们通过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手段，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雇佣和豢养了一批经理人和中间人，充当鹰犬，并把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到的巨额钱财中，分出一小部分，给他们当报酬。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一支专为帝国主义者剥削掠夺服务的买办队伍。

前面提到，在南京路外滩沙逊大厦里面，有一家荷兰银行。它的规模并不大，只有六七个荷兰籍的职员，除了推销钞票换取银元外，还做些乳品、药材方面的生意。但这家银行的买办虞洽卿，在旧上海却是个有名的头面人物。他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眼里，是个不可多得的奴才。他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信任，还得到中国官僚买办的器重。诸如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许多头衔都戴到了他的头上。但是，在上海人民看来，虞洽卿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走狗。

虞洽卿是靠当买办起家的。他二十六岁（一八九三年）进德商鲁麟洋行任买办，靠为洋行经营颜料和西药进口，以及收购东北大豆、桐油和丝茶出口，获取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佣金”。这条帝国主义的乏走狗，靠着外国资本家的唾余，慢慢养肥了自己。一九〇二年，他又充当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荷兰银行在上海开张，他又改任荷兰银行的买办，在那里足足做了三十八年，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他离开上海时为止。

虞洽卿在为洋主子服务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荷兰银行当时在上海并不算实力雄厚，但虞洽卿利用上海一般商人迷信

洋人的心理，为荷兰银行推销钞票。开始由银行出银票掉现银，后来他又玩弄花招，首创什么“远期本票”，单他经手掉换的，每天就有三万至五万两银子，对扩展银行业务方面，起了不少的作用。正因为虞洽卿这样卖力，所以在他担任荷兰银行买办二十五周年的时候，银行送给他一只银杯；荷兰女皇还颁发给他一颗“宝星勋章”，作为对他的嘉奖。

旧中国的买办，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充当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帮手，而且在政治上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虞洽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极力鼓吹改上海为“特别市”，说什么“予意离淞沪百里之内不得驻(中国)兵”，提出了外国侵略者想提而不敢提的主张。特别是每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帝抗暴斗争的时候，虞洽卿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就是这个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名义。擅自提出旨在保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基础的所谓“十三项条件”，同革命人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十七项条件”唱对台戏；为了破坏“三罢”运动，他还亲自出动，沿马路一家一家地进行“劝谕”，诱胁商人开市。

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成了反动同盟，买办则往往在它们之间起穿针引线的作用。虞洽卿的一生就扮演着这样的反动脚色。他充当帝国主义的说客，伙同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谋划出卖更多的国家主权；同时又代表中国的这些反动势力向帝国主义伸手借钱和购买军火。虞洽卿在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多次电促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马，劝他“再起东山”；第二年三月，他又亲自赴杭，与军阀头子孙传芳“磋商规划淞沪区域问题”。阴谋使整个淞沪地区，完全脱离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共管的



“特殊化”地区。这一阴谋，实即早年外国侵略者所鼓吹的“上海自由市”的再版。虞洽卿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九二七年，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当蒋介石对我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虞洽卿又将他经营的三北公司的船只，供蒋介石运输军队、军粮及其他军用物资。虞洽卿这个大买办的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

正由于虞洽卿卖国有功，帝国主义者对他们的这条走狗也特别宠爱。为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决议，将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交接的西藏路的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抗日战争期间，虞洽卿靠着他和大汉奸汪精卫的关系，先后买下了静安寺路原沧洲书场的一块地皮和重华新村的一块地皮，丧心病狂地乘机大发“国难财”。

在外滩和南京路，靠帝国主义而发财的买办，除虞洽卿外，住在大庆里的郑伯昭也是一个代表。郑伯昭是英美烟公司的买办，永泰和烟草公司的老板。英美烟公司解放前在我国每年制销卷烟七十万箱，其中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都是由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草公司经销的。

郑伯昭是广东中山县人，幼年进中西书院学习英语，三十岁进永泰栈当职员。这家店铺是专门经销英美烟公司出品的“海盗牌”卷烟的。郑伯昭善于奉承洋人，不遗余力地为洋主子效劳。一九〇五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他献策把美烟“皇后牌”改名“大英牌”，以示非美国出品。一九一九年，郑伯昭在南京路大庆里开设了永泰和烟行，“大英牌”由他经销。一九二二年，在英美烟公司参与下，永泰和烟行改为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组织，实际上完全受英美烟公

司直接控制，它的一切收入都归英美烟公司。永泰和改组后的第二年，英美烟公司的洋大班要郑伯昭进一步扩张英美烟的销路。于是在旧历新春，郑伯昭分批宴请上海全市的烟纸店老板，堂会演戏，热闹三天，果然轰动一时。在郑伯昭的精心策划下，永泰和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四十多个据点，联系着广大的零售商，形成了英美烟公司在我国的一条吸血渠道。

五卅运动时，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抵制英货，原来门庭若市的永泰和，这时门可罗雀，“大英牌”卖不出去。郑伯昭又把“大英牌”改为“红锡包”，广告上用特大字表明美国制造，翻云覆雨，要尽花招，继续推销英国烟。

郑伯昭这样为洋主子卖力，他本人分享到的“残羹”也不少。除每年可得佣金百分之四十九（约五十万元）以外，还有一批特别佣金，是外汇支付，存在他在国外银行的户头上，这批数字要超过他国内所有。郑伯昭就这样暴发起来，成为上海的大买办。

鲁迅先生说过：“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暴力，一面利用本国传统之力，……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虞洽卿、郑伯昭之流的大买办，就是帝国主义者们的“宠犬”。

## 洋货分销店——四大公司

旧上海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商埠，不仅外国冒险家、殖民者

接踵而至，愈聚愈多，它同时也成为中国富商巨贾、军阀官僚和买办们的集中地点。这些仰仗洋人鼻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洋奴、卖国贼，服装讲究摩登，饰用追求华贵，一切崇尚洋化。为了适应这些人穷奢极侈的生活需要，于是供吃喝玩乐的场所，买卖各种洋货奢侈品的大商店，先后在南京路两旁出现。

从河南路到西藏路，这一段南京路两旁，开设着几百家商店、公司，这些虽然大都是中国人开的百货公司、绸缎庄、钟表行、参茸行、照相馆、糖果店等等，但除了三家南货店外，洋货象洪水一样泛滥，淹没了一切橱窗柜台，连草纸、发夹也不例外。所谓四大公司——“大新”、“新新”、“先施”和“永安”，绝大部分是经营洋货。他们为了推销外国货，大作广告，分发“奖券”，甚至有的采取“买一送一”的办法，竭力排挤国货。如大新公司经销的全部商品中，外国货要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它为了推销“犀飞利”金笔，甚至把女职工当作活广告，用侮辱职工的办法，招徕顾客。这家商店的老板，还把洋货摆在铺面商场，而将中国货放在地下室里，借此抬高洋货，贬低国货。再如永安公司，也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同时附设旅社、舞厅、茶馆、酒楼、茶室、游乐场、溜冰场、戏院、电影院等，是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综合商店。它经营的商品来自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毛织品，日本的人造纤维，德国的五金、皮革，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用品，澳洲的罐头食品，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士的钟表等等。整个商场事实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陈列所。国货比重微不足道，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而且只限于一些著名的中国土特产。

正由于四大公司主要是经销洋货，它获得的利润，有很

大一部分流入了外国资本家的保险柜，因此，这些公司的老板便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商店职工的剥削，以此来养肥自己。大新公司刚开门时，货色全靠抵押而来，卖一个月的货，付一个月的货款。大新公司的老板，原来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靠的是一张油滑的嘴皮，到处诈骗，拍马奉承，特别是残酷地剥削职工。他曾经叫嚷：“在南京路上，要一百只狗困难，要一百个工人容易”。真是凶相毕露。新新公司的老板，动不动就以开除职工相威胁，要职工为他卖力。这家公司的职工一年有三个“关”。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都要给老板“送礼”，累死累活所得到的一点钱，又落到老板的腰包里。否则，老板就要戴起老光眼镜，以“查卫生”为名，找出点灰尘，就将职工辞退。永安公司的老板对职工也同样苛刻，一周当中，职工只有星期天上午“休息”半天，但所谓“休息”，就是集中到教堂听“讲道”，实际没有休息。职工进公司，先要找保人，签订“志愿书”。资本家还订了各种条件，“犯了例”，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每年除夕吃年夜饭，职工们更是提心吊胆，怕遭到解雇。特别是这几家大公司的女职工，年纪一大，或者结婚有了小孩，就有被开除的危险，生活更没有保障。

南京路上洋货充斥的情况，除了四大公司以外，那些中小商店的货架上，以及设地摆摊的摊贩的货堆里，也都堆满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舶来品。南京路简直成了洋货世界。

外滩和南京路的畸形“繁荣”，好象人的虚胖与浮肿，它是虚弱的表现。在三座大山压榨下，中国人民购买力日益低落。抗日战争前后，为了招徕顾客，四大公司一年四季玩弄“大减价”、“大牺牲”、“大削码”、“大赠送”的把戏，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可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每当“大减价”的前夜，资

本家就迫使职工忙着改价目，来一个“明削暗加”，改头换面，却还厚颜无耻地宣扬什么：“做生意就是靠骗，顾客不来是我倒霉，来了是他们倒霉。”有些百货商店，则雇用乐队，用大喇叭、铜鼓，大吹大擂，希望能招徕生意；有的甚至弄个畸形矮人站在门口，戴个高帽子，一面摇铃，一面高喊“嚟来！嚟来！”借以吸引顾客。这就是当年南京路上闹哄哄、乱纷纷、五花八门的景象。

解放前十里洋场的所谓“繁华”，就是这样沾满了资本的肮脏和血污！

## 七、杀人不见血的魔窟

帝国主义强盗通过武力侵略，用枪炮杀害中国人民；通过经济掠夺，用饥饿逼死中国人民；同时它还通过输入所谓“西方文明”，从思想和精神上来麻醉摧残中国人民。解放前的外滩和南京路，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下，成了一座杀人不见血的魔窟。那时候，侵略者的一些重要文化侵略机构和据点，如《字林西报》、广学会、美国新闻处、大光明电影院、大华电影院、伊文思书店、跑马厅以及许多乌七八糟的舞厅、夜总会都集中在这里。新闻、出版、电影、文化，无所不包；靡靡之音、黄色书刊、好莱坞电影充斥街头。在这反映着“西方文明”的“十里洋场”里，其间也夹杂着一些尊孔读经、烧香拜佛以至算命卜卦的中国“古董”。帝国主义的文化 and 旧中国半封建的文化混杂在一起，它们是亲热的两兄弟，结成了反动的文化同盟军，鼓吹“侵略有理”、“剥削无罪”，造就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愚弄广大中国人民。

### 侵略者的喉舌——《字林西报》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座落在外滩十七号的《字林西报》馆十层楼大厦翻建落成，英国驻华公使麦克里专程由北京来到上海，主持“启门”典礼。贺客中有美国、法国、日本等

国驻沪领事和工部局总董，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曹琨，军阀张作霖、吴佩孚、何丰林，保皇党头目康有为等，都派了代表参加。麦克里在讲话中吹嘘《字林西报》是“大英帝国在华利益的保卫者”，并鼓励报社要“遵循这样的方向前进”。《字林西报》翻建一座大楼居然惊动了这么多的中外头目，麦克里更是如此露骨地吹捧，这就从反面使我们看清《字林西报》这个侵略者的舆论工具，在帝国主义侵华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字林西报》的前身是《北华捷报》，创刊于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当时《北华捷报》是周刊，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才开始发行日报，取名《字林西报》，而原来的周刊则变成它的附属刊物，一八八二年又发行中文版的《字林沪报》。

《北华捷报》的创始人是一个英国掮客，名叫奚安门。这个家伙是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冒险家。当他在为波佛梅公司充当广告掮客时，就学得了一手窥测风向、投机取巧的本领。踏上黄浦江岸后，他眼见上海是个冒险家的理想的乐园，于是就想在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事业中显显身手。他以报纸为工具，拚命地为侵略者摇旗呐喊。

奚安门在《北华捷报》的办报缘起中说：“我们现在仅不过站在这个帝国（指中国）的大门口，而尚未升堂入室。”作为侵略者的一个代言人，他在这里露骨地表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等，只不过是侵略的开始，更严重的侵略步骤还在后头。因此，他急不可耐地要求英国对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消除一切地方官吏的阻挠，扩张内地的贸易。”这种明目张胆的言论，表明侵略者从踏进上海时起，就存心要把整个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的一贯言论，始终都



为侵略者这一罪恶目的服务，鼓吹“侵略有理”，为殖民事业大叫大喊；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则竭尽造谣、诬蔑和诽谤之能事。

奚安门及其继任者，利用报纸为侵略者炮制种种反革命舆论，一开始就博得了殖民统治当局的赞赏和支持。他们认为，在征服殖民地的过程中，除了依靠反革命的暴力，还需要有为侵略事业出谋献策，炮制反革命舆论的工具。《北华捷报》和稍后的《字林西报》，恰好符合了这种需要。因此，虽然《北华捷报》在开张时是奚安门私人出面搞的，只有一部手摇印刷机，但很快地就扶摇直上，在帝国主义侵华的舆论工具中，奠定了霸主的地位。

一八五九年，康普东担任《北华捷报》主笔的时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正式给《北华捷报》以发表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特权。一八六四年发行《字林西报》以后，侵略者更把它视作殖民当局的官方言论机关，历届主笔往往就是殖民官员。如葛德雷原是英国派赴印度的殖民官员，以阴险凶狠著称，到上海担任《字林西报》主笔后，又兼任《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通讯员；李特尔，更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工部局凡有公告，照例交《字林西报》发表，工部局与《字林西报》的编辑部息息相通。《字林西报》的言论，既反映上海洋行大班的意见，又充当工部局的代言人，往往能左右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法学家费唐，在他那份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调查报告中供认：“上海之外报，系属一种机关。在公共租界历史中，为一有价值而重要之要素。”

对于如何对付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字林西报》则一贯扮演着殖民统治者黑参谋的角色。它刊载的言论或出的鬼点

子,往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先声。

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霹雳一声震撼了上海,使外国殖民当局惊恐万状。《北华捷报》反映了殖民者的恐惧和仇恨心理,用最恶毒的言论污蔑小刀会,说它“是一群无赖的匪徒,乌合的贼民”,胡说小刀会的革命行动,“无论在上帝或凡人的眼光中,都应该是一种罪恶”。它极力催促侵略者对革命人民快下毒手。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华捷报》出谋献策,主张把小刀会起义军封锁在城墙之内,断绝粮道,使之处于绝境。一八五四年十一月,英、美、法三国侵略者,果然采纳这一毒计,勾结清政府,沿着县城北面筑起一道围墙,断绝小刀会的对外联系,使起义军陷于粮尽援绝的境地,最后不得不突围出走。《北华捷报》和万国商团洋枪队,就是从文武两个方面相互配合,来扼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

《字林西报》和它的前身《北华捷报》一样,除了主张外国侵略者直接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外,更多的是代表外国侵略势力,在幕后指使和支持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屠杀中国革命人民,借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之手,达到其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目的。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字林西报》就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再对当时上海奉系军阀头目施加压力,指使他们向上海工人群众及其领导人开刀。七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的社论就这样说:“如果把这十几个人关进监牢,再枪毙一二个……,肯定可以马上起到使骚乱平静的作用。”《字林西报》已经撕去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一九二七年,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北伐战争正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字林西报》又一再煽动国民

党右派起来反共，要他们“不要再徘徊却步”。它极力推动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迅速采取行动，直接对他喊话说：“显些颜色给我们看看！”并指明了具体的反革命策略和步骤。蒋介石果然不负他帝国主义主子的期望，一一照办了。事实表明《字林西报》一向所标榜的所谓“公正而不模棱”，“不模棱”倒说对了，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刻骨仇恨，往往使它赤膊上阵，连遮羞布也顾不得要；但所谓“公正”，则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鬼话。

《字林西报》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其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搜集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是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华捷报》就雇佣外国传教士伍德、林乐知等人当编辑，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到处活动，刺探太平军的情报。随着外国侵略活动的日益深入，《字林西报》刺探中国的情报活动也就更为猖獗。它在中国各地组织起一个严密的通讯网，也就是间谍网，雇佣散居在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担任通讯员，猎取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在中国的不少外国传教士从事间谍活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们工作职务的局限，有时刺探情报还有一定困难，《字林西报》就给他们以“访事员”、“通讯员”或“记者”的身份，为他们到处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掩护和方便。

显然，由于有《字林西报》这样一个公开的报社设在上海外滩，侵略者的情报网就更严密、更集中了。《字林西报》经常有中国城乡各地的报道，甚至连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地也有定期通讯。它们为帝国主义有目的、有计划地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伸张侵略魔爪，起了先导作用。

英国公使麦克里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字林西报》的特

点，是它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在各个角落都建立了自己的通讯队伍，不断地供给各地宝贵的情报和当地政治动向，使我们能全面地抓住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我诚恳地希望，报馆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鼓励这些内地通讯员不断前进。”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赤裸裸地利用《字林西报》象蛆虫一样钻到全国各地收集情报，以便达到“抓住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的罪恶目的。《字林西报》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设在中国的情报站，麦克里的话已不打自招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字林西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不寻常的，这也就是在《字林西报》存在的期间，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对它那样重视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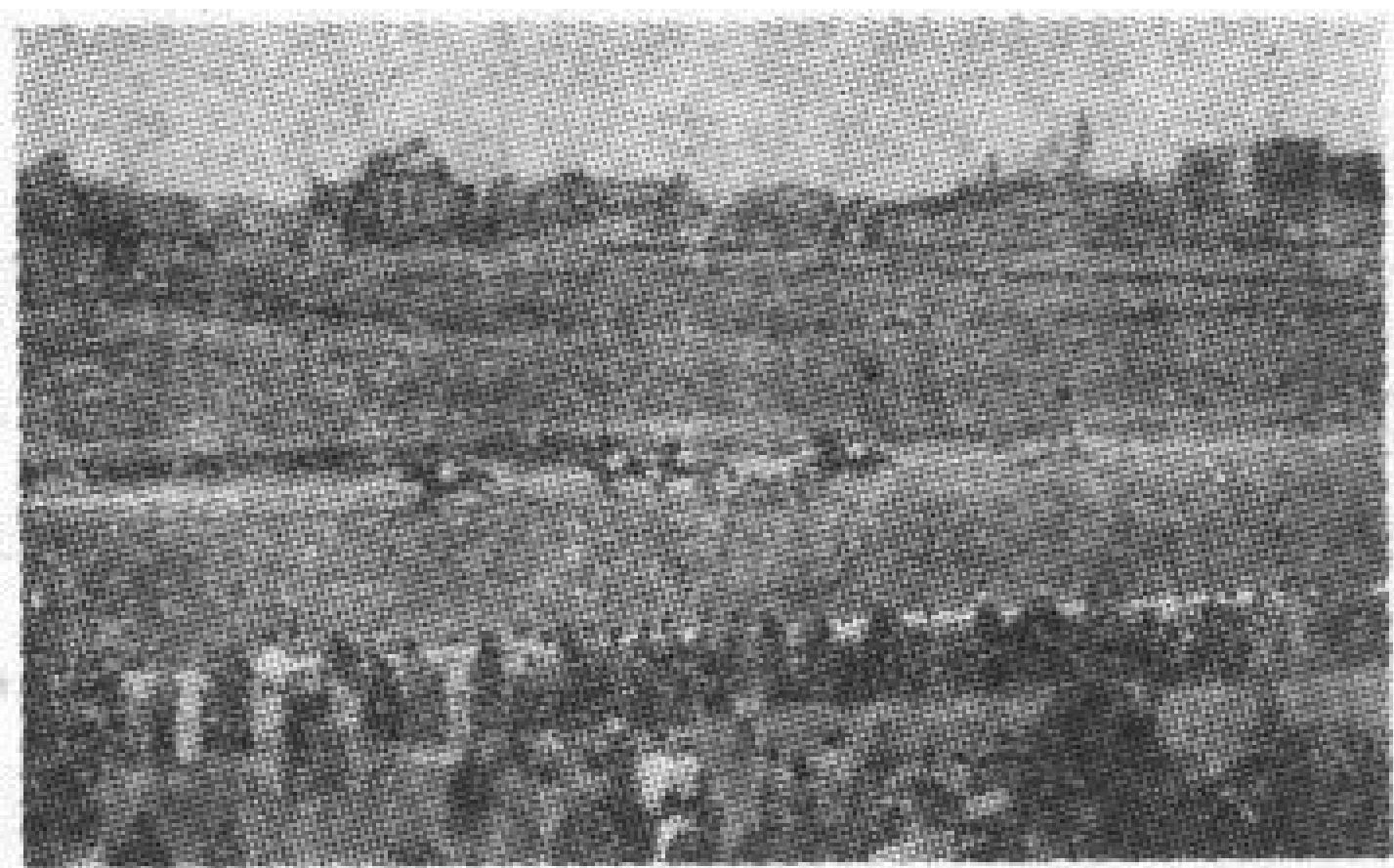
## 一所大赌场——跑马厅

位于国际饭店对面，占地五百余亩的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原是一所规模大、时间久、对中国人民毒害深的大赌场——跑马厅。

如前所述，跑马厅的历史对中国人民说来，是一部屈辱和沉痛的历史。为了开设这个大赌场，许多中国人民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田园，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这个大赌场在一八六二年开设后，外国殖民者象在外滩公园的恶毒作法一样，也在它的大门上挂出了“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这样一块侮辱中国人民的牌子。

跑马厅这种侮辱中国人民的作法，不断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也感到这种做法同他们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目的有矛盾。于是，从一九〇七

年起，跑马厅门前挂的那块牌子被收起，允许中国人购票入场，并举办经常性的跑马比赛。所谓跑马，是一种大规模的赌博方式。开赛时，那些买了跑马票的人，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所下的赌注，能有机会中彩得奖。但是拆穿了，这不过是一个大骗局。那些参加赛跑的马，是帝国主义分子所豢养的，哪一匹马跑得快，哪一匹马跑得慢，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帝国主义分子完全可以把赌注下在最有把握得奖的马匹上。他们还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赌博利益，通过雇佣的骑师来进行幕后操纵，故意使某一匹马跑在先，而使另一匹马落在后。所以帝国主义分子作为聚赌抽头者，他们是只赢不输的；作为直接参加赌博者，他们又是稳拿绝大部分奖金的。在赛马的赌博中，最大的骗局是所谓“香槟票”。“香槟票”每次约发行十万张，每张十元，上面印有号码。外国侵略者极力宣扬，谁要中了头彩，就可以得到若干万元，马上成为富翁，以此来诱骗更多的人上当。这种“香槟票”除了在上海大量销售外，还在中国各地设立分销处，很多烟纸店都代为销售，大量骗取钱财。从跑马总会成立时起，一直到上海解放为止，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跑马厅单是门票收入一项，平均每年约达十万银元。赛马



帝国主义者霸占的跑马厅。

时的跑马票和行销全国各大城市的“香槟票”收入，则更属惊人。仅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年中，票款收入总数就达一亿五千余万银元，平均每年收入将近八百万银元。

在外国冒险家的欺骗宣传和多方诱惑下，有少数穷苦的中国劳动人民也上了当，把终日做牛做马，辛勤劳动所挣得的一点点钱，也拿去买跑马票，幻想一旦“中奖”，就能改变自己的穷困境地。结果不仅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反而弄得倾家荡产。解放后，有一个职工用他亲身的经历控诉了当年被骗赌马的危害说：“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填到这个无底洞中去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把铺盖和衣服送到当铺里，有时输得身上只剩一条短裤……”。象他这样输得身无分文的人，走投无路，有的甚至上吊或投黄浦江自杀。这种惨剧在当时的上海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大批的金钱却象流水一样倾泻到外国冒险家的腰包里。跑一次马，要赚十六万块银元（当时，十块银元一石米），最多时，一年要跑几十次。所以当时上海人民曾流传着这样的话：“香槟票，到处销，吸尽了中国人民的血，装满了帝国主义者的腰。”除了经济掠夺以外，帝国主义者还妄图以此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达到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

外国冒险家在跑马厅举行赛马之外，还成立了一个“撒纸赛马”总会，经常以“运动”为名举行所谓“撒纸赛马”。这种赛马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了这些家伙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凶恶面貌。他们在每年十一月底到次年三月初，总要接连举行好多次这样的赛马。这种跑马竞赛，是既不在广场里举行，也不走道路，而是专门在田野间乱窜。每当举行这种赛马时，一片绿油油的农田，顿时变成乱糟糟的烂泥地。蔬

菜地受害更深，经过几次践踏，就弄得荡然无存。那些田地被划进“撒纸赛马区”的农民如何不恨？他们曾多次聚众拦阻，进行反抗。因此，在旧上海的历史中，反对“撒纸赛马”，也就成为中国农民反帝斗争的内容之一。

跑马总会的外国冒险家，除了通过赛马的骗局掠夺中国人民外，还对跑马厅里的中国职工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跑马厅雇有几百名中国人给他们饲养马匹，称作“马伕”，每人每月工资还不够个人糊口，更谈不上养家。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工头的压榨下，过着连马都不如的生活。马匹的饲料是用鸡蛋、方糖和嫩胡萝卜等拌和而成的，而养马的人有时却不得不用一些饲料里剩下来的坏胡萝卜来充饥。他们的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住在马厩旁边，拿一些马厩里用过的草当“垫被”。他们不仅生活非常困苦，劳动更是十分繁重，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饿着肚子去蹿马（即牵着马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养马工人多半患有气喘病和胃病。在严寒的冬天，他们衣着单薄，冻得发抖，而那些马匹却穿着厚厚的呢制“马衣”。这真是“富人的欢笑，穷人的眼泪”。

## 文化侵略的据点——大光明电影院

在蜂拥而来的冒险家当中，有不少人是专门从事对我国人民灌输“精神鸦片”的。在这方面，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急先锋。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美帝国主义分子公然鼓吹，“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



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侵略者利用各种特权,在中国极力扩大它有关文化侵略方面的“投资”。仅据一九三六年的一个不完全的统计: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就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

在这些庞大的投资当中,电影事业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解放前上海的影片市场,完全为美国影片公司所垄断。在马路两旁的墙壁上,到处贴有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广告,什么“香艳亲王”,什么“肉感明星”,简直令人触目作呕。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把好莱坞变成它制造“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场所。他们使用层层渗透的办法,通过直接掌握的“母公司”,来控制中国的电影公司,使之成为它的“子公司”、“孙公司”,从而垄断了上海和全中国的影片发行事业。位于跑马厅对面、号称“远东第一”的大光明电影院,就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从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据点。

大光明电影院最初是中美资本家合资组织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同年十二月建成,这是“老大光明”。这家作为美帝文化侵略产物的电影院,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因故停止营业。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英帝国主义分子卢根(文化侵略的老手,一向在中国各地经营影院和经理外国影片的发行),联合美国国际抵押银公司经理格兰马克,组织联合电影公司,取得“老大光明”的地产租借权,用银一百一十万两,改建“新大光明”,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落成。这伙冒险家企图以“大光明”为联合公司的王牌,挤垮其他电影院,独霸上海电影市场。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联合公司内部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丑剧,格兰马克把卢根排挤出去,摘下联合公司的招

牌,换上国光公司的新招牌。这样,大光明也就为美国垄断资本所独占。

长期以来,在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大光明电影院,向中国人民大量地散布反动、色情、凶杀等毒素。早在“老大光明”时期,它就上映过一部名为《不怕死》的反华影片。这部影片恶毒地捏造事实,丑化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侨。这部内容反动、情节恶劣的影片在大光明电影院映出的第二天,便有很多观众写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映。但帝国主义者却置之不理,继续上映。这就更加激怒了爱国的中国观众,第三天晚场放映不久,有更多的观众挺身而出,怒斥美帝炮制反华影片的罪行,要求退票和焚毁影片。电影被迫停映,帝国主义分子一面打电话到巡捕房要求迅速派人镇压,一面躲到影院后头不敢露面。大光明电影院经过这次事件,停映了三、四天,营业一度大为下降。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炮制和推销反动影片,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有着险恶的政治目的。美国统治集团自供:“美国电影是提供给全世界一个抵制共产主义的最好手段”,是“影响世界民意最强有力的手段”。为了达到其罪恶的目的,美国就竭力垄断控制上海的电影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好莱坞的八大公司在上海都设有办事处,分别霸占着上海的首轮电影院。如福斯、派拉蒙公司霸占着大光明、国泰;米高梅公司霸占着大华等等。随着美国侵华不断深入,美国影片也源源不绝地流入上海,每年在四百部以上。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输入上海影片即达一千八百九十六部,其中长故事片就有一千零八十三部。为了使美国影片能独占影院,好莱坞各公司同大光明等首轮影院订有长期合同,条件极为苛

刻。如合同规定：“普通影片放映期最低限度为七天，在规定的期限内，无论卖座好坏，均须继续放映。如卖座成绩不跌入百分之四十五，则映期应无限期延长；如跌入，亦须加映一天，始能抽去。”《战地钟声》一片，大光明竟连续上映了两个月，福斯公司净赚了一万多美元。好莱坞的老板们还不以此为满足。一九四八年，米高梅公司曾计划在现在上海杂技场的这块地方建造一座比大光明更豪华的电影院，当时设计图纸都已画好，只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才使他们的侵略意图未能实现。

美国的影片象鸦片一样，毒害了大批的中国青少年。有的因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弄得神魂颠倒；有的则堕落成盗贼而走上犯罪道路。当时上海的“阿飞”就是在美国电影的影响下滋生起来的。如一个姓瞿的青年，在大光明看了《蒙面大盗》后，竟仿效电影中的凶杀场面，拔出匕首刺死了自己的父亲。美国影片也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一个深受美国电影毒害的原南京路一家绸布店的青年学徒，解放后愤怒地控诉说：“好莱坞电影使我在追求个人欲望中消逝了青春。我仇恨美国黄色电影，它不仅是我的敌人，而且也是人类进步文化的敌人。”

### 鼓吹尊孔复古的仓圣明智学校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在利用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鼓吹孔孟之道。它们抬出孔老二来顶礼膜拜，目的在

于利用孔孟之道作为侵略和统治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历史经验表明，孔孟之道不仅是封建统治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也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政治手段。在旧上海，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腐朽透顶的帝国主义文化，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所极力宣扬的反动透顶的封建文化。设在大吸血鬼哈同“爱俪园”里的所谓仓圣明智学校，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宣扬尊孔复古的据点。

“爱俪园”建成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我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不久，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头子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搞起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进行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一九一四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与此同时，沙俄帝国主义分子盖沙令，跑到上海，伙同一批复辟分子，或策划于密室，或讲演于大庭广众之中，极力宣扬尊孔复古。在这种气候下，大吸血鬼哈同也破门而出，充当了尊孔复古的急先锋。他以“爱俪园”为据点，出版了大批宣扬封建文化的书籍，并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学校。

仓圣明智学校以不收学费和膳费为诱饵，欺骗中国男女青年入学。学校的宗旨是尊孔读经复古。学习的课目中规定有乡射<sup>①</sup>投壶<sup>②</sup>等老古董。哈同完全按照中国那一套反动的旧礼教，如：“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尊女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师道尊严”……等等，对学生进行封建奴化教育，不允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甚至不准学生随

---

① 乡射——中国古代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射礼。

② 投壶——中国古代剥削阶级宴会的一种礼制。方法是以盛酒的壶口作目标，用矢投入。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须饮酒。

便走出大门,还要学生一律吃素。这些按照儒家纲常伦理等规范行事的规定,是帝国主义者套在中国青年身上的精神枷锁。它妄图把中国青年变为孔孟之道的信徒,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学校开办后,那些官僚、买办、地主、豪绅,极力加以吹捧,还派人前往参观,把仓圣明智学校麻醉、愚弄中国青年的毒素扩散到各处。

哈同直到奄奄一息之时,还念念不忘复古。在临死前一天,他对他的忠实奴仆姬觉弥说:“殓葬礼节既须循犹太教典,又要尊崇旧教”。这个大吸血鬼死后的祭堂,也就成了宣扬尊孔复古的场所。祭礼完全采用中国古代的一套。祭堂的布置,与孔庙丁祭<sup>①</sup>时一模一样,还弄来了三个前清遗老,大搞所谓“三鼎甲题主”<sup>②</sup>,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

哈同在尊孔复古逆流中的反动行为,一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虽然这种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正当哈同举办仓圣明智学校时,不少人就公开反对过,指责它“偏于旧学”。在学校里面也有人表示反抗,这种斗争潜流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日益发展,并与社会上的革命运动相呼应。五四运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尖锐地揭露了“孔家店”虚伪的仁义道德,猛烈地抨击了吃人的礼教和“三纲五常”。批孔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直指复古倒退的反动逆流,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政

---

① 丁祭——旧时每年于仲春(农历二月)及仲秋(农历八月)上旬丁日祭祀孔丘,叫丁祭,也叫祭丁。

② 题主——旧时官绅之家于丧事中请人把死者衔名写在“神位”上,以便入庙奉祭,叫题主。

治思想基础。那时，“爱俪园”紧闭的大门和高耸的围墙也阻挡不住墙外革命洪流的影响。学校里有些学生公开起来反对这种与世隔绝的奴隶生活，反对灌输旧文化、旧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哈同苦心经营用来毒害中国青年的这所尊孔复古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宣布解散。

### 宣扬封建迷信的虹庙和静安寺

解放前，旧南京路是以洋化著称的。但说来也怪，就在上海这个闹市的中心地区，帝国主义却保留着宣扬封建迷信的两座古老庙宇，这就是南京路东头的虹庙（又称红庙、保安司徒庙）和西头的静安寺。这两座庙宇一东一西，在租界当局“免照撤捐”、“加以保护”下，门庭若市，香火旺盛。人们从那些身穿西装革履，跑到虹庙和静安寺去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洋奴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合的“妙用”！它告诉人们，在热闹的南京路上保留着两座古旧的庙宇，并非是帝国主义者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也不是为了保存名胜古迹供人游览。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正尊重呢，不过是利用！”只要看一看受害者的控诉，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维护和扶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旧文化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南京东路街道一位老居民控诉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的一个孩子得了白喉，好不容易借了一点钱去医院求治，但医院里的洋老板嫌钱太少，不肯收留，只好眼看着他死去。那时我想大概是‘命’不好，就去虹庙烧香，求神保佑，结果第二个孩子又得了白喉死去。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使

我认识到：求神是没有用的，尽管烧完了香，磕破了头，还是摆脱不了受苦受难。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在旧社会，国内外反动派榨干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又用“安贫乐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封建迷信的说教，来欺骗和麻醉劳动人民，要他们俯首帖耳受压迫，真是恶毒之至！

早在一九〇八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生，就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献策说：“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就是帝国主义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最露骨的供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完全是为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这种文化侵略，在某种意义上，比之使用枪炮刺刀更加阴险和毒辣。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宣扬“西方文明”，还是鼓吹孔孟之道，都是为了适应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需要。它们把《字林西报》、跑马厅、旧大光明电影院、仓圣明智学校以至虹庙、静安寺等等，都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魔窟。任何“慈善”的外衣和“文化”的面纱，都掩盖不了殖民强盗的狰狞面目。



## 八、上海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亚洲人民觉醒了！中国人民觉醒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二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五四时期外滩和南京路的人民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这一运动，迅速地向全国发展。

上海人民也积极起来响应。五月七日在老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二万人的国民大会，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政治要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青年学生组成了演讲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十一日成

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在静安寺路五十一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楼下设立了办事处，进一步开展爱国活动。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老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再次举行大会，二万多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热血沸腾，态度非常坚决，当即宣誓罢课。誓词中说：“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不顾生死，决心坚持到底。”

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妄图用暴力扑灭群众运动的烈火。到六月三日，单北京一地就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其他城市也进行了逮捕和镇压。青年学生在五四反帝运动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单靠这支队伍是不够的，是不能打胜敌人的。

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六月五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最先由纱厂工人和印刷工人开始，后来船厂、电车、烟厂以及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也都相继罢工。十日，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使斗争达到高潮。

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给帝国主义和反动北洋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上海的爱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了。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在店员的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也被卷入这场爱国运动。上海迅速实现了“三罢”——罢工、罢课和罢市。

上海沸腾起来了！外滩和南京路沸腾起来了！

六月五日开始，一队队游行队伍来到南京路，“救国！”“救国！”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两旁商店的店门紧闭，门口高悬旗帜，那些洋货摊、杂货摊、水果摊也都停止营业。永安、先施

两公司开始还在犹豫,后来看到别的店家纷纷关门,也跟着参加了罢市。在这两家公司门口,群众愈聚愈多,斗志旺盛,情绪激昂。

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仇恨万分,工部局接二连三地发布告示,进行威吓,不准成群结队的人在租界马路上行走,要租界里的所有居民,“晚间在家静坐”,如有违抗,“立即严行惩办不贷”。捕房派出大批巡捕,在南京路、广西路、劳(六)合路等马路上往来巡逻。这样,要在租界里开展爱国运动,就必须首先与帝国主义侵华的御用工具——工部局的破坏和镇压作斗争。

五日深夜,学生、店员和学徒等约三四千人聚集在南京路浙江路上,巡捕前往干涉,引起冲突。当时有几十个西捕、印捕和华捕排列成一线,将马路截断,用警棍乱打,企图将群众驱散。被赶群众纷纷爬上永安公司后面正在建筑中的屋顶上,将砖瓦抛掷下去,进行反击。

到了六日,斗争更加高涨了。头一天刚罢市时,还有少数烟纸店从门板横头开一小洞,零卖一些香烟、火柴及兑换银钱等。到了六日,不论大小商店,为了表示同仇敌忾,一致拒绝营业。各店门口都贴着“不除国贼不开门”“不除国贼不开市”等标语。巡捕房动员了大批巡捕专门来撕扯标语,但愈扯愈多;许多标语下面还出现了用粉笔写的“你扯我贴,你扯一张,我贴十纸”的字句,表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决心。这天下午四时半,工部局又派出全部包打听和大批马巡,并使用电车公司修接电线用的汽车,沿路撕毁号召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标语、旗帜。但罢市仍在坚持。

九日下午,斗争更继续增长。手执旗帜和大幅标语的工

人队伍，一队队在南京路上游行。还有许多学生，也沿着这条马路进行宣传和散发传单，其中许多人被巡捕拘入捕房。这天晚上，万国商团分成数队，荷枪实弹在各条马路巡逻，南京路上还增派马队和印度马巡往来镇压。十日晚上，当许多小学的学生列队游行，走到外滩的时候，巡捕抢走了他们的旗帜，并用手杖、枪柄大打出手，使有些年幼的学生受伤。他们又强令静安寺路五十一号内的上海学联办事处迁出。工部局副总巡和老闸捕房的捕头也都出动，到静安寺路上的全国学联筹备处进行威胁，不许再有开会活动。但全国学联仍于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半在南京路的大东旅社六楼举行了成立大会。

这次罢市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坚持，主要是受到店员的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在开始的时候，虽然由于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被卷进斗争的洪流，但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同时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不久就动摇了。特别是象先施、永安等大公司的老板，后来竟企图勾结帝国主义破坏罢市，结果遭到店员的抵制和反对而没有得逞。

五四时期，中国人民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顽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促进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当时充斥于外滩和南京路上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也是一次猛烈的冲击。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运动的高潮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

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 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风暴在南京路上展开，并席卷全国。这就是伟大的五卅运动。

自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工人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二十二个日资纱厂的四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虽然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但事后却拒绝履行，而且不甘失败，伺机反扑。到了四月，便寻找借口，开除工人。工人们又进行了罢工。阴险毒辣的日本资本家竟采用“关厂”手段进行威胁。当时，在沪西一带领导工人运动的青年共产党员刘华同志，和工会代表研究了对策，决定用轮流罢工的方式（你要关厂，我偏上工；你要开工，如不满足工人要求，我就罢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工人上工时，看见厂门紧闭，狠毒的资本家又“关厂”了。工人们要求照发工资。经过一天的交涉，才答应发一半。下午五点多钟，夜班工人要求进厂上工，仍被紧紧关着的铁门挡住。工人们忍无可忍，撞断铁门，冲进工厂。日本资本家对工人下了毒手，拿出手枪朝工人群众射击。这时，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正从车间里抱着一捆打梭棒出来，准备战斗。资本家对他早就怀恨在心，一看见他出来，就对准他开枪。顾正红身中四弹，倒下去又站起来，仍靠着一棵树干指挥战斗。他的头部又遭到敌人铁棒的猛击，鲜血溅了满地。同志们把他送到医院，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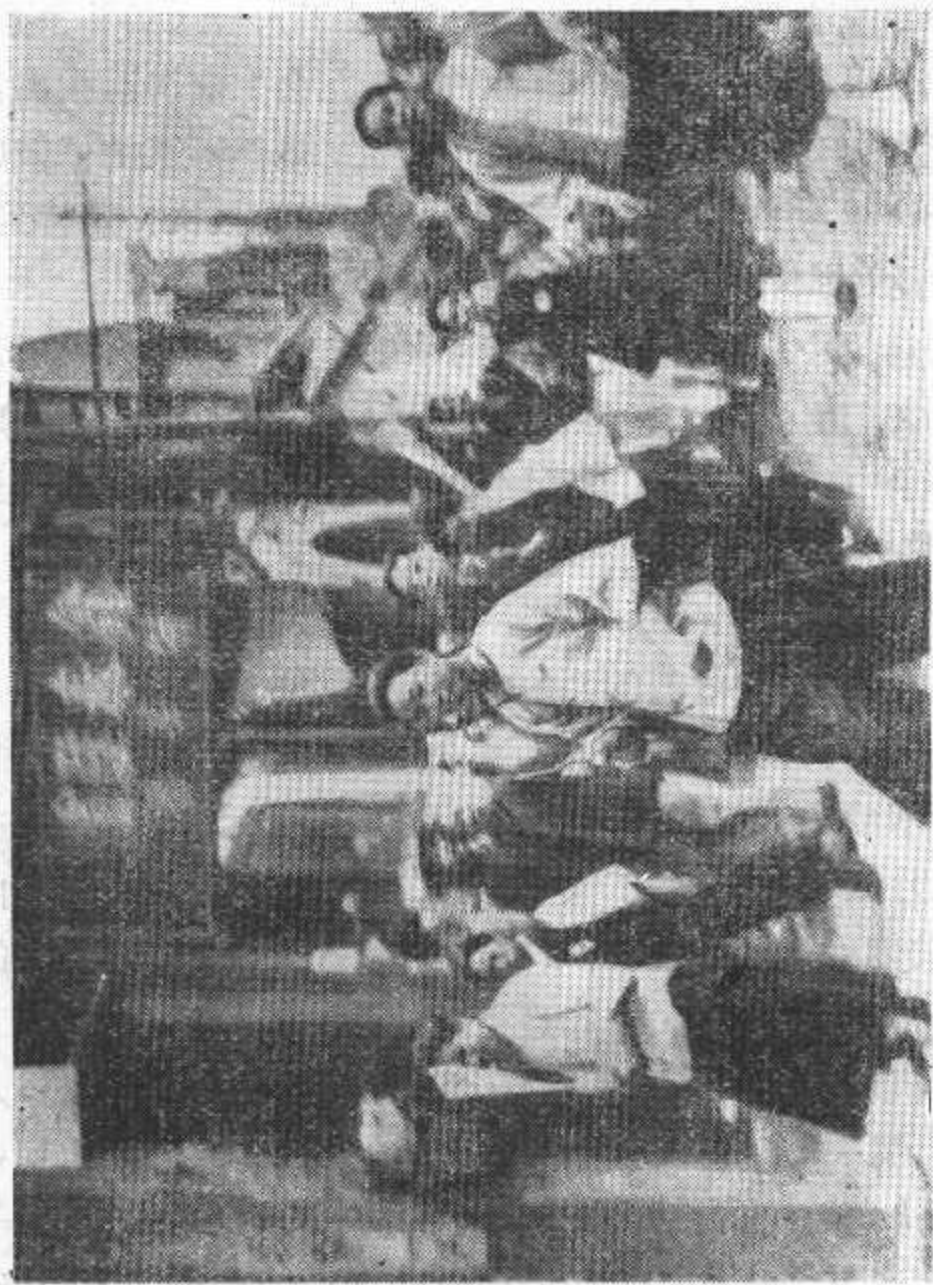
效，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工人阶级的坚强儿子，英勇牺牲了。在这同时，还有十多人受伤，并有七人被捕。

顾正红的牺牲，成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由刘华等同志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了激发工人群众的斗争意志，举行了顾正红烈士追悼会，刘华同志在会上演讲时指出：“打死一个有十个，倒下十个有一百个，火，是扑不灭的！”鼓励大家斗争到底。工人们宣誓：要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上工！

在党的号召下，上海各校的学生起来响应工人的反帝斗争。他们走出校门，上街演讲，进行宣传，并为死伤工人募捐，声援斗争中的工人。工部局出动巡捕逮捕了许多到租界里演讲的学生。

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一场斗争，党中央于五月廿八日举行会议。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张退让的错误，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在上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示威运动。

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二千多人，分头在租界内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进行反抗。这天一早，一队队工人和学生演讲的队伍来到了租界。在外滩公园附近，一部分人刚演讲完，另一支队伍又接了上去。有的工人还把传单贴到一些洋行公司的大门口和橱窗上，连汇丰银行门前两个铜狮子的嘴巴，也贴上了传单。这些爱国热情奔放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手里拿着标语旗子，口里喊着“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每走到一个较空阔的地方，将旗一插，搬过一张凳子，站上去就演讲。演讲的声音越来越高昂，



五月三十日，爱国学生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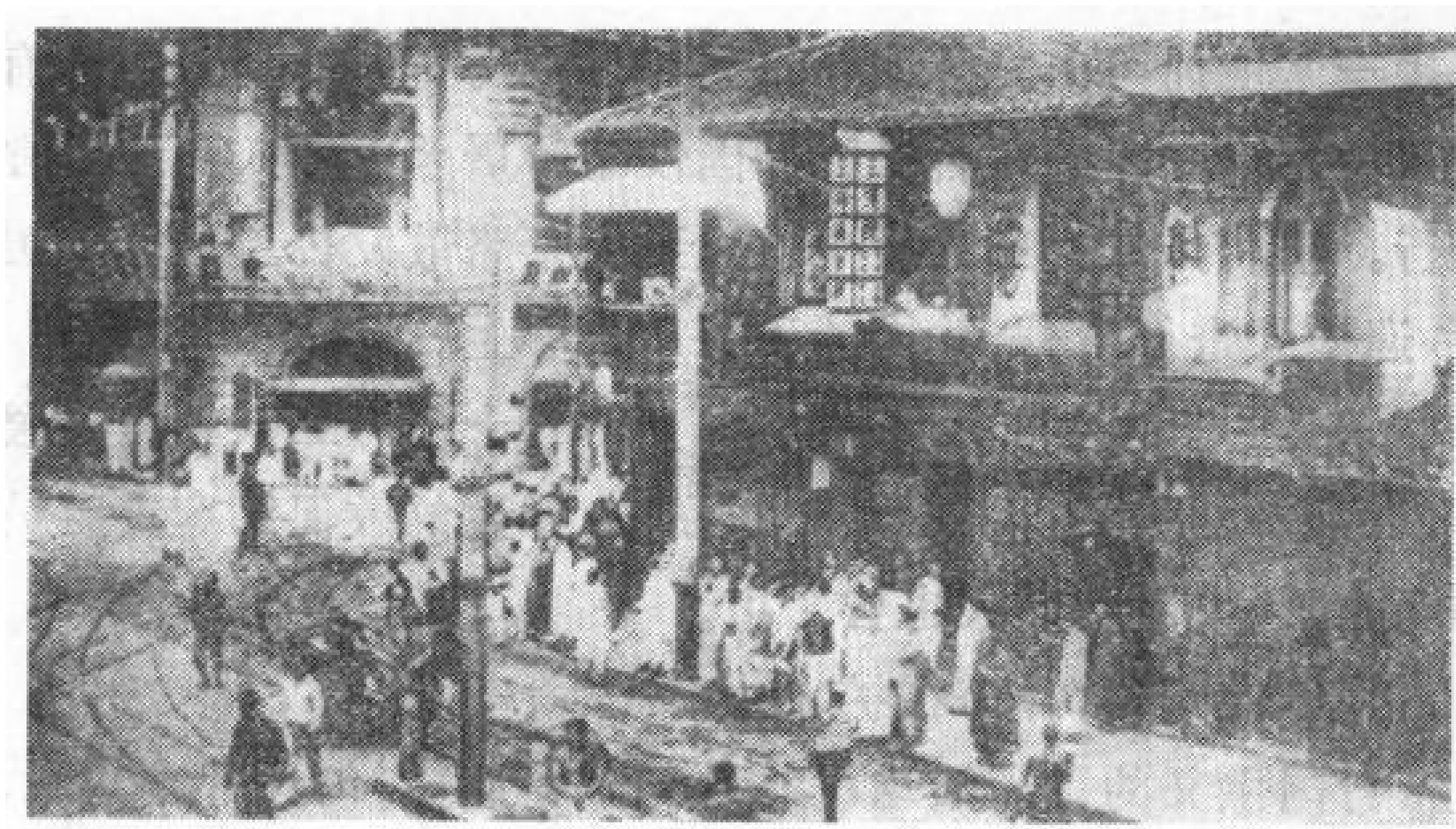
听讲的群众也越听越激愤。广大群众热烈响应，纷纷参加反帝示威的行列。长期蕴藏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反帝怒火，象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了。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这声音犹如晴天霹雳，给那些将上海视为自己领土的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它告诉人们：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日子再也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

“打倒帝国主义”，这口号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决心，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中国人民的怒吼声，惊破了殖民主义者的美梦。侵略者加紧对示威群众的镇压。他们又要下毒手了！

租界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巡捕，沿途逮捕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但是每捕走一批，就有更多的工人和学生接上去，继续进行宣传、演讲、散发传单。



五月三十日的南京路浙江路口，  
帝国主义就在这里残酷屠杀中国人民。

下午一点多钟，南京路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门前挤满了人群。一个青年学生跳上凳子向群众演讲。他讲述洋鬼子在上海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任意逮捕和镇压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残暴行为，他号召大家起来进行斗争，将帝国主义者赶出上海、赶出中国去。听讲的人越集越多，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行驶在南京路上的电车隆隆声被淹没了，最后连交通也被阻塞了。几个巡捕跑了过去，将那个演讲的学生从凳子上拉下来，用警棍进行殴打，并强行将人架进捕房。这时被关押在老闸捕房监狱里的爱国者已有一百多人。愤怒的群众拥向老闸捕房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到了下午三点多钟，聚集在捕房门前的群众达几千人，英国捕头爱活生竟下令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呼！呼！呼！枪声响过，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当场打死十三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动世界的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一日，大雨滂沱，英勇的中国工人、学生，依然一队接一队地拥向南京路，举行示威大游行。上午八点左右，有一队学生挨户向各商店控诉外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午后，又有三五百个学生到南京路散发传单，动员罢市，巡捕又进行拦截，并拘捕了五六个学生。

六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五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在工人、学生的敦促和广大店员的压力下，大部分商人也罢了市。

斗争在继续，斗争在扩大。

帝国主义的镇压活动也有增无减。巡捕、包打听出动了，万国商团出动了，海军陆战队出动了。救火车的水龙皮带已经不顶用了，他们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楼上和浙江

路口的“日升楼”架起了机关枪，又拉来了炮车。黄浦江上的帝国主义军舰增加到二十四艘。六月一日上午九时，有两个中国居民在永安公司附近看见商店关门罢市，高兴得拍手称快。这时，万恶的巡捕竟开枪把他们打死。十点钟，巡捕又开放排枪数次，有二十多人倒地致命。

在枪杀、殴打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作为帝国主义侵华武装别动队的万国商团，更是残暴凶狠，兽性毕露。一个万国商团美籍团员曾经作过如下的自供：“我们在这里天天早晨分派巡捕到各处去站岗，上半天就在礼查饭店里喝酒打架，到了下午同晚上呢，去枪杀那些发狂的中国人。……四个人死在捕房门外，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门上溅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地泞滑起来。”“第二天饭后，我们又全副武装，持久同他们对敌，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有许多人成了终身的残废，南京路上流了许多鲜血……”。“我们又开起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种车子开过去之后，发生的惨状真是厉害得很，轧死了两个人……”。外国侵略者就是妄图通过这种血腥的镇压，来扑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

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他们不怕枪击，不怕坐牢，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人们痛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愤怒地指出：“这两日的虐杀残暴，比豺狼虎豹，还狠毒百倍……流血满街，死尸遍地！这种杀人强盗，应赶快起来反抗它，打倒它！”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的《京报》上，报道了一个被捕的爱国学生，指着侵略者的鼻子训斥他们说：“你们捉吗？打吗？无论如何只能束缚、禁止中国人的身，却不能束缚、禁止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民的心不死，民族解放革命工作不息，打

倒你帝国主义不止！被你们打死的中国人，他们虽死了，还有我们，还有四万万的中国入哩！……现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觉醒起来了，要革你们帝国主义者的命！”这义正辞严的声讨，反映了上海人民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五卅运动期间，除了运用赤裸裸的武装镇压的手段外，还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妄图从精神上来扼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意志。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喉舌、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攻击五卅运动是“中国万千学子，不研究孔圣等学术，……卒为布尔什维克所乘……”。《字林西报》也起劲地鼓吹要军阀政府下令学生回校去安心读书。在殖民者控制的会审公廨的法庭上，美国领事讯问被捕的学生是否读过四书五经。审判官关炯之在公堂上也搬出孔老二的“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的说教，要青年学生放弃反帝斗争。还有那些买办文人，如胡适、陈西滢之流，以及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一伙，都一个个跳了出来，搬出孔孟之道，念一遍“中庸”、“忍让”的符咒，妄想用以捆绑革命人民的手脚。有着反孔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针锋相对，从思想战线上开展了批孔斗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肖楚女同志，写了《孔圣学术与英国底机关枪》一文，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者“所以崇拜东方文化，所以希望中国人，劝诱中国人去读古书，所以痛恶中国人赤化，所以严防布尔什维克，都只是为了怕中国人觉悟了去打击他们底资本主义。”在公堂上，革命群众对中外反动派的孔孟说教轻蔑地报以“合座大笑”，公开宣布孔孟之道“为二千年以前学说，今不适用”。

思想战线上的批孔斗争，进一步推动了五卅爱国反帝运动的发展。六月七日，上海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

学联合会。十一日，工商学各界二十万人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其中包括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凶、赔款、道歉等内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由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总商会，本来就是被迫才勉强同意罢市的。运动的不断扩大，吓坏了国内外反动派。当时的总商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便急忙地跳出来，破坏反帝统一战线。他另行组织一个所谓五卅事件委员会，通过了旨在保护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十三项条件，并主张六月二十六日单独开市。总商会还私自扣留各地募捐来的援助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租界当局则利用他们控制的银行和电力公司等机构，以停止借款、停止通汇、停止供电，威胁民族资产阶级，破坏罢市。但工人的罢工斗争仍然坚持了一百天。

五卅运动的革命大风暴迅速地席卷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重庆等许多城市的群众，也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五卅运动成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 九、日本侵略者的独占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对上海公共租界支配权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们在争夺中国霸权方面力量的消长。

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在英、美、日共同支配的上海公共租界里，还是英帝国主义的权力最大，其次是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居于第三位。外滩和南京路主要是英、美殖民者的天下；除了三两家银行以外，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在这里还吃不大开。从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会来看，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它里面还没有日籍董事。从一九一六年起，工部局开始有了一个日籍董事，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二人。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本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工部局共有外籍董事九人，英帝国主义者占五人，美、日帝国主义者都是二人。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由于分赃不平而心怀不满；它在妄图征服整个中国的同时，也急切地想把所谓公共租界这块肥肉，一口独吞下去。

### 从“共管”到独占

一九三七年底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租界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一方面被称为“孤岛”，完全为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所包围；另一方面它在表面上仍然维持着所谓“中立”的地位，是英、美、日帝国主义共同控制的殖民地，而英国的权力依然占有优势。这种局面自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日本在当时因为要从美国取得军事物资，并策动所谓“远东慕尼黑”<sup>①</sup>阴谋，企图借英、美的力量，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所以还不想把英、美在上海的势力一下子全部排挤出去，但已着手采取种种步骤，对工部局施加压力，来进一步改变英、美、日帝国主义在租界里的力量对比。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不久，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日本侵略军约六千人，附有野炮和机关枪队，天空有八架飞机掩护，从沪西丰田纱厂出发，经过南京路外滩，开往虹口。所经过的路线，完全断绝交通。当行经南京路广西路口时，被从弄堂里抛出的手榴弹炸伤三人。日本侵略军立即封锁了这一段地区，进行搜查。惊慌失措的工部局赶忙贴出布告，说：“凡是伤害武装军队（指日军）的人，都要移交被伤害的武装军队”。日军的这次行动，不只是为了夸耀它的军事力量和侵略战争的“胜利”，它还含有向英、美租界当局示威的用意。在此以前，日本军阀虽然已经把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变为战场，南京路、外滩和“大世界”门前也落下过炸弹，但大批日本军队开进苏州河以南地区，在外滩和南京路上横冲直撞，这还是第一次。

---

<sup>①</sup> 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慕尼黑协定”，英、法出卖捷克，幻想以此换取德国法西斯把侵略矛头指向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但是，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德国就把兵锋直指英、法，慕尼黑协定在历史上留下的是一份可耻的破产记录。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英、美帝国主义曾几次酝酿，妄图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阴谋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的阴谋类似，所以被称为“远东慕尼黑”。



在这以后，日本卵翼下的汪伪政权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魔爪，也伸到租界里来，特务在马路上开枪杀人，巡捕不敢过问；日本宪兵不时进入租界捕人，还命令巡捕担任向导。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向英、美势力的公开挑战。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三浦，奉日本军阀政府命令，往访工部局总董樊克令，其势汹汹地叫嚷：租界内有中国“恐怖分子”活动，“租界警备力薄弱，不足维持秩序”，随即提出两项要求：一、“大量增加日籍警员人数，俾日方能充分与（租界）警务当局合作，以维持治安秩序”；二、“日方武装军队于必要时，有权在租界区域内直接行动”。据东京《朝日新闻》载称：日本军阀政府还命令上海日军头目和外交人员，向工部局提出“根本改组工部局”的强硬要求。

工部局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一面赶紧发表声明，“欢迎日警及宪兵合作”，同时出动大批巡捕和商团，在英、美军和日本宪兵的配合下，在租界范围内，进行一系列搜查所谓“恐怖分子”的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重点搜查自外滩至西藏路一段，南京路的所有路口和里弄，一律封锁，设置铁丝网，禁止居民出入，并在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和东亚旅馆内，逮捕中国青年数人。英军的巡逻兵每天下午都沿外滩和南京路巡逻。带着轻机枪，载有白俄商团的卡车，亦往返奔驰在这些热闹地区，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但日本军阀政府对此并不认为满意，它指使南京汪伪政权开展所谓“反英运动”，提出“收回所有英租界”的口号。日本外相也发出威胁，要求“英、美合作，以实行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的政策”，其中包括“改组公共租界的选举制度”和“改组工部局董事会”等内容。日本军国主义者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夺取上海租

界的计划。它的这种企图，到一九四〇年时已是“路人皆知”的了。这年十月份在上海出版的一份杂志上就刊登过一篇题为《替上海算命》的文章，推测日本很快就将采取行动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当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制造反共反苏局面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日、美、蒋之间加紧酝酿着的时候，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发表声明说，英、美、日三国间成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协定，本年董事会将改组，董事名额将有变更，英籍董事由原来的五人减为三人，日籍董事由原来的二人增加为三人，同英国一样。这是英、美在上海租界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明显的妥协的步骤，但同样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的是对上海的完全独占，而不是在工部局董事会里增加一两个董事名额。

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实行的政策，正象他们在远东实行的政策一样，是妄图通过牺牲中国，保存租界，保存他们各自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但英、美帝国主义这种损人利己的政策，只能进一步纵容和鼓励日本的侵略，其结果是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上海则是公共租界的被日军占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晓前，驻上海的日本侵略军的头子，致牒停泊黄浦江中的英舰“白特尔号”和美舰“韦克号”，宣称日本已对英、美宣战，要求该舰于二小时内投降。接着，大队日军在蒙蒙细雨中，沿四川北路经外白渡桥，开进外滩和南京路，对公共租界实行了军事占领。

日本侵略军最初还企图利用原来的工部局作傀儡，在表面上暂时维持上海的所谓“国际都市”的地位，所以命令工部局原有人员一律照旧供职。南京路外滩转角处并排贴出日本

侵略军的“告示”和工部局“要求日方协力维持行政、治安，并遵照日方意志执行职务”的声明。但这种滑稽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三周以后，工部局的所谓总裁、总办都换上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英、美侵略者从一八四三年以来，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被另一个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所代替。上海由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

## 恐怖统治

在上海租界居住的中国人民，本来就处于一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租界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他们同所有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暴的殖民统治下，更处于被奴役、被掠夺、连生命也毫无保障的悲惨境遇中。

日本侵略者强占中国的土地，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马上建立起血腥的恐怖统治，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

日本侵略者经常采取的一种恐怖手段是封锁。

日本的陆海军对租界划分了管辖范围，以西藏路为界，以东属海军管辖，以西属陆军管辖。南京路上的跑马厅，成为日军临时的兵营。南京路山西路口的南京饭店，驻有日本的宪兵。大光明电影院西首今长沙中学的房子，是日本的宪兵司令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即日军占领租界后的第二天，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墙壁上，贴有一张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所谓“人质布告”，宣布凡是发生所谓“恐怖事件”的地区，都将实行

无定期的封锁，断绝该地区对外的一切联系，直到查出所谓“恐怖分子”为止；对该地区的住户代表，将拘送日本宪兵队，“从严惩处”；“凡知情不报者，予以严厉处分。”这是日本侵略者仿效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占领区枪杀“人质”，和国民党反动派围攻革命根据地时推行的“连坐法”而制定出来的极端野蛮的政策。

日本占领期间，在外滩和南京路的热闹地带，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丑剧：一个左臂佩有一块臂章的家伙，鬼头鬼脑地穿过人群。周围的居民和行人，都以冷淡和鄙视的眼光，投向这个“神秘人物”。而日本的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紧跟在这个人的后面，但注意力却对着群众，留神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和表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制造紧张气氛而举行的所谓“恐怖演习”。这种演习，有定期定点的，也有不定期不定点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是假扮的“恐怖分子”。警哨一声，就表示这个地区已发生了所谓“恐怖事件”。日宪兵和伪军警立即出动，断绝交通，搜查“恐怖分子”。居民和行人，看到这个佩有臂章的人走过，就得大声喊出“恐怖”二字，叫邻近的行人听见；还要记清那个“恐怖分子”的像貌、服装及去向，立即报告附近的敌伪军警机关。凡是不按照这种要求做的，都要受到严厉处罚。这种演习，最初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有一次在南京路西藏路口一带演习时，敌人派出便衣侦探多人，测验居民和行人的反应。结果同演习规定的要求相反，没有一个人肯喊出“恐怖”二个字来。上海人民十分厌恶这种“演习”，所以都拒绝这样做。侦探便罚这些人面墙而立，用粉笔在他们的背上画个十字。一会儿警车开来，把背上画有十字的人捉往虹口关了起来。日本侵略

者虽然采取这种法西斯手段,但每次演习,都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这种丑剧后来也就演不下去了。

但是当这种“演习”一旦变成真刀实枪的封锁时,它就更加杀气腾腾,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

外滩南京路一带被封锁过好几次,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一个月。这次封锁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正是阴历年的除夕。封锁的范围,东自河南路,西至西藏路,北达苏州河,南到延安路。几天以后,先行局部开放;永安公司一带则一直封锁到三月十日才结束。

在这样长的期间,封锁区内的中国居民,完全与外界隔绝,绝食断炊,疾病死亡,真是苦难重重,一言难尽。有些人试图偷钻铁丝网出逃,结果大都遭到巡逻敌军的枪杀。据老闸区伪联保第十保向伪保甲自治会报称:“数日以来,被封居民,忧形于色,群情惶惶,莫知所措”,“各居民之粮食问题尤为严重”,因居民所发米票指定须往北京路一〇二一号米店购买,但该店在封锁线外,居民不许跨越封锁线买米,这样“势必酿成饿殍,转填沟壑”。又据残缺不全的统计:在封锁期间,老闸区宋家弄封锁区,死亡二人,出生二人,断粮者一百五十余人,大多数人家“燃料极感困难”。大新封锁区,病六人,绝粮户计二十六人,燃料告绝者三户十六人。顾家弄封锁区,从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一日,死亡五人,病四十八人,出生二人,“粮食非常缺乏”,“煤球大都告罄”。永安封锁区从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日,死亡六人,病二十六人,缺粮一百七十人,燃料缺乏三十二户。又伪老闸区第四区第一、二保,在封锁期间,死亡五人,路毙五人,出生二人,缺粮一百五十余户。这些死了的不能抬出去埋葬,坐视尸体腐臭;生病的无处就医,也无处买

药；马桶无人倒，垃圾无人清除，“里弄内粪便满地，垃圾堆积如山，秽气四溢，几难举步。”这些充满着血和泪、仇和恨的事实，反映了沦陷区中国人民的苦难，记录了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罪行。

日本侵略者搞这次封锁，据宣布是因为在米高梅等几家舞场发生所谓“恐怖事件”，实际上却是为了威胁居民加紧组织伪保甲和成立伪“自警团”。敌人宪兵司令部宣称：不完成保甲的编制和普遍建立起自警团，南京路的封锁决不解除。敌人强迫自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除医师及公务员外”，一律参加伪自警团；在马路上，隔不远就设立一个警亭，自警团轮班站岗，任务是“配合军警维持治安”。但据伪警署调查：自警团站岗，遇日本巡逻队经过，才站出来装装样子，平时不是躲在角落里打瞌睡，就是看小说，“根本不把任务放在心上”。

日本侵略者强迫居民参加自警团，维持所谓“治安”，但在实际上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进行抢劫的，就是日警和日本浪人。他们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六人为一组，二人遮前，二人断后，二人居中向行人索阅市民证，顺手就把财物拿走，叫做“打起发”。遇到妇女身上带有金银饰物，也一律攫取，名曰“强迫献金”。

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不甘心忍受侵略者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反抗。当时南京饭店转角处设有日军岗哨，强迫经过那个地方的行人脱帽鞠躬，但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人们宁愿绕道走，也不肯去受那种侮辱。有一个老工人，家就住在附近，上下班原来都要经过那个路口。敌军在那里设岗后，他每天情愿多走二十分钟的路，从相反的方向绕道走，这样一直坚持到日军投降。

日本侵略者对外滩和南京路实行独占后，接收了老闸捕房的全部机构和人员，也继承了它镇压和统治中国人民的全部经验，另外还增设了个“特高科”，专门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它里面还挂有血淋淋的人皮、人的四肢和耳朵，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刑具，用以对被审讯者进行威吓。附近居民每天夜静更深之时，常从那里面听到惨绝人寰的叫声。人们把沪西的“七十六号”称作“魔窟”，而把这个被日军占领后的巡捕房比作“鬼门关”。被逮捕进这两个地方去的中国人民，是很少能够活着出来的，绝大部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 残酷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在中国实行了一项极其恶毒的政策，叫做“以战养战”。就是要加紧掠夺中国的物资财富，把中国沦陷区变为它进行侵略冒险战争的基地。随着战争的持久和扩大，日本国内的物资日益枯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沦陷区物资的掠夺，更是不遗余力。

上海是华东沦陷区物资集中的枢纽，是日本侵略者经济掠夺的重点。掠夺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原料和粮食等战略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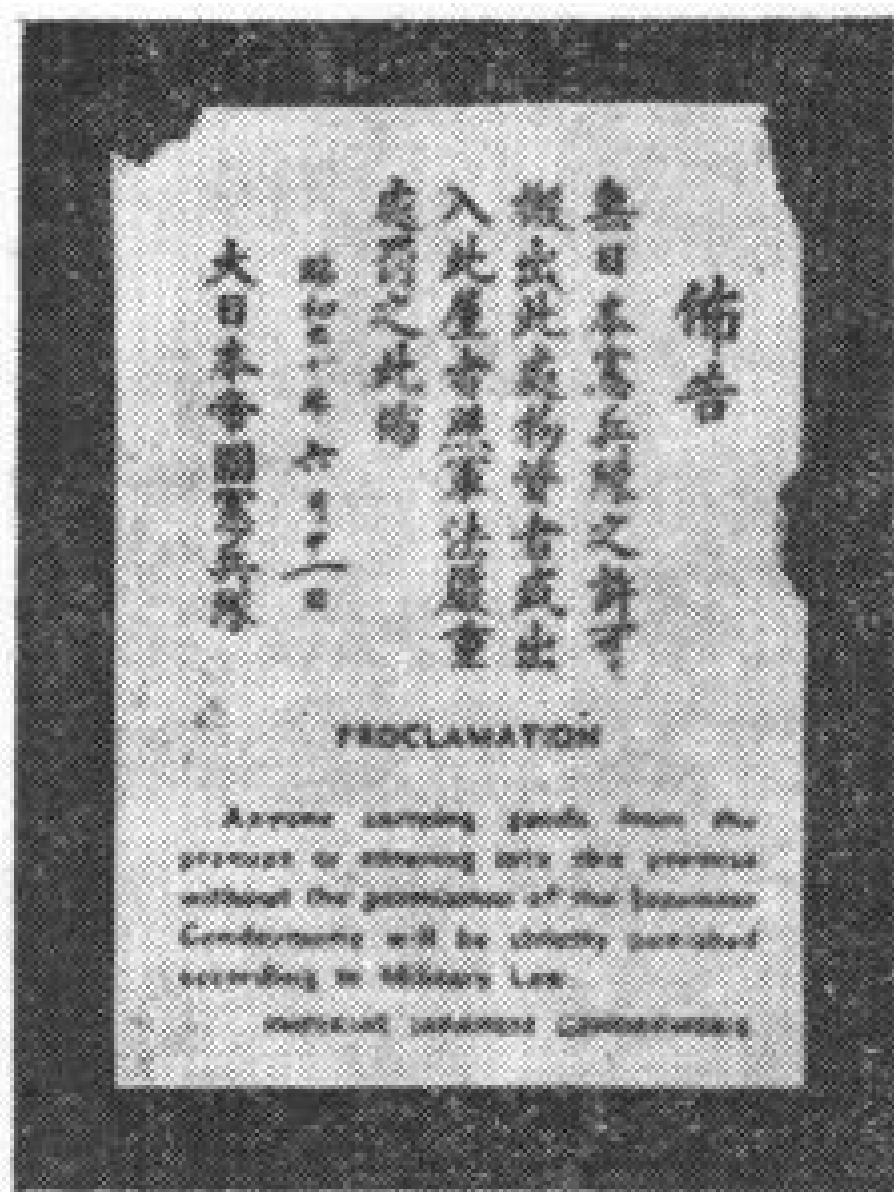
敌人掠夺工业原料的手段之一是对这些物资实行严格统制。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一个设在南京路中和银行大楼（今南京东路四〇二号，建设医药商店店址），名叫华中非铁五金工业统制协会的敌伪机构，在报上刊登通告说：“现奉当局令，办理非铁金属原料及制品登记，限于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藏有者须向各同业公会登记，转报本会，否则一经查出，即予充公。上述各物移动时须领搬运证”。同年二十二日，又有



一个所谓钢铁业统制协会出笼。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占领军军部出面发出“统制一切物资”的布告，规定凡是属于钢铁业、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毛制品、麻及麻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矿油、煤炭、机器及附属品、米及粮食……等物品的使用、制造及贩卖，均受统制。倘无“兴亚院”<sup>①</sup>的许可证，绝对不许移动。布告列举了十八项物品，但顾名思义，既然称作“统制一切物资”，那就是说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吃的、用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一一列举，倒反而是不必要的了。

这“一切”物资登记之后，不许动，不许卖，也不许自用，而要专供日本侵略者征用、征购、或者指定“捐献”，所以名义上叫做统制，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掠夺。

为了加强统制，日本侵略者在外滩、南京路及其他马路到处设有关卡，仅所谓“经济警察”就有八百余人。这些象飞蝗一样的害人虫，到处以检查为名，不分白天黑夜，任意穿房入室，进行敲诈勒索，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对路上行人的检查，则身上不论是否带有“违禁”物品，都必须塞给他们钱，才可以放行，并公开地称之为“买路钱”。



日本侵略者张贴的布告。

日本侵略者对粮食的统制，手段更为残酷。老居上海、经历过四十年代那一段苦难生活的中国劳动人民，现在回忆起

<sup>①</sup>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近卫内阁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和扶植伪政权的罪恶活动，决定设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

当年“轧米”的情景，还是满腔愤怒，犹有余痛。

一九四二年，敌军制定计划加紧在华东沦陷区抢掠大米。城市和乡村的米，都被敌人统制起来，留作所谓“军粮”和运回日本国内去了，留给上海居民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质量差和杂有砂子的霉米，另有一部分杂粮。

一九四二年七月起，在上海，米开始实行配给。这种配给的米，被称为“户口米”。最初，“户口米”按照规定，一周为一期，外滩和南京路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期只允许购米一升半（米质分两种：一升为白米，半升为碎米；第二期改为一升碎米，半升白米；第八期又把碎米改为苞米粉）。这一升半米通常可煮饭八、九碗，饭量小的人可勉强维持二至三天，缺粮四至五天。不久又改为十天一期，但米的数量却没有增加，这样缺粮的天数就更多了。而且它还经常延期，有时一两个月连一粒米也不供应。有人曾作过统计：一九四四年一整年内，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居民，每人所得“户口米”，总数为八六点七五斤。其中米三斗四升半，面粉头号十三斤，二号十四斤半，三号二斤，苞米粉二斤，黄豆四斤。平均每人每天大约只有二两半。这么一点点粮食，怎么够吃？然而日军却用黄豆和二、三号面粉作牲畜饲料。在这伙侵略者的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是连牲畜也不如的。

但是，就连那么一点少得可怜的“户口米”也是不容易买到的。每逢集米的日期，所有米店门前，都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夏天冒着酷日当头，冬天忍受寒风刺骨，还不时要遭受在场弹压的巡捕的皮鞭抽打。有的人隔夜就来到米店门前，露宿以待。许多人鹄立终日好不容易挨到，却米已卖完，或时间已到，米店打烊，只好空手而归。还有一些同巡捕和敌军相互勾结

的汉奸、地痞、流氓，专搞“轧米”，乘机捣乱，从中渔利。

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民谣：“配给配给，配而不给，等待配给，饿得断气。”“户口米”不能糊口，只好靠买黑市米过日子，而黑市米价则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扶摇直上。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黑市米价超过“八一三”事变前米价的四千倍。广大劳动人民买不到“户口米”，又买不起黑市米，只有忍饥挨饿，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仅一九四二年二月间的几天之内，上海因饿冻而死的就有八百多人。南京路浙江路口一些商店的屋檐下，每天早上，都有许多尸体横陈，惨不忍睹。这种普遍的饥饿和大量的死亡，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经济掠夺所造成的严重罪行。

“八一三”后，日寇在闸北、南市、浦东等地区疯狂烧杀淫掠，造成“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又在金山卫大肆屠杀当地居民，留下了“杀人塘”的血腥事迹。这些暴行，连同它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和对解放区“扫荡”时实施的“三光政策”，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性的表现。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租界后，对外滩和南京路这样的闹市区，在殖民统治的手法上，还算隐蔽一些，但其奴役、压榨、残害上海人民的残酷程度已是如此，那么其他沦陷区的情形就可想而知的了。

## “交还”丑剧

日本军阀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在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破产后，便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毒计，妄图以此来欺骗中国人民，蒙蔽世界舆论，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导演的所谓“归还”公共租界的丑剧，就是这个毒计的

一部分。

这一年的六月底，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签订了一个协定，确定于八月一日“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到了那一天，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了一个绝无民众参加、全是群魔乱舞的所谓“民众庆祝大会”。汉奸头子汪精卫到会发表了一篇臭不可闻的演说，狂吠“上海租界的收回”“是友邦日本援助的力量”，无耻地颂扬他日本主子的“功德”。上海的敌伪电台和报纸，也大肆叫喊，胡说什么：“收回上海租界是日本帮助中国赶走英、美势力的结果。”敌伪这样大吹大擂，上海人民却一眼就看穿了侵略者的诡计，对这出丑剧，报以极端的鄙视和憎恶，他们知道，在日本军队把大片中国河山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上海公共租界的“交还”，只不过以一种殖民地形式代替另一种殖民地形式而已。

八月以后，公共租界改称为上海市第一特区；老闸捕房改称为第一警察局；外滩、南京路一带原先挂着写有“大日本军管理××公司”的招牌也收起了一些，有些部门和机构的头目，也改由汉奸充任，日本人则暂时退居幕后指挥。日本侵略军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了，但事实证明，无论侵略者施展血腥镇压的手段，还是玩弄欺骗的花样，都不能达到它的反动目的，而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 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

上海人民有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传统。在日本军阀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时，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以各种方式，进行英勇斗争，给敌人以沉重

打击。他们组成各种救亡团体，发起广泛的募捐运动，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单是沪西一个地区，从日本纱厂里退出来的中国工人，就有六、七万之多；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有五百余人拿起武器，奔赴战场。外滩码头工人，一致拒卸日货；他们和邮政工人，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一道，组成战地服务团和义勇大队，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许多青年工人和学生，还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和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五月，海关员工开展了抗日“护关”运动。当时，正在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英帝国主义者，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默认，和日本侵略者订立了所谓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答应把原存汇丰银行的税款转存外滩的日本正金银行，并由日本派人接管上海海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二千余海关员工，举行政治罢工示威，喊出了“反对英日协定”、“誓死不和敌伪合作”的口号。外勤人员全部离开了岗位，由十六铺码头排队拥进了海关大楼，和内勤人员会合，举行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者牺牲中国利益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反动行为，并通电全国各关，一致反对敌伪接管，拒绝和他们合作。与此同时，上海的学生群众，也发表了“援助江海关华员反对伪组织接收宣言”。爱国群众的严正立场，打击了敌伪的凶焰，使日本委派的伪海关监督很久不敢前往上任，日籍的关员有一个时期也不敢“上关”。

在上述海关员工的抗日“护关”斗争中，共产党员茅丽英同志发挥了带头和骨干作用。一九三八年冬，她担任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各阶层职业妇女，积极开展抗日工作。为了支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人民子弟兵——新四军，她们发起节约献金，举行“义演”和“义卖”，

在各界支持下，捐得款项达当时币值数万元，并募集了万套棉衣。敌人把她看作眼中钉，百般进行威胁，但她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匪徒，在南京路职业妇女俱乐部门前，对她下了毒手。她身中数弹，送入医院后，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了茅丽英烈士治丧委员会，她的遗体在殡仪馆大殓，参加者达二千余人。对烈士的哀悼，扩大了抗日宣传，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血腥恐怖统治。正如当时一个工人团体在挽联上所写的：“暴力恐怖，毁灭不了正义的斗争；烈士的血，开辟了后继者的道路”。

一九四一年日本占领租界后，租界内各工厂企业里的中国工人，也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使敌人无法顺利地进行接管。在敌人强行接管后，许多工人仍然继续拒绝上班，或实行怠工，使敌人无法恢复正常生产。

一九四二年后，在敌人殖民统治最严酷的条件下，广大工人排除万难，继续开展抗日罢工斗争。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海就发生过八千多名邮政工人的罢工斗争。这年，从六月七日起，七天之内，南京路等处又连续发生过六次罢工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自来水厂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使上海全市一度停水。六月二十二日，又有数千名电车、汽车工人罢工，时间长达一月，使上海闹市区的公共交通大部陷入瘫痪。这些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不甘屈服的精神，表明了日本侵略者玩弄交还租界，实施“以华制华”毒计的破产。这些斗争，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战争。

## 十、在美蒋的反动统治下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日子，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终于结束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人民，满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被奴役、受欺凌的苦难历史，可以扬眉吐气地过日子啦。但是，抗战期间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独夫民贼蒋介石，这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跑下山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他一面荒谬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许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和解放敌人占领的城市；一面引狼入室，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登陆，使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刚被斩断，又伸来了美蒋反动派的魔爪。外滩、南京路上出现了美国星条旗横七竖八，美国吉普车横冲直撞，美国爵士音乐嘈杂喧嚣，美国剩余物资泛滥成灾的混乱景象。虎去狼来，外滩、南京路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有增无减。

### 胜利后的劫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



介石反动派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急急忙忙地用美国运输机，从湖南芷江基地运送大批军队，抢占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派出许多所谓接收大员，大肆抢劫日伪产业和物资。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明文规定：“各受降区之接收工作，须有中央统一规划布置，由中央派员接收”，但是这些“规定”、“法令”除了欺骗舆论之外，在反动派内部则不过是官样文章，做做样子而已。在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期间就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地痞、流氓，这时摇身一变而成为“地下工作者”、“抗日英雄”。他们近水楼台，择肥而噬，大肆抢劫了一批。那些手头上掌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航空总部、海军部、后勤总部等蒋帮军事机关，也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捷足先登，又掠夺了一批。等到蒋介石自己圈定的那批接收大员，从西南飞到上海，已经是第三批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眼看着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于十月间取得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归陆军总司令部主持外，其余有关行政方面的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又派了一批爪牙，分赴各地进行接收。他派到上海的劫收机关——行政院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最早便设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口大沪百货公司楼上。这样一来，在上海竟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外滩和南京路上到处可见飞扬跋扈的接收大员。他们有的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有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有的则是从横里窜出来的。他们犹如一群饿狗争食，你抢我夺，闹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有一次，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蒋帮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了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的房子，竟发展到开枪互击，死伤多人。许多有用的物资往往几个单位争执不下，无法及时处理，以致烂光、偷光，损失殆尽。更令人气愤的是，

他们为了争先接收，根本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接收大员一到，立刻把厂里的工人哄骗出厂，然后在门上贴一张封条，就算了事，从而造成大批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当时，上海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他们不是接收，而是“劫收”，劫收，劫收，劫掠一空。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接收的真实情景。

这伙所谓接收大员都是些贪得无厌的亡命之徒。他们把接收看作是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争相运用抢、占、偷等手段，进行贪污盗窃。如当时上海全市有日“侨”房产和汉奸房产五百多幢（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布的数字，实际远不止此数），被国民党特务、军队、宪警的高级官员首先把屋内现金财物、家具用品搜刮一空，然后占为己有的就有五十多幢。如大汉奸邵式军的住宅被上海国民党头子吴绍澍占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有财产被抢劫一空，保险箱内大量金钞珠宝也都被盗。为了这个“保险箱案”，蒋介石曾命特务头子戴笠亲自调查，结果也是不了了之。至于接收人员监收自盗，偷窃大量物资的事件，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了。当时社会上把这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比作“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等），他们都成了大发“胜利财”的暴发户。

接收中的最大盗窃犯是蒋宋豪门，一切日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而最后的处理大权还是掌握在宋子文手里。他借口日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由伪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日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价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交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因此，一些大的日伪工商企业都落到了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手里。如

当时在上海数字最大、资金最多的日伪纺织工业，就被宋子文以“转让民营”为名，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名义，全部转为四大家族所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拥有一百万纱锭，占当时上海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成为纺织业的托拉斯，垄断了上海以及全国的纺织工业。

国民党反动派通过接收日伪物资，进一步扩大了豪门资本的实力，为他们残酷压榨中国人民提供了条件。许多国民党的军官、官僚、特务、党棍都在劫收中捞了一把。他们利用这批赃款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更加闹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受尽日本军国主义者压迫、剥削的上海劳动人民又遭受到一场新的灾难。

## 美 帝 暴 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在经济上的劫收、掠夺，是和政治上的独裁、卖国伴随在一起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大肆劫收日伪产业、物资的同时，一方面继承了全部的日伪统治机构，留用了大批汉奸特务，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引狼入室，同美国政府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使美帝国主义统治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黄浦江上，美国军舰耀武扬威长驱直入；外滩和南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广大中国人民受尽美帝国主义的荼毒。单拿车祸一事来说，就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美国吉普车的车轮下无辜丧命。

据国民党政府极不完全的统计，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

日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这短短的四个月中，上海发生美军车辆肇事近四百九十五起，有二百一十八名中国人受伤，十几人丧命。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这半个月中，上海美军肇祸近一百二十三起，中国居民伤亡一百零五人。另据当时广慈医院的职工统计：一九四六年八月份一个月中，被美军吉普车撞伤送到该医院医治的就有三十五人。据估计，一九四六年八、九二个月中，不幸死伤于美军吉普车轮下的上海人民至少有三百五十人，平均每天伤亡在五人以上。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美国海军中校克力司丁生，驾大型吉普车一辆，在南京路上疾驰，到山西路口时，突然冲到电车月台上，月台的水泥柱子被撞倒，当场撞伤正在候车者五名，其中一人因伤势严重，于第二天就含恨丧命。

在当时的外滩和南京路，美国兵白日行凶，随意殴打中国人民的暴行层出不穷；美国兵胡作非为，在光天化日下，侮辱中国妇女的兽行也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日本投降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一地被美军无理殴打受伤的群众即达三百多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美军十余人公然在南京路新新公司附近，结伙抢劫行人的大衣和手表。同年三月十五日，四个美国兵在南京路新昌路这样的闹市中心，竟然闯入居民住房，强奸中国妇女。这一年的年初，华北美军当局曾经规定：美军杀死一个中国人，一律赔偿法币十万元，而压死一条驴子，则赔偿十三万五千元。其实在美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民的性命根本是分文不值的。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在延安路外滩发生的“臧大饺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天晚上，黄包车工人臧大饺子车子上坐着一个名叫赖令奈的西班牙籍水手，车子在延安路外滩附近安乐宫舞厅门

口停下，赖令奈蛮不讲理，不给车钱就到舞厅里去了，臧耐着性子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见赖令奈喝得醉醺醺地和一个名叫饶得立克的美国水兵一起踉踉跄跄地出来。臧走上去拉住赖令奈，向他要车钱。饶得立克趁臧大咬子不备，向他突然猛击一拳。臧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致使脑底破裂和严重脑震荡，第二天就死去了。而杀人凶手却当场跳上美军的巡逻车，扬长而去。美国兽兵随意杀人，中国人民无辜惨死，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公愤，纷纷组织起来向美蒋反动派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为臧大咬子报仇！当时上海人民正在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响彻整个上海。美蒋反动派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由驻在北京东路外滩的美国驻华海军司令部出面派人作了一番“调查”，并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由上海伪法院开庭对杀人凶手饶得立克进行“审判”，但是根据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订立的协定规定，驻华美军犯法，一律由美国军事法庭审理，中国无权干涉。虽然，饶得立克在上海伪法院的法庭上曾供认自己是打死臧大咬子的凶手，但美军军事法庭却胡说饶得立克拳打臧大咬子是出于“自卫”，竟判决饶得立克“无罪释放”。

美国兵的这些累累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这种情况连当时美军驻华头目魏德迈在美国新闻处的一份通讯电报中也不得不供认：“美国士兵被牵涉于一连串的拦路抢劫，打人逞凶，捣乱以及破坏秩序等事件。”

美帝国主义除了大规模地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妄图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以外，还继续并扩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极端腐朽和反动的美制“精神鸦片烟”，象美国的商

品一样,在整个蒋管区内,也是无孔不入,泛滥成灾。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美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大,美国文化也在上海卷土重来,光怪陆离的美国电影广告,怪腔怪调的美国爵士音乐,反动、荒诞的美国报刊,到处散发着毒雾和臭气。所有的舞厅、酒吧、电影院、书报摊以及教堂等等,几乎全部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据点。

当时,南京路上仅有的两家首轮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和大华电影院,又被美国好莱坞的影片公司所霸占。大量放映黄色、恐怖、荒诞、反动的美国影片。另外,美国新闻处还以“交流中美文化”、“沟通中美人民感情”为幌子,在南京路外滩沙逊大厦的底层,开设了一间所谓公众阅览室,里面陈列着许多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吹嘘美国武力和“西方文明”的《时代杂志》、《生活画报》及其他美国报纸、杂志,人们只要进去浏览一下那些丑恶的裸体照片、荒诞的黄色新闻、野蛮恐怖的凶杀故事和宣扬“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的文章,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开设这间阅览室的险恶用心了。

## 美 货 泛 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发了战争财,军火生产造成了经济的畸形繁荣。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急剧萧条,出口贸易锐减,产品大量积压,外销商品只有百分之四十能找到销路,更有大量战时剩余物资无法处理。正如毛主席所科学分析的:“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帝国主

义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推销它的商品。它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就以“善后救济”为名,向中国倾销大量的剩余物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的八个国家和三十多个岛屿上的价值六十多亿美元的破破烂烂、发霉变质的剩余物资,就是全部以“善后救济”的名义,在中国找到销路的。美帝国主义的所谓救济,救的是它自己。对中国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而这些剩余物资的绝大部分是杀人武器,是用来援助蒋介石集团疯狂地发动反革命内战,实行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屠杀中国人民的反动计划的。蒋介石为此感激零涕,对美国的物资进口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货就象洪水般地涌进了上海的码头,淹没了上海的街头巷尾。在当时的外滩和南京路,不论是大公司的货架上,还是小摊贩的货堆里,到处都成了美货世界。在中央弄、沙市路附近,更出现了一个专门推销美货的畸形的集市。有一个叫竺达夫的投机商人,看到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就伙同他的侄子——国民党反动派空军的处长,勾结流氓头子黄金荣,以三百两黄金顶进沙市二路十六号底层店面房屋,开设新康联合商场,内设柜台九十九个,然后以每个柜台顶费黄金五两,月租美金三元出租。这样就形成了以新康联合商场为中心的推销美货的固定市场。因地处中央弄附近,人们习惯于叫它中央商场。

当时的中央商场可以说是美国货的大本营。穿的方面,从玻璃雨衣、军用大衣、牛仔褲、尼龙丝袜、汗衫、皮鞋乃至玻璃裤带;吃的方面,从克宁牌奶粉、骆驼牌香烟、口香糖、巧克力乃至椒盐花生米;用的方面,从派克钢笔、朗生打火机、尼龙牙刷、剃胡子刀、指甲钳乃至大便用的草纸;此外还有香水、胭



脂、口红等化妆品和失效的药品，变质的军用食品罐头等等，真是五光十色，无所不有。这一切都散发着资本主义腐烂的恶臭。整个中央商场淹没在美国货的浊流之中，笼罩着一片乌烟瘴气。



美货充斥上海街头。

中央商场里的这么多美国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主要来源是走私。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让美帝国主义打着“善后救济”的幌子，将大批美货运到中国，这是最大的“合法”走私。这些“合法”走私的美国商品，就有一部分通过四大家族拍卖给投机商人，而辗转流入中央商场。其次还有“非法”走私。那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兵舰，白天耀武扬威，威胁中国人民，晚上又在那里偷偷摸摸地干着损害中国主权的罪恶勾当。每逢深夜，黄浦江上常常可以看到舢舨船三、五一伙，慢慢地驶近美国兵舰的船舷，接着就有一只只装着走私商品的大吊篮从美国兵舰上放下来；有的干脆打开仓门，把大捆大捆的美货吊入舢舨。另外还有很多美国飞行人员和外交官员也都是大走私贩子。他们经常利用飞机夹带走私商品。至于经常来往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打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招牌的美国船只，则更是“非法”走私的主要渠道。因为这些船只受到蒋介石政府的优惠待遇，出入中国港口，一律免于检查，所以这些船只就成了走私贩子的保险库。如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有“联总”三八〇号登陆艇一艘驶入吴淞口。它一进口就靠岸，放下三十多名走私贩子携带一批轮胎、杂货等上岸，大摇大摆地走去。这些走私商品，通过买办和投机商人，几经转手，隔不了几天，就会在中央商场和其他摊头上出现。

此外，还有一些东西是美国军方人员的盗卖物资。常常有不少美国兵拿着偷来的军用毯子、军用雨衣及零星器材到这里来销赃，这也成为中央商场的—个不大不小的货源。

除了中央商场以外，美国货还充斥于南京路一带的大小商店。永安、大新、先施、新新等几家著名的大百货公司，都成了承销美货的重要市场。连那些弄堂口的大小烟纸店也成了美国货的代销店。当时有人形容外滩和南京路是“玻璃（指美国塑料、尼龙制品）的世界，美货的天下”。

美货的大量倾销，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抗日战争以前，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美国货占不到百分之二十，到了一九四六年竟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仅从上海进口的美国货即达三亿三千三百零七万美元，大量“美援”物资和走私商品还未计算在内。据统计，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这半年中，运到上海的美棉达六十五万担；在一九四六年一年中，运到上海的美国奶粉就有四百余万公斤。同—年内，输入中国的美国药品价值达一千八百万美元。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给予美国货以压低进口税率等优惠待遇，使上海市场的美货价格一般均比国产品低三到五成，使中国民族

工业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在当时的上海，一面是美国货堆积如山；一面是“关店大拍卖”的旌旗如林，形成了一种投机商业的畸形繁荣，民族工商业一片雕零的鲜明对比。如美国“金印牌”滴滴涕充斥市场，使上海信谊药厂生产的滴滴涕销不出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又如，在一九四七年初，由于美货的冲击，上海制袜工厂关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残留下来的也只能每天开工二、三小时；罐头食品工业倒闭了百分之七十八；制药工业倒闭了百分之六十；烟厂关掉了三分之二；化工原料和漂白粉工厂全部停业。到一九四九年初，机器工业停工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因美国奶粉、淡奶、炼乳的大量倾销，全市三十多家甲级牛奶场，在一九四六年倒闭了半数以上，仅有的四、五家奶粉厂也全部关门。许多牧场被迫杀牛卖肉，实行所谓“杀牛养牛”，来苟延残喘；它们曾准备组织“奶牛游行”以示抗议。

受害最深的还是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由于工厂倒闭，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即使没有关门的工厂，资本家也纷纷裁员和解雇工人。到一九四六年底，上海失业工人达八十万，占当时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工人虽然没有失业，也因工厂开工不足，工资减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许多技术工人被迫在马路上以擦皮鞋、拾垃圾度日。

## 狼 狈 为 奸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日本投降后，利用劫收日伪产业，一方面实现了全国性的各种工商业的独占，同时又把这一切独占的工商业变为美帝垄断资本的附庸。这种买办的封建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官僚资本的企业，是美蒋在经济上的混血儿，是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掠夺中国人民的具体体现。设在南京路四川路口迦陵大厦的扬子建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扬子建业公司的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这个彻头彻尾的洋奴，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托局驻香港的负责人，控制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对外贸易。一九四五年，宋美龄去美国进行卖国活动，孔令侃给她当私人秘书。他利用这个机会，卑躬屈膝地同美国垄断集团进行勾搭，并结识了一批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美国金融寡头驻华盛顿的代理人、美国上校军官约翰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约翰逊的策划和牵引下，孔令侃取得了美国十六家垄断企业产品在华总经销的合同。由于这种关系，扬子建业公司先在美国注册开张，不久，即在上海挂牌。孔令侃回国后，仍与约翰逊保持联系，互通消息，勾结得十分紧密。为了加强控制，美帝国主义还把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分配物资的美军上校扬孟冬派到扬子建业公司，担任工业部的副经理。扬子建业公司设工业、营业、染料、出口、进口、信托等部；在南京、天津、广州、汉口、西安、重庆、台湾、香港以及纽约、伦敦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并有意泰影片公司、利威汽车公司、大业地产公司、扬子保险公司、扬子猪鬃公司等附属机构；还控制着申报通讯社、大晚报社、大陆报社、时事新报社等新闻机构。它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黑手控制着金融、外贸、交通、地产、以及文化、新闻等部门。它的资金达五亿美元（当时合黄金一千四百多万两），成为上海的商业托拉斯，是抗战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活动的中心之一。

扬子建业公司还承揽美国“救济”物资的转卖业务，充当推销美国剩余物资的大总管。从军用物资到各种奢侈品，从汽车、钢材、颜料、药品、罐头、化妆品、皮鞋、奶罩直至色情、恐怖的反动影片，只要是美国货，它总是大量进口，竭力推销，即使明知是没人要的美国破烂，扬子建业公司也一律全收。如一九四七年冬季，从纽约买来一大批女式皮鞋，打开箱子一看，都是高跟尖头的怪式样，尺码又特别大，女式皮鞋给男人穿了还嫌大，而且有许多是有了左脚而没有右脚的，或者有了右脚而没有左脚的。花了外汇去买这批垃圾，无非是为了讨好它的美国主子而已。大批的美国货到了扬子建业公司的手里，就成了它投机倒把、兴风作浪的资本，转手买卖，就可牟取暴利几倍乃至几十倍。

扬子建业公司在拚命推销美国货的同时，还遵照美国主子的旨意，大肆掠夺中国的钨砂、樟脑、羊毛、丝绸、茶叶等工业原料和农产品。其中仅猪鬃一项，价值就达二百万美元以上。美帝国主义通过扬子建业公司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而扬子建业公司则靠美帝国主义牙缝里漏下来的残羹养肥自己。

旧上海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除扬子建业公司以外，还有象蒋介石、宋美龄系统的中美实业公司、民用航空公司；宋子文系统的立达公司、孚中公司、金山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孔祥熙系统的嘉陵企业公司、长江公司、建新实业公司，等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这些垄断企业，加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双边协定》、《中美农业协定》、《中美航空协定》等卖国条约，肆意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国主子的恩赐。美帝国主义则借

此攫取了中国的工业、商业、海关、海运、内河航行、铁路、资源开发以及军事、司法等特权。如，美国世界石油公司取得了华西油区的开采权；莫里弥鲁生公司享有在中国修建铁路、港湾、运河以及长江航运的技术监督和物资供应的特权等等。一九四八年元旦成立的上海电力联合公司就是蒋介石乞求美国贷款，出卖国家主权的另一个实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给予蒋介石反动政府三亿美元贷款的许诺时，别有用心地提到了上海的电力事业。蒋介石反动政府心领神会，立即和美国主子签订契约，规定上海电力联合公司全部资金共二千三百万美元，其中美国银团投资达一千三百万美元，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并规定上海电力联合公司除经营电力外，还享有对上海的道路、河流、桥梁等的投资特权。在蒋介石反动派卖国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蜂拥而来，仅上海一地，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至六月间，新开的美国企业就有一百五十家之多。一九四一年美国在华投资，仅占有所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点二，到一九四八年，美国在华投资（包括“美援”在内）占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百分之八十。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策使美帝国主义全面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使中国日益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以扬子建业公司、上海电力联合公司等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企业，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卖国的交易所，也是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吸血管。

## 十一、黎明前的战斗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蒋介石反动派在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推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使通货更加恶性膨胀，物价如不羁之马疯狂奔驰，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随着他在军事战线上的节节溃败，他在财政经济战线上更是山穷水尽。为了进行垂死挣扎，蒋介石反动派又玩弄了一次“币制改革”的骗局，宣布废除“法币”，由伪中央银行发行金本位的“金圆券”，规定三百万元法币换金圆券一元，并横蛮地规定“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以及外国货币券”。通过这项措施，四大家族又一次从人民手中掠夺去了价值二亿美元以上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其中黄金就有一百七十六万两。但是金圆券的发行，不但不能挽救蒋介石反动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江河日下的危局，反而加速了它的经济崩溃。一九四八年八月，即“币制改革”的头一个月，国民党反动



政府一下子就发行了金圆券二亿九千万元；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九日，金圆券的发行量竟激增至七千六百零六亿元。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迅猛飞涨。在金圆券发行后的短短八个月里，上海的大米、猪肉、煤球等价格竟上涨了二千万倍到二千五百万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介石为了继续蒙蔽人民，又宣布取消原先公布的老百姓不能持有黄金的“命令”，诡称金圆券可以兑换黄金。接着，由伪中央银行演出了一出出售黄金的丑剧。他们公开标价黄金售价为每两贰千元，比三个月前的收兑价格竟提高了十倍。人们虽然明知又被反动派捞了一把，但因为吃够了金圆券的苦头，急于摆脱通货膨胀的灾难，都纷纷到外滩伪中央银行去购买黄金。其实，中央银行每天出售的黄金数量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早被四大家族的喽罗们所控制，一般人是根本不能买到的。所以每天早晨在外滩中央银行的门前总是挤满了人群，而且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生了挤死七人，挤伤四十五人的惨剧。

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和推动下，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的加深和蒋介石政治欺骗的破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斗争迅速发展起来了。工人、店员、摊贩和学生等各阶层人民，英勇地战斗在反对美蒋反动派罪恶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紧密地配合着解放区军民的斗争。这一时期，在外滩和南京路，也是风雷滚滚，人民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其中主要的有摊贩斗争，“二·九”爱用国货运动，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等等。

## 摊 贩 斗 争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因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斗争新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旧上海，摊贩的人数是相当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城市贫民，靠摆设地摊或肩挑叫卖维持生活。在美蒋反动统治下，由于美货倾销，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大批工人、店员失业。当时，职工失业以后，做摊贩是赖以养家糊口的一种出路。再加上破产的中小商人，毕业即失业的青年学生，以及从农村逃荒来沪的农民，也都加入到摊贩的队伍里去，这样就使得摊贩的人数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上海摊贩人数已达十多万人。他们活动在闹市地区，外滩和南京路一带是摊贩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

摊贩人数的激增，影响了官僚资本的独占利润。上海市国民党反动政府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借口摊贩“有碍观瞻”、“有碍交通”及“影响商店的正当营业”，下令取缔摊贩，限令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在八月底前全部停业。这一决定对就业无路、借贷无门的摊贩来说，无异是宣判他们的死刑。十几万摊贩连同他们的家属，共几十万人的生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摊贩们纷纷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请愿”，责问反动政府：为什么对马路上到处垃圾成堆，水沟淤塞，严重危害市民身体健康的现象视而不见，对美国吉普车到处横冲直撞，美国兵到处肇祸生事，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的现象听而不闻，却以“有碍观瞻”、“有碍交通”为由取缔摊贩？并指

出“扰乱市场”、“影响商店正当营业”的是国民党政府纵容和包庇下的美货走私，以及少数兴风作浪的豪门巨商，绝不能嫁罪于摊贩！他们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摊贩们的要求，并逮捕了继续营业的摊贩。

当时，南京路一带到处可以看到摊贩们抵制反动政府取缔摊贩的行动。他们手拿一只提包，携带少量商品，一见反动警察走来，就互相招呼，一哄而散；等反动警察一走，他们又照常继续营业。但是，每天总有少数摊贩被捕。有一个青年，原在一家香烟厂工作，因工厂倒闭失业，只得同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南京路一个弄堂口摆面包摊度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遭到反动警察赶捉，逃避不及，被关进了拘留所。象这样被捕的摊贩，到十一月下旬，已近千人。这些被捕的摊贩，在牢中受尽了百般虐待，反动警察还趁机敲诈勒索，有的甚至被关进水牢。十一月底的上海天气，寒潮到来，朔风刺骨，被捕的人饥寒交迫，有的被活活折磨而死。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激怒了摊贩们和广大的上海人民群众。十一月三十日，三千名摊贩举行了“请愿游行”，并包围了黄浦区伪警察局，摊贩们高呼：“凭什么不叫我们吃饭？”“凭什么不让我们做小生意？”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摊贩。到下午三时，过路的群众，也纷纷参加斗争的行列，人越来越多，情绪也更加激昂。国民党反动派如临大敌，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宪兵、驻军、马队和飞行堡垒，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架着机枪的警备车，开足马力的吉普车、摩托车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消防队的救火车，用高压水龙头向群众猛烈喷射。反动派最后下令开枪屠杀。当场打死摊贩七人，打伤多人。但是，反动派的机枪吓不倒愤怒的群众；高压水龙扑不灭斗争的

火焰。示威的群众拿起石块和木棍，对反动军警进行了狠狠的还击。摊贩们还决定到跑马厅开群众大会，扩大宣传。他们沿路高呼口号，动员市民前往参加。许多人响应号召，一齐投入了斗争的洪流。斗争一直继续到了深夜。

十二月一日，斗争更加激烈。凌晨二时，黄浦区伪警察局门前已经开始有人集合，四点以后，参加斗争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增加到五、六千人。那天，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下毒手，开枪打死十人，打伤一百多人。斗争的队伍继续扩大，上海全市商店一齐停业，许多公共车辆停止行驶，外滩、南京路和其他主要马路，愤怒的人群，高呼口号，并散发传单。这样就形成了全市规模的反蒋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吓得美蒋反动派丧魂落魄。那一天，交通岗警吓得不敢外出值勤，整天龟缩在警察局里，连驻在上海的美军当局也连忙下令“禁止官兵外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面前不得不取消取缔摊贩的命令，并释放被捕的摊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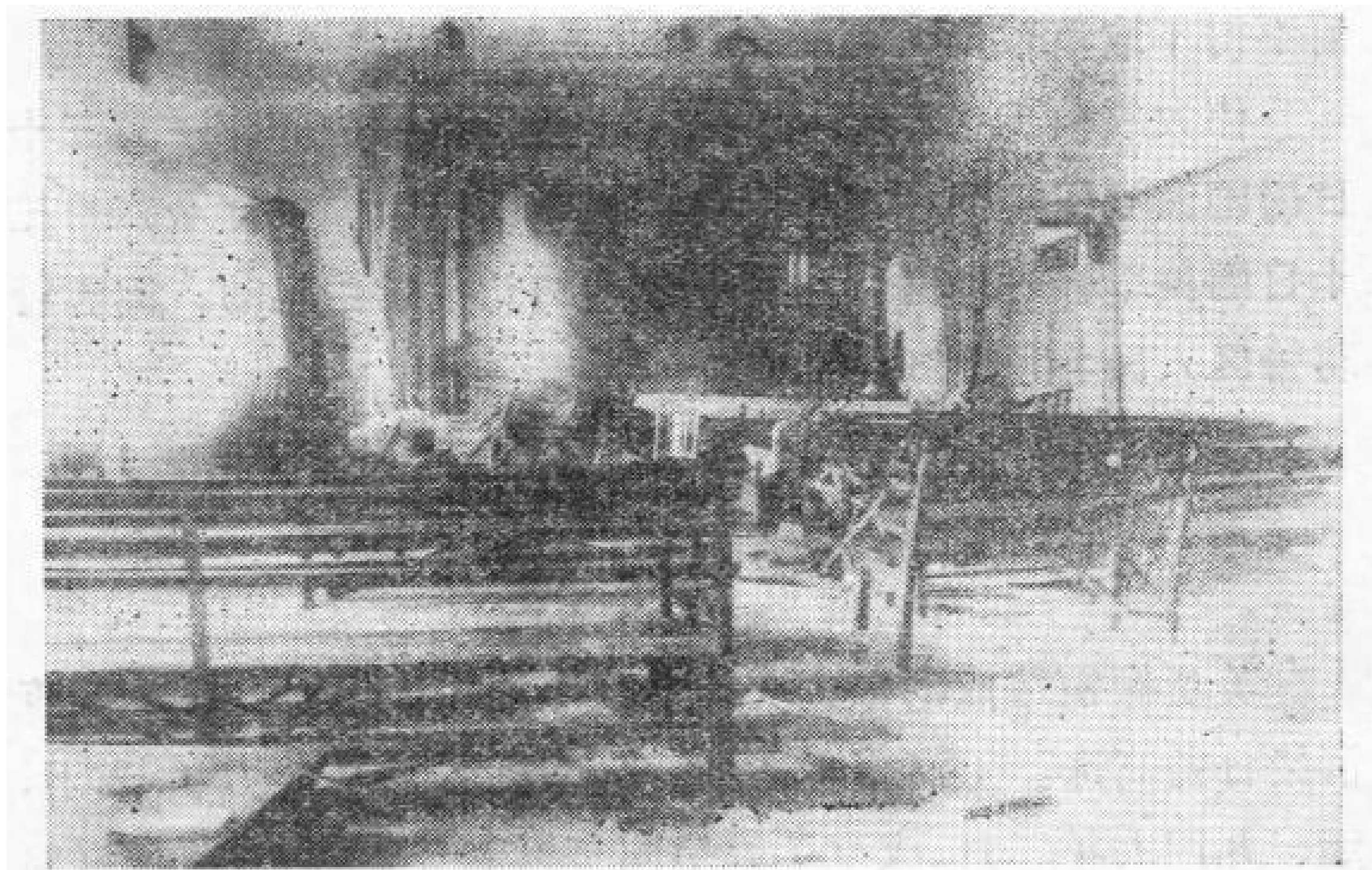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初指出：“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

## 爱用国货运动

美货倾销造成的极大灾难，使上海广大人民的反美反蒋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百货业的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成立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为了扩大影响，

“爱抵会”决定于二月九日在南京路新新公司楼上的新都剧场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内奸的告密，消息走漏，国民党反动政府威胁新新公司资本家，拒绝借会场给“爱抵会”开会。“爱抵会”成立大会临时改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三楼举行。

九日早晨，参加大会的人来得特别早。虽然会场转移，但到了九点，劝工大楼会场里早已坐满了人。大家学唱“美国货，害人精”，“不赶走美军心不甘”，“美国军队快滚蛋”等歌曲，情绪十分激昂。正在这个时候，会场门口突然拥上二、三百个来历不明的人，手中拿着伪造的“请柬”，吵吵嚷嚷地强行进入会场。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飞起一脚，将会场门口的签名桌子踢翻，高声喊打。会场里面也有事先混入的特务，里应外合，一起起哄。接着，一个身穿黄军衣，手执手枪的人一声号



国民党特务捣毁劝工大楼“爱抵会”会场的罪证。

令，口哨声四起，特务们纷纷拿出原先藏好的镗头铁尺，有的还捣毁凳子，拆下带有钉子的木条，见人就打。会场内一时喊声震耳，桌椅横飞。不少职工被打得头破血流。特务们还拿痰盂、玻璃杯、墨水瓶等，劈头盖脑地朝主席台丢去。

参加大会的职工群众，高唱“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对特务们的行凶捣乱，奋起反击。在场的永安公司鞋子部职工梁仁达，愤怒地提出质问：“我们提倡爱用国货，为什么要打我们？”特务们一拥而上，对梁拳足交加，还拖着他从三楼一直打到底层，打得他全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晕厥在地。后经仁济医院验明，梁仁达脸部被打得红肿，后脑骨被打碎，肋骨被踏碎，身上还有许多被铁尺捣伤的伤痕，由于伤势严重，于当天下午，不治身死。在这次暴行中，还有十几个职工受重伤，近三十人受轻伤。

梁仁达的惨死，使广大职工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斗争也进一步向前发展。第二天，百货业职工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和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继续和反动派作斗争。永安公司职工通过出售的商品向顾客散发传单；各公司、商店的橱窗上都张贴出“告顾客书”，向各界人民揭露事实真相，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百货业职工还走上街头，广泛向社会作宣传。职工们的斗争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工厂、学校的工人、学生都先后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纷纷投入斗争。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群众团体也都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通过这一系列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上海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更加深入地发展。

## 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继续在许多地方发动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已经有了充分把握，叫嚣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以六月下旬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美蒋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上海人民不断掀起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风暴，学生运动也不断高涨。“和平签名运动”、反内战示威、“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此伏彼起；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取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人民群众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蒋的斗争。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蒋管区掀起的反对美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配合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预示着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

一九四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国民党反动派深怕工人们在“五一”那天采取行动，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发起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妄图控制局面。但是假的总是假的，鱼目岂能混珠？广大工人早就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纪念大会变成反共大会的阴谋。“五一”节那天，聚集在跑马厅会场上的工人群众，首先就用愤怒的抗议，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把那块



上面写有“反对共产主义”反动标语的横幅取掉；接着又用一片“工人吃不饱”的口号，回击了国民党伪社会部长关于“在业总比失业好”的胡言乱语；并巧妙地利用伪总工会理事长为了欺骗工人也假惺惺地说什么“要求当局设法解决生活费指数问题”<sup>①</sup>的机会，明确提出“解冻生活费指数”、“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官僚资本”的革命要求。响亮的口号声震撼浦江两岸，使伪总工会理事长狼狈不堪，并吓坏了在场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及其喽罗。工人群众退出会场后，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横幅和旗子，分路出发，举行了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先下手为强”的鬼蜮伎俩，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工人运动的同时，上海也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上海学生及各界人民五万余人在北火车站集会，欢送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和平请愿”，会后并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浙江路经南京路、江西路直到复兴公园，沿途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长期全面停战”、“要求驻华美军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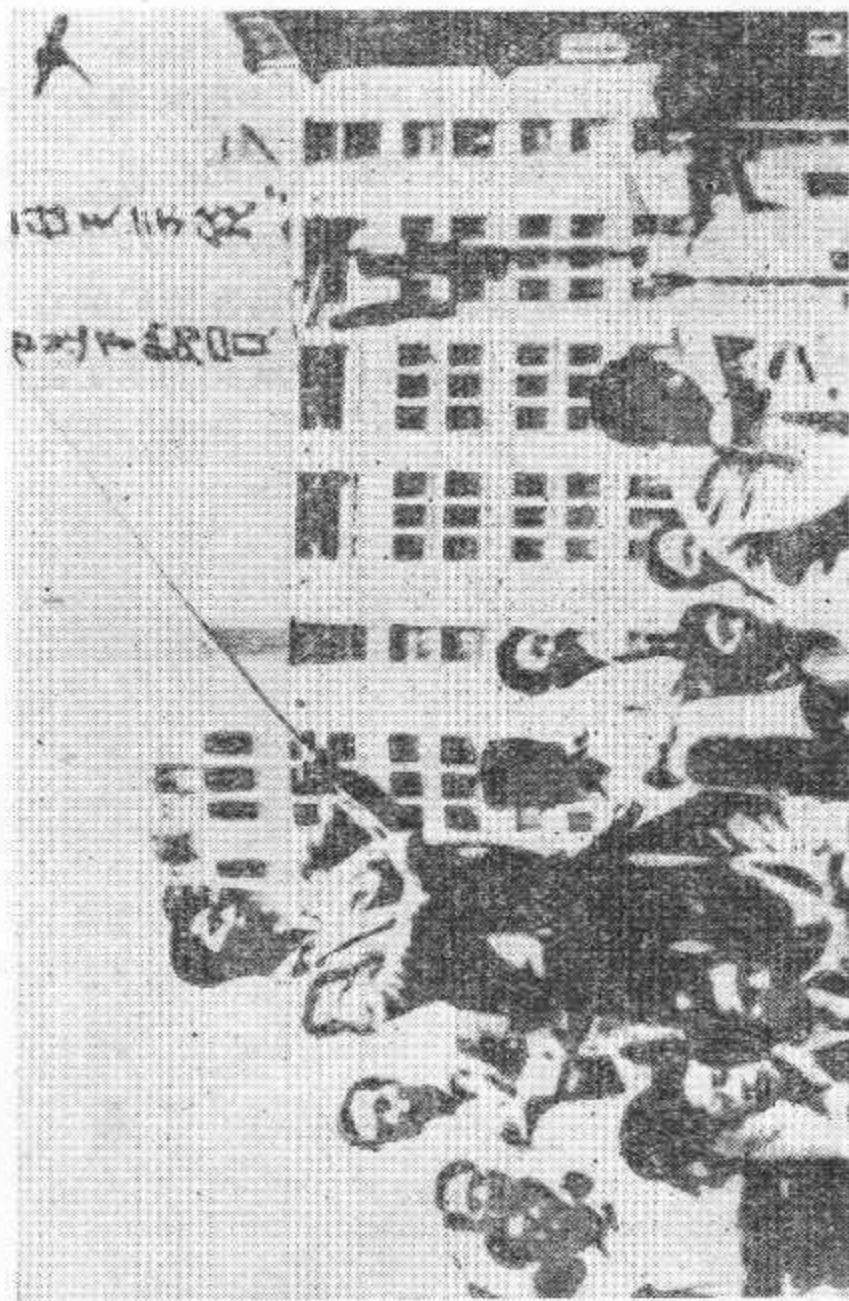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各工厂的工人为了保障生活，不断进行罢工斗争。一九四六年底，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斗争中，首先提出按照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的办法，并迫使资方接受下来。这个办法可以使工资和物价保持浮动，使工人减少物价飞涨的威胁。但是，当时的生活费指数是由伪社会局根据物价编制，按月公布的。他们每月故意压低生活费指数，使生活费指数与物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他们竟厚着脸皮干脆宣布冻结生活费指数，硬性规定，不管以后物价涨了多少，工资只能按一九四七年一月份的生活费指数计算。可是就在二月份里，物价就猛涨了七成。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恶毒决定，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真是雪上加霜。

撤退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等口号，高唱反对内战的歌曲，并散发传单，燃放爆竹，声势十分浩大。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大批特务，混进游行队伍进行破坏和捣乱，被当场扭获七名。游行的群众押解着这些家伙沿途示众，并在复兴公园内对他们进行了公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群众游行的阴谋。

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迅速获得了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同时，发生了上海八千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的事件。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七千多名学生又在北站集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他们手里拿着饭碗，高举竹竿，竹竿上挂着两根半油条，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他们齐声喊着“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浩浩荡荡，一路前进。当队伍过了天后宫桥（即今河南路桥）转向南京路的时候，遇上了反动军警的骑巡队。反动派用几十匹高头大马和若干辆警备车，组成了临时堡垒，阻止游行队伍的前进。激愤的人群更加怒火万丈，他们高唱：“跌倒怕什么，爬起来再前进”的雄壮歌曲，在“冲啊！”“冲啊！”的怒吼声中，冲向警备车，冲向马队。色厉内荏的反动军警在愤怒的群众面前，惊慌失措，骑巡队狼狈地溃退了。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南京路继续前进。反动军警仍企图加以拦阻，南京路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还摆着一挺挺的机关枪。但示威的学生并没有被吓退，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对市民展开宣传，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罪行。在学生们英勇斗争和广大市民的声援下，反动派阻拦示



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的上海学生，向群众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威游行的阴谋又一次破产，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南京路上继续前进。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战斗口号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直到全国胜利为止，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从未停止过，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严重的打击。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 十二、新生和巨变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了南京，埋葬了反动卖国的蒋家王朝，并迅速地逼近了上海。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国民党残军还要在上海作垂死挣扎。他们在上海郊区设立了层层防线，在市区的交通要道也堆上沙袋，霸占高楼大厦，妄图负隅顽抗。但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攻击下，国民党匪军节节败退。到了五月二十四日，犹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反动派，开了几部卡车，上面装了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南京路上举行所谓“祝捷”游行，借以蒙骗群众，并给自己壮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庆祝前方胜利”的神话不攻自破。那些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军败将争先恐后、狼狈不堪地挤上汽车，由南京西路仓惶向东逃命去了。上海人民从轰鸣的枪炮声中，知道黑暗就要过去，黎明即将来临。人们急切地盼望着，盼天亮，盼阳光，盼解放！永安公司的职工连夜赶制了一面红旗，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上海的新生。

这天深夜，我人民解放军冒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在郊外的防线，进入了部分市区，并迅速地由西向东插进来，解放



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不打扰居民,露宿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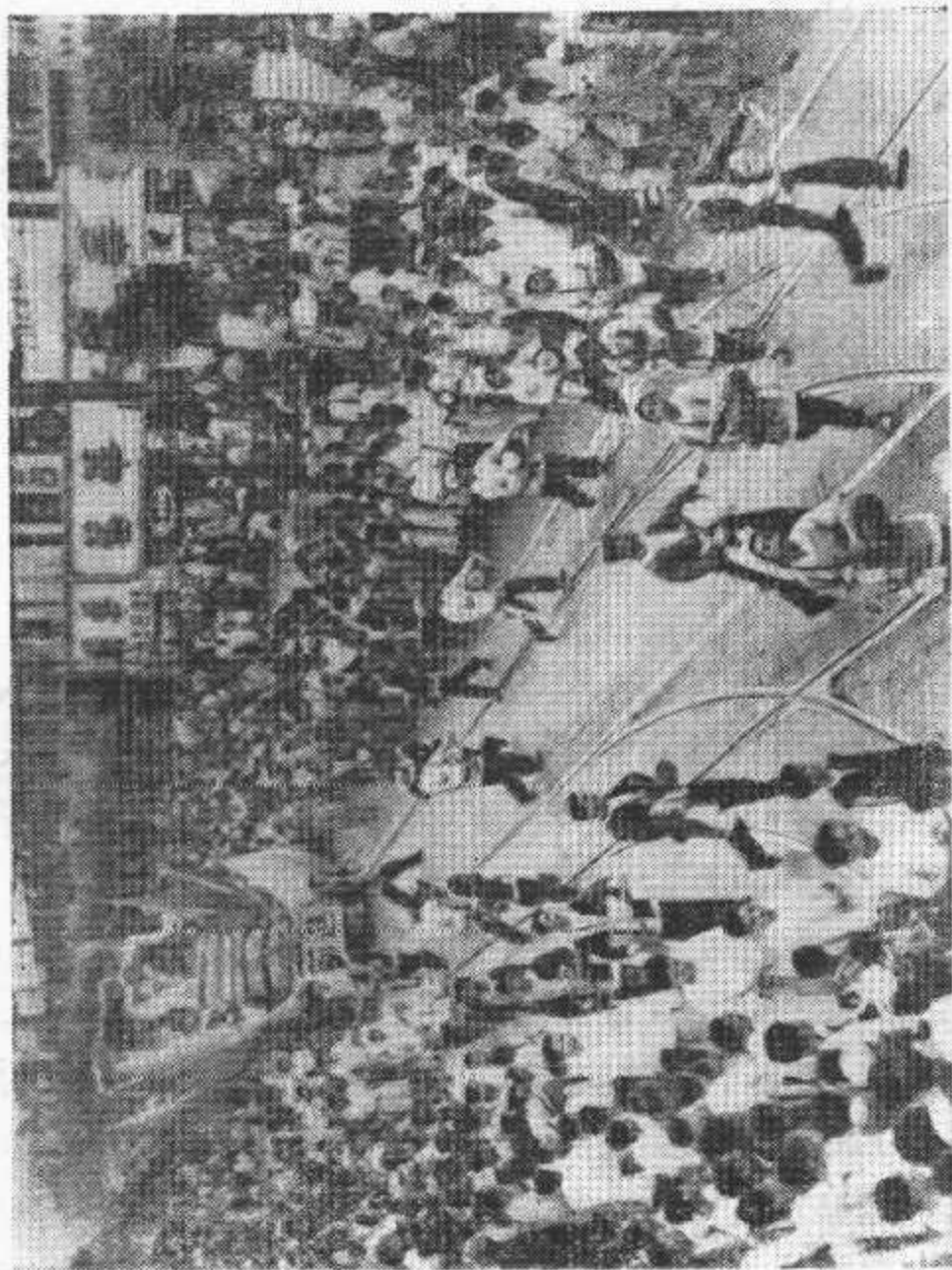
了苏州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次日清晨，当解放军准备进一步发起攻击，消灭苏州河北岸残敌的时候，外滩公园里的敌人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解放军战士冒着弹雨，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经过激战，全部消灭了在公园里挣扎的顽敌。这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洒满了上海的土地。永安公司的一个青年职工迎着朝阳，不顾国民党残匪射来的子弹在头上嗖嗖作响，勇敢地爬上永安公司最高的屋顶——“倚云阁”上，将红旗高高升起。冉冉喷发的曙光，照得那面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和壮丽。它向人们宣告：上海解放了！外滩和南京路新生了！

### 十里长街庆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攻占各座大楼以后，上海人民挂着喜悦的热泪，奔向南京路，奔向外滩，庆祝解放，迎接人民的子弟兵。老妈妈端着热茶叫“解放军同志喝”，小弟弟蹦着跳着，喊“解放军叔叔好”。深受苦难的工人同志，含着热泪，抱着子弟兵，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外滩和南京路成了红旗的海洋。鞭炮声、锣鼓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扭着秧歌，唱着革命歌曲，欢庆奴隶翻身得解放。人民的子弟兵在与上海人民共同欢庆解放的同时，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保卫着人民的胜利果实。人民群众纷纷传诵着解放军同志雨夜紧抱枪杆，和衣卧在人行道上，以及宁可用钢盔盛饭菜，而不肯向市民借用盆碗饭具的事迹，齐声赞扬他们爱护群众、纪律严明的好思想好作风，到处洋溢着一片鱼水情。

在这同时，党组织迅速组织部分职工积极分子接管了设





上海人民在南京路上欢庆上海解放。

在新新公司楼上的那家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凯旋电台，并立即开动机器，进行广播。各大百货公司的职工业余歌咏队，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轮流到电台播送早在解放前夕就暗暗学会的革命歌曲，并反复播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sup>①</sup>，播送新华社的有关解放军胜利进军的电讯。红色的电波飞速地向四面八方传送。“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革命的歌声在黄浦江畔回荡。

革命人民开心之日，就是敌人难受之时。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上海解放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上海全部解放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开设在外滩十七号的那家帝国主义的喉舌《字林西报》，怀着十分恐惧而又不甘心灭亡的心情，喃喃地叫嚷：“西方国家的起码要求，就是决定一个联合的途径。它们应该在如何对付共产党控制中国这一事实上，取得谅解。”帝国主义者还狂妄断言：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将踏上可怕的道路”，“共产党在这里（上海）维持不了三个月”。帝国主义者是如此，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也如此。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上海人民在欢庆解放的时候，又踏上了新的战斗旅程。

## 人民做了主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光芒四射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前升起，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

---

<sup>①</sup> 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署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宣布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八章。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毛主席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解放以后，那些在外滩和南京路上作威作福、鱼肉中国人民的外国殖民者，被赶出了中国的大陆。上海工人阶级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上海工人阶级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造旧上海，建设人民的新上海。解放后外滩和南京路的变化很多、很大，但最重要的变化，是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了。解放前做牛做马、受欺受压的劳动人民，解放后当家作了主人。南京路上有个老职工，他在解放前到一家外国人开的书店当学徒，一进门洋老板对他讲的头一句话就是：“不许讲话！”要他专门伺候前来买书的洋人，为他们开门、关门、挂帽、脱大衣。如果说，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在奴隶主贵族的眼里，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那么，在殖民者手下干活的中国劳动人民，则往往是连说话都不允许。解放以后，这个过去任人驱使的“奴隶”，成了书店的领导。有个常到书店买书的外国人，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站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变化，频频摇头，连说：“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体现在这个老职工身上的新旧社会的对比，是何等的强烈！象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许多。再拿一个从小就在跑马厅拾球的足球裁判来说吧，在旧社会，他六岁死去妈妈，九岁为生活所迫进跑马厅为洋人、资本家拾球，经常受到棒打脚踢。后来，他做了足球裁判，又引起当时“裁判会”的无理干涉，被剥夺了“裁判”权。解放后，他

出国当过裁判，并多次被聘任足球裁判长。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解放后外滩和南京路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真理。

我们还是先从“路”本身说起吧！外滩和南京路是中国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开拓出来的，当它们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以后，弯的开直了，窄的拓宽了，路面显得更加整洁了。当初帝国主义者被赶出上海的时候，他们曾怀着阴暗的心理说：“不消两年，你们就只有轨道没有电车了。”他们在等着，等着，等待我们的“失败”，等待我们再把他们这些殖民老爷请回来。然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历史的车轮是无情的。两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外滩和南京路的情景，恰好和殖民老爷们的愿望相反，在这里不是“只有轨道没有电车”，而是轨道没有了，国产的大型无轨电车、上海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来回行驶。

外滩和南京路变了。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接管了被帝国主义长期霸占的海关，夺回了被帝国主义分子窃据的主权，并遵照毛主席关于“改革海关制度”的教导，取消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独立自主地拟订海关法令。外国人和外国船只进出我国港口，都必须遵守我国法令，按照我国规定的章程办理海关手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海工人阶级和红卫兵小将，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剔除了海关钟楼在报时前播送的外国音乐，配上了《东方红》的乐曲。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时正，上海海关大钟第一次响起了《东方红》这庄严胜利的乐曲声，永远鼓舞着上海人民继续革命，奋勇前进。南京路上那严重毒害中国人民的大赌窟——

跑马厅，也被解放了的人民铲除了。它的旧址的南半部改建为宏伟的人民广场。广场中间的花岗石大道有一百公尺阔，道旁二十四座华表式灯柱上的九十六盏美丽的宫灯，入夜把广场照得一片通明。它的旧址的北半部，改为上海图书馆、体育宫和人民公园。原静安寺路上的哈同花园——爱俪园，也于解放后不久，改建成上海展览馆。在这座占地面积一百三十多亩的展览馆里，展出了五千多种机电、冶金、化工、仪表、电讯、轻工、纺织、农机、手工艺、医疗器械等产品或模型。其中有上海机电工人自行设计制造的三十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高精度大型螺纹磨床、一万二千吨自由锻造水压机、采用电子技术装备的数字程序控制机床和二十二吨自卸矿用载重汽车；有上海造船工人发奋图强、自己建造的万吨级的远洋客货轮；有上海仪表电讯工人制成的电子计算机、录象机、彩色电视机和各种新型电子元件；有上海轻、纺工人生产的手表、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和各种棉纺织品、丝绸、呢绒；有上海手工艺工人精心制作、雕刻的象牙、玉石、绒绣等工艺品。此外，还介绍了人工合成胰岛素、针刺麻醉、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积烧伤等方面的新成就。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上海已由解放前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了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在南京路福建路口还有一片中国人民银行南京东路第二储蓄所，它的门面虽不大，进出的人却络绎不绝，所里的储蓄额逐年上升。人们还记得，这一行址的前身，就是那座古老的“虹庙”。解放前，有些穷苦的劳动人民曾去烧过香，磕过头，但都改变不了忍饥挨饿的境遇。如今，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收入有了积余，都纷纷到银行去储蓄。附近居民深有感触地

说：“解放前，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去烧香；解放后，丰衣足食喜笑颜开进银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是何等鲜明！

外滩和南京路变了。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再也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乞丐在行乞，看不到为饥寒所迫的父母忍痛出卖自己的儿女，看不到倒毙街头无人认领和收埋的尸体，同时也看不到解放前那种混乱、扰攘和杂闹的现象了。今天，走在马路上的工农兵，个个喜笑颜开，精神振奋。特别是在傍晚时分，或者是在星期假日，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行人就更多了，人来人往，挨次前进，滚滚人流，秩序井然。解放前，在这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地方，外国侵略者豺狼当道，偌大的马路，没有中国人民自由行走的地方。这种情形如今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中国人民走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精神焕发，扬眉吐气。那些身穿上白下蓝制服的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指挥着各种车辆东奔西驰，南来北往。有时还能看到，人民警察一手搀扶老人，一手抱着小孩穿过马路。有一所小学的学生，每天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到八时左右，要穿过南京路到对过人民公园做广播操。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要有一千六百人次穿越南京路，这时也正是交通繁忙达到高峰的时候，人民警察坚持每天护送，保证小朋友的安全。在外滩和南京路上，还时常能遇到外国来宾和海员前来观光市容和购买东西，他们总是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当家做了主人。

### **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

在解放前，外滩和南京路是外国侵略者的一根吸血管，是



冒险家、投机家活动的大本营；外滩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是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解放之初，那些专门从事投机倒把的银元贩子，仍然猖獗地活动在外滩和南京路一带，买进卖出，翻云覆雨，妄图扰乱金融市场，从经济上动摇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础。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立即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财政金融特权，结束了帝国主义银行对中国财政金融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体系和稳定的货币制度，对那些扰乱金融市场的银元贩子，进行了严厉的取缔和狠狠的打击，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奠定了基础。

在解放前，外滩和南京路是洋货泛滥成灾。据一九四七年福利营业公司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资料统计，南京路的商店有二百五十七家，但除了二十九家银楼首饰店和三家南货店有些中国特色外，其余不是洋行，便是经销洋货的商店。殖民主义者通过外滩和南京路这条孔道，不知从中国掠夺去多少财富。解放后，这里再也看不到洋行林立、洋货充斥的现象，看不到那些“大减价”、“大拍卖”的幌子。在从外滩到静安寺的十里长街上，国产商品布满橱窗。营业员们“学星火”<sup>①</sup>的群众运动开展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例层出不穷，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商场底层三面临街，有十八个大橱窗，陈列着各种轻纺织品和日用工业品，就象是一个展览会。在它的一万八千平方米的商场里，排列着一千多个玻璃柜台。里面陈列着三万六千多种商品，其中除个别商品外，都是国产的。一个原在大新公司工作过的老职

<sup>①</sup> 学习“星火日夜商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工感叹地说：“那时大新公司出售的商品，百分之七十是进口货，在当时二十六个商品部，除了‘南货’部以外，部部都有洋货。甚至连大便用的草纸、清洁用的扫帚，都是舶来品……。今天的第一百货商店再也看不到昔日大新公司触目皆是的舶来品了。”

原来的永安公司，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实现了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中又改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这家解放前专营舶来品的大公司，现在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国产日用百货。据店里的营业员说，他们平时每天要接待十万人次，星期假日一天多达二十万人次。市百一店、十店等一些著名大店，随着学星火群众运动的深入，实行大店学做小生意，还都专设了修补柜台，方便群众。

第十百货商店对面原先施公司的旧址，现在是上海最大的一爿服装店——上海服装商店。这里定制和出售各式服装，星期假日也是顾客盈门。

上海服装商店隔壁原新新公司旧址，现在是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它经营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的土产，共有二千三百八十多种品种。

旧上海的四大公司解放以后在面貌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胜利。

当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拿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来说吧，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十天，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门市部（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的前身）成立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商店于一九五三年搬进了原来的

大新公司。二十多年来，这家商店就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中巩固成长起来的。

商店开门的第一天，不少私营商店的老板，心怀鬼胎，钻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兜了一个圈子以后，在背后窃窃私议：“没啥了不起……。”可是，社会主义的商店，代表着革命前进的方向，它一开始就表现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等于永安、大新、先施、新新、丽华、国货等十一个私营大公司营业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营业额”大，难道仅仅是说明多做生意吗？不！这是反映了人心所向，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商店的信任。当时这家商店就是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同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春节，永安公司老板囤积大量白糖，准备抬价看“红盘”，而第一百货商店却按平价大量供应。一九五〇年，美蒋反动派在上海制造“二·六”轰炸时，全市一度停电，私营商店乘机抬高照明蜡烛的售价。而第一百货商店仍以原价大量供应，迫使市场价格回降。工农兵群众称这家社会主义商店为生活上的“保险公司”。而那些资本家却把它视为眼中钉。一九五一年，环球百货同业公会公开出面，竟然嚣张地向市工商局提出要求撤销这家国营百货零售门市部，妄想把社会主义商业扼杀在摇篮里。

解放初期，大叛徒刘少奇跳了出来，顽固地反对党对私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叫嚷：“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第一百货商店曾实行所谓“原地踏步”的办法，减少供应品种，缩短服务时间。相反却让私营商店从扩大批发和零售差价中，增加百分之五的利润收入，使南京路上几家私营

大百货公司的总营业额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三，而第一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后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接着又对私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取得了胜利，这就大大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商业。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黑风，也刮到了第一百货商店。有个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安排进店的资本家，跳出来叫嚣：“农村有自留地，商店也要有自留柜”，想把社会主义商店搞成过去资本主义那一套：在大商场摆摊、算拆息、拿厘金。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职工，决不答应这样做，对这股黑风，进行了反击。但是在“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影响下，商店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和经营方向，追求大生意，一些所谓“高档商品”纷纷上了货架，而把工农兵群众需要的商品，如劳动牌香烟、工农肥皂、细布衬衫、针线钮扣、竹筷瓷碗等挤出了商店。这哪里是挤掉了一些商品，而是在挤掉社会主义，想把商店挤上资本主义邪道啊！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一百货商店的职工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整风运动开展以后，广大职工与全市人民一起愤怒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抓住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斗批改的方向。商店设立了好几个展销专柜，将一些新产品和试销产品陈列出来，认真听取顾客对产品的意见，然后反映给工厂，便于及时改进，更好地满足工农兵的需要。商店还设立了修配部，以卖带修；并且回收旧牙膏管、旧钢精制品等，做到以卖带

收；为了照顾夜班工人和市郊送菜的贫下中农的需要，商店开辟通宵服务部。今天，这家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正以崭新的姿态矗立在南京路上。

再看设立在原永安公司“七重天”大楼的上海第一医药商店，那里陈列着各种中西药品，品种很多，而且绝大部分也都是国产的。这些药品的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如各种抗生素，有自力霉素、更生霉素、光辉霉素等几十种，反映出自力更生的光辉。还有如创新霉素便是我国首创的。回顾解放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医药上最普遍的小苏打也要进口。当时所谓药厂，只不过是把进口药改装一下，分分小包，化化药水，真是除了黄浦江水是自己的以外，其他都要由国外进口。南京路上五洲、科发、正威等十四家药房全是经销进口的西药。解放初，劳动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不顾人民死活，用进口药品作为投机倒把的筹码，以青霉素作为抬价的标尺。更恶毒的如王康年之流，用假药毒害劳动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不久，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医药商店正式营业了。可是，当天五扇大门一开，一些从事投机倒把的家伙拥了进来，把青霉素抢购一空。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医药战线上激烈地开展着。广大职工在政治上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经济上保障药品正常供应，稳定了药品的价格。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终于逐步把私营药店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解放以来药品价格曾多次降低，就以最近十年来讲，从一九六三年起，下降幅度较大的已有四次（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药价总水平已比一九五〇年下降

了五分之四，许多药品价格下降幅度很大，如四十万单位的青霉素，一九五二年每瓶售价为二元五角，目前为二角。保证了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商业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的外滩和南京路已成为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南京路上许多商店的职工，通过了解市场情况，反映工农兵的需要，当工业生产的“耳目”；他们定期下厂服务，了解生产情况，做工业生产的“后勤”；他们还组织商品展销，帮助工厂明确产品方向，做工业生产的“参谋”。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日夜服务、早晚服务，一卖多带<sup>①</sup>、修修补补等服务项目。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商店职工认识到，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不仅是业务问题，首先是路线问题，世界观问题。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刘少奇一伙鼓吹什么“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但是广大职工说：“什么干不干，只要工农兵需要，利润再小，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干！”有些商店一分钱可买的商品就达十多种。

在为工农兵服务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医疗衫袜新品种的出现就是一例。一天，有家衫袜店的袜子柜来了一个顾客，替一位病在床上的护士询问有没有“能治病的袜子”卖。负责接待的老职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一名词，仔细一问，原来这个护士患了静脉曲张病，听说有一种静脉曲张袜对这种疾病有一定辅助疗效，所以请人来代买。这位老职工请顾客留下姓名、地址。待顾客走后，立即赶到袜厂商量，并与袜厂的同

<sup>①</sup> 一卖多带，指以卖带修，以卖带租，以卖带配，以卖带收等。

志一起赶到那位护士家中,进一步了解情况,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试制了一种尼龙与橡筋交织的静脉曲张袜,那位护士穿后不久,加上其他的治疗措施,便可以走路了。但这类病人究竟有多少?他们又走访了瑞金、中山等五家医院,向医生和病人调查。同时,又根据病人的需要,研制生产各种规格的静脉曲张袜。“能治病的袜子”的产生,充分反映了广大店员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精神。

为了方便群众,许多营业员还走出店堂,上门服务。一家眼镜店的职工,连续几年坚持到青浦、嘉定、南汇等县巡回服务,为农民验光配镜。这种革命精神和服务态度,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赞扬。

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商业的优越性,广大工农兵群众说:“商业职工为人民,日夜服务真热情,购买方便品种多,文化大革命气象新。”

随着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家商店的销售额不断上升。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也是对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劳动人民“缺吃少穿”的反革命谬论的有力批判。

## 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阵地

解放前的外滩和南京路除了伊文思书店和沙逊大厦底楼美国新闻处阅览室里放着一本本洋文书刊以外,浙江路一带的书报摊上,塞满了帝国主义的反动、黄色、淫秽的小说、连环画和画报等等,外国侵略者还在这十里洋场的地方开设了一

月月舞厅、游乐场、酒吧间、夜花园，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臭气，毒害着人们的心灵，使外滩和南京路变成杀人不见血的魔窟。解放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对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垃圾进行了打扫，取缔了那些坑害人们的场所，对另外一些文化侵略的机构也进行了取缔或改造。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洪流的冲刷和洗涤，外滩和南京路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阵地。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字林西报》宣告寿终正寝，外滩十七号大厦门额上象征帝国主义的“图腾”——狮马标记也被清除了。这就是今天的桂林大楼。

解放以后的“大光明”改建成了宽银幕电影院，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人民的面前。它再也不是帝国主义从精神上来毒害中国人民的据点，而是千百万市民获得精神食粮、接受阶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场所，也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场所。

过去跑马厅的“摇彩间”，现在是全市藏书最多的上海图书馆。每天接待着成千上万来自部队、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以至郊区的农民读者，他们借阅图书或查找资料，有的在静静的大厅里看书阅报，有的埋头索索地写着心得和笔记。广大工农兵群众来到这里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使上海图书馆出现了热烈紧张和充满了战斗气氛的新气象。

当你走过南京路上海服装商店时，可以听到从楼上传来抑扬顿挫的乐器声和雄壮优美的歌声。这块原来先施乐园的基地，一九五八年辟成了黄浦区文化馆，来自工厂企业的业余



文娱活动分子，在革命生产上争上游，在文艺舞台上演英雄，今昔对比，一个基地，两个天地，正是：过去的先施乐园，妖魔鬼怪舞翩跹；今日的文化阵地，革命歌声响彻天。

解放后，一批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的单位在南京路上出现了。那高耸入云的电视发射台，那专门演出木偶剧的风雷剧场，以及上海杂技场、上海美术展览馆、上海书画社等等，还有五家新华书店、四家报刊门市部和四个书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就拿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来说吧，这家解放后开设的书店，由三开间门面发展到二十多开间，楼上楼下占地九百多平方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出现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伟大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发行量有了激增。由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新书的发行量尽管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书店的营业员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中，打破了单纯卖书的营业观点，开辟了一个阅览室，陈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其他文艺、历史、教育和科技等各类图书，供读者借阅，更好地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

##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的时候，他们曾恶狠狠地说：“让共产党占领上海吧，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进了上海，不要多久就会发霉、发黑、烂掉”，他们还说什么：“要共产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他们在这原来称为十里洋

场的地方布满了“香风”毒雾，留下了污泥浊水。解放上海的炮火烟雾刚消散，一场不拿枪的战斗又开始持久地进行着。

上海解放后不久的一天清晨，某部八连战士精神抖擞地巡逻在南京路上。突然“啪”的一声，一包东西落在一个战士的脚边，低头一看，竟是个钱包；抬头一望，楼上一个妖里妖气的老板娘在嬉笑。这是无耻的挑衅！战士顿时怒从心头起，“呸”地吐了一口唾沫，飞起一脚，把钱包踢得远远的。这个钱包，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信号弹，敌人妄想叫我们的战士在南京路上站不住脚。八连战士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场新的战斗！必须学会跟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的本领，不但要扎根南京路，保卫南京路，而且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南京路。

“南京路上好八连”自一九四九年进驻上海以后，二十多年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击退了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朝气蓬勃地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

八连的战士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在反腐蚀斗争中表现了“寸步不让”的精神。一位战士在拾到一分钱交公时说：“一分钱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你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就会在你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开始。”八连战士在反腐蚀斗争中，防微杜渐，在“一分钱”上“寸步不让”。这种高尚的思想品质，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火花。



好八连战士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八连战士在革命的征途中，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八连战士有两句名言：一句是生活上铺张浪费之日，便是政治上蜕化变质之时。另一句是对待革命事业要讲究，再讲究；对待个人生活要简单，再简单。草鞋是八连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之一。进城以来，他们坚持打草鞋、穿草鞋。战士们热情地说：“我们穿草鞋，继续革命大步迈。”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情况下，八连战士仍然保持自己缝补衣服的传统。一个战士一个针线包，针针线线，体现了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体现。二十多年来，八连的干部、战士不断在交换更替，但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却是代代相传。身在八连的同志，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离开八连的同志，把八连的好作风带到了地方。他们象一批批红色的种子，到那里就在那里生根开花。

今天，八连的同志们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修防修，不断提高阶级



好八连战士劳动归来。

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铲除资本主义土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事迹，成为全市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伴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胜利，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干部和战士，来到外滩肩负起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重任。他们以好八连为榜样，认真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拒腐蚀，永不沾，牢牢紧握手中枪。阶级敌人无论用匕首、钢刀，还是用金钱美女，都休想使我们的战士在神圣的哨位上挪动一步。指挥交通的人民警察，来回巡逻的民兵战士，背着书包上学的中小學生，以及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工人和干部，都以好八连为榜样，自觉地投入这场不拿枪的战斗。在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红领巾在马路上拾到一分硬币，交给人民警察后，行个礼转身就跑；服装店和理发店的职工在向顾客们宣传朴素大方的服装式样和发型；那些往来巡逻的民兵战士，更是百倍警惕地注意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好八连的优良传统在上海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今天的外滩和南京路上，社会主义的一代新风在发扬，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在成长。

在解放前的老闸捕房这个地方，解放后办起了一所中学——培光中学。如今它已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基地，许多革命青年在这里茁壮成长。培光中学的红卫兵们知道，他们今天一间间明亮整洁的教室，昔日曾经是帝国主义分子拷打、残杀劳动人民和革命前辈的牢房。他们脚下踏着的地板，过去曾经染上革命先烈的血迹，这是革命先辈与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战场。他们决心以好八连同志为榜样，

以实际行动来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

红卫兵们学习八连的好思想好作风，走出课堂，到南京路上去站岗放哨，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在好八连的精神教育与鼓舞下，红卫兵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到边疆去插队落户干革命。培光中学一九七四届毕业生小胡豪迈地说：“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我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边疆农村的建设。”小胡在谈他学习好八连的思想体会时说：“好八连同志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自己种菜、养猪、挑大粪，在平凡而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好八连同志在老兵复员时，有些同志可以进工厂的，但是他们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说‘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这些事迹教育了我：共产主义大厦是一砖一瓦建筑起来的，一个人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也是在细小的、平凡的学习、生活、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小胡怀着“乐在边疆经风雨，喜看山寨变大寨”的雄心壮志已经奔赴云南西双版纳。象小胡这样可爱的革命小将何止千万个？从这里可以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不仅在青年一代中被继承下来，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好八连的光荣传统，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宣告了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的彻底破产。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解放后的外滩和南京路换了人间！它显得英姿勃勃，光彩动人。俗话说，从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人们从外滩和南京路在解放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当夜幕降临到外滩和南京路的时候，黄浦江上传来了我

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远航货轮胜利归来时拉响的欢乐汽笛声。这时，外滩和南京路一带几幢大楼上由霓虹灯组成的红色标语亮了，老远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鲜红明亮，光彩夺目，这发自亿万革命人民肺腑的口号，也生动地说明了外滩和南京路的新生和巨变，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外滩和南京路在解放前曾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也就特别深刻。上海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决心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努力作战，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幅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新上海的画面正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 后 记

一九七一年，我们曾约请上海海关、上海博物馆、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电话局、上海市园林管理处等单位和个人编写以新旧上海对比为内容的稿件，借以反映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对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后来，我们又组织上海市黄浦区革命委员会写作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上海南京路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编写实践，认为外滩和南京路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在集中反映上海近百年的历史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于是编写成了这本《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书中有关外滩的部分吸取了上述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和内容，有的则是在他们所写的稿件的基础上加以改写的。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编者

一九七六年一月